◯ 世界史精览 ◯

未圆的共荣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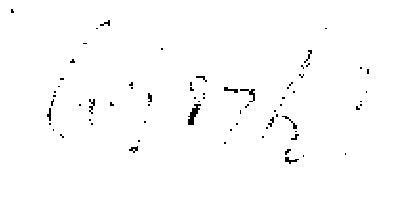
——日本武国梦的幻灭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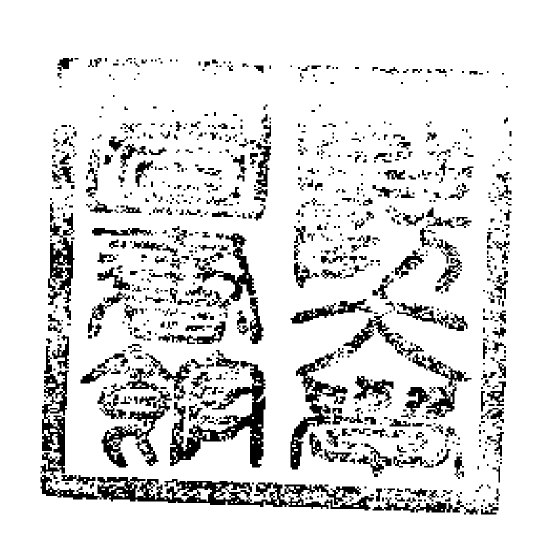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未圆的共荣圈

——日本武国梦的幻灭

张小兵　王亚玲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未圆的共荣圈

张小兵　王亚玲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9.87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9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0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亚细亚的梦

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昨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而其中的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就是亚细亚洲的文明摇篮，是亚细亚人民的骄傲，两河流域、恒河、长江和黄河成为亚细亚的象征。亚细亚的祖先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曾经在许多领域中独领风骚数百载。亚细亚人民以其特有的勤劳朴实、坚强勇敢的性格创造着人类的文明。

然而，当欧罗巴忙着开辟世界新航路之时，亚细亚却开始沉睡了。亚细亚酣睡几个世纪突然被惊醒时，发现欧罗巴已跨进自己家的门槛，

于是，亚细亚不得不屈从于欧罗巴的殖民体系。昔日先进的文明古国成了落后的民族，惨遭蹂躏，受尽折磨。亚细亚的人民在悲泣，亚细亚的人民在渴望。

摆在亚细亚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细亚人民手拉手，心连心，达到亚细亚的共存共荣，从而摆脱殖民者的控制，走上独立自由的发展道路。

日本自称可以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亚洲人民共存共荣

当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为殖民者欺压之时，处在亚洲最东端的海上蕞尔小国——日本却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进而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曾几何时，中国在亚洲有绝对的领导权，在她周围的许多小国都得向她称臣进贡，否则就得不到她的保护。

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俨然是亚洲的主人，它看出当时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就借助于亚洲人民的斗争热情，提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设想。

1940年6月，近卫第二次组阁。他当时所面临的任务是应付世界形势的骤变，在内外政策上实行改变，企图解决对华战争所积累的各种矛盾，7月26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准备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谈话时，第一次把“大东亚新秩序”称做“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府称它为“生存圈”。

“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包括亚洲的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从地理位置讲，大东亚远不止于传统所说的东亚，传统的东亚有中国、朝鲜、蒙古和日本本土。一个“大”字把东亚扩展到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而且还跨进大洋洲和西南太平洋。足见日本的胃口之大。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式的大亚洲主义。其实，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提出过大亚洲主义，不过，孙中山先生倡导以王道为基础，也就是说要以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准则，目的是要让被压迫的亚洲各民族起

来打不平。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因此在提出时候披了一层漂亮的外衣。他们向亚洲人民表露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声称共荣圈的目的是让亚洲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同享共荣之乐。他们甚至大言不惭的声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排除美英在亚洲的暴政，把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日本的这些动听语句，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泰国、菲律宾、缅甸等国中出现了支持日本的政权和首脑人物。中国的汪精卫为了能得到日本的支持，竟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溜出来，去南京寻求日本的庇护。汪精卫投靠日本是多种因素的结果，而日本委婉的言辞的确给了汪精卫几分梦想。

原来是大东亚“共贫圈”、“殖民圈”

日本真的准备领导亚洲走向共存共荣吗？

回答是绝对否定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日本实质上准备统治亚洲人民的野心，是亚洲各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清楚的。

日本当时没有公布的文件有力地说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日本军国主义者计划：如果中日战争胜利，那当然要继续向南推进，而即使被拖在中国战场上，也得继续南进。南进的直接目的是要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并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通过完成南进计划从而最终确立起以日本为核心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并炮制受控于日本的印度国、华北国、华中国、华南国，华西国、印度国，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国和新西兰国、远东地区的西伯利亚国，并把这些国家当作日本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行省。

日本政府1940年11月20日联席会议上决定的《南方占领区行政实施要领》规定了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对于占领区目前实行军政，以利于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并确保作战部队的供给。同时也强调对占领区不宜采取过激的政策，而适当保留所占国原来的统治机构，尽量不要超过当地人民所能忍受的最高限度。

从政治意义上分析，“大东亚共荣圈”实质

上是日本法西斯在“共存共荣”的旗帜下，狂妄地达到统治亚洲各国和各民族的目的。日本标榜自己是共荣圈的领导者和核心，实际上是要登上亚洲东部及太平洋西南地区的霸主地位。日本借口要解放亚洲人民，使亚洲人民摆脱欧美的暴政，俨然是亚洲各国的救世主。日本实际是利用亚洲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憎恨，来达到它对亚洲各国人民强行统治和奴役的险恶用心。日本在占领地区保存了旧殖民地权利机构，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宪兵政治，在占领地区杀人放火，烧杀抢掠是常有的事。

“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内涵是企图全部占有共荣圈范围之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济构想是企图从对英美的经济依赖中摆脱出来，以日满华（即日本、满州和中国，满州即中国的东北地区）为基础，以印度以东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环节，确立经济上的自给体系。日本在共荣圈内部推行了“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具体是使每个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需要的东西，并从其它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这样造成占领区的工农业生产必须按日本作战的需要进

行，显然使占领区的经济变为单一经济。这种经济上的侵略是19世纪老牌殖民主义者推行方式的再版，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东亚共荣圈”也包含着军事意义，如果占领了南洋地区，则又可以用南洋地区的淘汰的资源来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南进夺取军事战略重地，以便同美英展开持久战争。日本大本营海军部的文件也供认，他们主要是着眼于两方面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一是确立经济自给圈；二是强化日本在东方的军事战略地位。

为达到长久的统治，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部还实行思想文化的奴化政策，日本要求被占领地区学习有利于他们法西斯主义控制的思想和文化。

日本实行文化思想的奴役政策表明它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不是象中国古代的蒙古族侵略多瑙河一样，只是为了暂时的掠夺，而是建立长远稳固的统治，日本在中国推行的奴化教育最具有代表性。日本奴役中国的方针是尊重汉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

具体是要振兴儒教。

在中国沦陷区的教育完全是适应日本奴化政策的需要。当时的高等教育是为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服务的。中等教育，主要是所谓“实务”教育，也就是以培养为其效劳的下层技术人员和推行奴化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日本更为重视的是初等教育。日寇极为毒辣地向中国儿童灌输奴化思想。在师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上日寇严加控制。各个中学都配有日本教官。日寇经常派专人到学校巡视，甚至每周一次，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日本侵略者甚至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以此来考验伪国民政权与日本帝国的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他们删去课本中涉及到抗日爱国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日本用作统治中国的工具。更为可恶的是日本把孙中山曾经提到过的“大亚洲主义”等同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历史学家也供认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子虚乌有之事，而应该叫“大东亚共贫圈”，而中国史学家称之为“大东亚殖民圈”。

难圆的大东亚共荣圈

今天，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是世界各国中的特大富翁，是国际多极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然而，曾几何时，日本也曾做过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武国梦，在面积是它的100多倍的大东亚确立起一家独霸的显赫地位。

日本国内没有产生出象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突发式的、传奇性的、全民族“英雄”人物，但是，日本在侵略扩张方面毫不逊色，而且侵略扩张更具有连续性和长远性。

诚如经常服用兴奋剂的人需要不断增加药量一样，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壮大，由零星出兵到倾巢出动；范围一次比一次广阔，由朝鲜、满蒙、中国全部而到西南太平洋；杀戮一次比一次残酷，由单个的万人坑到屠杀全城几十万居民。

战争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战争之大令人惊心动魄，战况之残令人不寒而栗。

战争是个双面刃。战争的发起国在刺伤战

争承受国的同时，也深深地刺痛了自己。日本不仅面临着战争的失利，别国人民的反抗及世界格局的牵制，而且也使自己国家经济趋于崩溃，工人失业，农民流浪，大部分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内外交困使日本上层法西斯头子和军国主义势力穷于应付，焦头烂额，无计可施。

本来就不太结实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座高楼大厦，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开始分崩离析，趋于解体，日本武国梦的蓝图昙花一现……

第二章　战云密布东洋

东方俾斯麦称日本为蕞尔小国，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太平洋上的一匹黑马，要占领昔日的中华帝国，代替中华帝国统领整个东亚。于是乎，在东洋刮起了一股猛烈的黑旋风……

污泥浊浪：军国主义潜流

就面积而言，日本是个小国，日本国土面积约37万多平方公里。如果从世界地图上看，它的确很小——它只不过是位于辽阔的欧亚大陆东海岸外，面对浩瀚无际的太平洋的几片小岛。如果和与它近邻的中国和俄国相比，或者同太平洋对面的北美洲两个大国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日本无疑显得渺小。日本相当于老牌殖民帝

国英国的一半，是美国50个州中三四个小州的总和。

然而就是这个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称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却使李鸿章创立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近100年中，日本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克星。如果查看一下世界地图的话，不难发现中国的形状极象一只雄鸡，而日本则好象是一条蜈蚣。几百年来，雄鸡没有试探着吃过蜈蚣，而蜈蚣却处心积虑，要吞吃这只是它的20倍的雄鸡。

几千年来，中国虽然改朝换代，时分时合，但中国统一的趋势始终是主流，中国以其独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吸引着周边各民族，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过的文明。

中国是东亚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在中国认为，自己是当时最文明的国家，其余周边国家都是夷狄之国。当时夷夏之分的标准是礼，夷狄若来归化，即意味着夷狄承认中华帝国的优越性。当时的中华帝国非常爱面子，它要求前来进贡的使节在前往北京时必须走固定的路线，且对随行人员也有严格规定。朝贡北京皇帝的贡品必须是该国的土特产品，拜

谒皇帝的朝贡使必须拿有经本国国王签字盖章的书信，而且最令人头疼的是，朝贡使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跪下三次，每次下跪时各叩头三次，而在叩头时头要贴近地面。对于三跪九叩，一般的藩属国都能接受，但是欧罗巴的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这一套，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英国两次遣使来华，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中国让他们行的三跪九叩礼，而没有得到盛情欢迎。其实中国要别的国家派来使节并非是要让别的国家给自己什么，而纯粹是为了面子。只要一些国聪明一些，对中国的那些繁琐礼仪接受的话，那他们在走的时候，会收到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远远大于他们贡品数量和价值的珍宝古玩。

中华皇帝封朝贡国的统治者为该国国王，而皇帝的称号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作为中华帝国的君主所能得到的称呼，朝贡国的君主却只能被称为国王。从形式上看皇帝可以驾驭国王，控制国王。但实际上中国皇帝对大部分藩国的内政并不过问。这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制殖民国，进而掠夺该国的原料，垄断该国的市场，而中国皇帝对藩国控制只是

名义上的，中国皇帝不准备去掠夺藩国的任何财富，相反如果藩国特别顺从的话，还可以得到中国的荫庇。所以，中国在东亚形成的这种华夷秩序是非常松散的。

日本当然也属于中华帝国的朝贡国。公元1401年，中国皇帝册封日本天皇为“日本国王”，但中国皇帝并不准备君临日本，对日本发号施令，而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却早就“胸怀大志”。

称雄于日本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就马不停蹄，还要进一步统一中国，他们向传统的华夷秩序提出挑战。织田信长曾筹划讨伐明朝的战争，但由于国内变乱而未果。后来丰臣秀吉发动了讨伐明朝的战争。丰臣秀吉是个扩张分子，他对天皇非常忠诚，认为天皇所属版图应该无限伸展。他对明朝皇帝册封日本天皇为“日本国王”极为不满，他质问：为什么中国皇帝可以册封日本天皇，而日本天皇却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国王呢？丰臣秀吉心里已草拟好将来日本占领中国后的官职分配问题。他计划让天皇登上大陆去当中国皇帝，把日本的帝位交给天皇的一个亲王，而丰臣秀吉自

己则要住在日本的码头——中国的海港宁波镇守。

丰臣秀吉的这种扩张思想，确实令一些知道内情的中国人出一身冷汗。丰臣秀吉搞扩张当然遭到中国明朝的阻止。但是，当时作为亚洲领导者的中国只是对日本的侵略给予必要的防御，但从来没有组织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日本。要知道，中国明朝时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确实说明中国海军及制船的先进。而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对自己身旁的日本却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一贯爱护和平的中国人不会指望中国的皇帝去侵略日本，给日本印象深刻的教训。但中国人却竭力期望中国皇帝能注意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动机，并以其原有领导者身份制止这种动机。可中国皇帝却视而不见，就这样，丰臣秀吉的尝试虽然宣布失败，但这次开拓性的举动，令许多日本人头脑发热，利欲熏心，企图完成丰臣秀吉未竟的“事业”。

日本的民族主义感情非常强烈，这为世人所知。然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单一的排斥外界的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

是混血种。日本的民族主义使日本人对外国保有一致的态度，所以极有可能在一种民族自我优越的气氛中走上扩张主义道路，而日本的扩张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不少益处，给日本的民族带来了“曙光”。

民族主义曾助推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在维新运动中，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包含着对外国侵略的强烈反对和对本国幕府的一锤重击。这个口号，在日本资本主义进程中，起了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合下，民族主义往往有极强的号召力。欧洲是这样，亚洲同样也是这样。列宁对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看得最为透彻，他预言在亚洲，只有日本这个民族独立的国家才能够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资本主义展开了广阔的图景。勿庸讳言，日本今天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能说与民族主义没有联系。

在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是主流，但在其背后还有一股潜流，那就是扩张主义的蔓延。明治维新的得力干将吉田松阳、佐

久间象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处隐藏着扩张主义的基因。他们一直恳求改革幕府，反对外国侵略，求得民族独立。羽翼未丰之时就计划整修武备，等一旦军舰大炮充实之后，就占琉球、吕宋、台湾、满洲。他们的逻辑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近邻”，就是贸易上敌不过俄美等国，就应以朝鲜、满州的土地来补充。这种逻辑曾一度使日本人高度兴奋。

日本近代历史上有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都相继蜕变为扩张侵略主义者。

明治维新之后，吉田松阳的思想继续受到当权者的青睐。日本实力派人物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组织的政府，一方面向欧美强国乞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另一方面却大叫征韩论、征台论。随着民族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原来的民族主义逐渐蜕化为扩张主义。

日本资本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了。国际上，列强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国际舞台上盛行的强权政治，对日本政

府的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影响极为深刻。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活动家一个个转向国权论，为政府的扩张摇旗呐喊。其中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的转变最为明显，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民权运动倡导者，同时又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在他影响之下，日本国内产生了一大批民权主义者。而福泽谕吉180度的大转弯，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追随者，进而影响到政府。福泽把国权比喻为青螺之壳，民权比喻为青螺之肉体，目的是说明国权不存，民权亦将难保的道理。换句话说，如果国权越广泛越巩固，那么民权也就越有保证了。

福泽认为当时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中国人严复也认识到当时的世界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使然。但是严复的优胜劣汰只是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以免于帝国主义的吞并。严复的思想只是在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中有所反响，而并没有影响到当权者，更没有深入到普通群众。而福泽的转变却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政府和国民。

福泽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这个论

点被扩张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福泽认为象英美等先进国为食者，而象中国、印度等落后国为被食者。他建议日本加入食者行列，与文明国共求食饵。福泽最为关键的理论是：他认为日本虽然地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脱离了亚细亚固有的陋习，移至西洋文明。他认为日本不应该等待邻国（主要指中国和朝鲜）自己开化来振兴亚细亚，而应紧随西洋文明国家。福泽的言下之意是要日本象英、俄一样走侵略扩张的道路。福泽有哲学家的深邃，政治家的野心，所以，福泽理论一经提出，就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有章可循，有据可考。

另一个名噪一时的民权主义者加藤弘之也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鼓吹日本应走武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扩张主义的黑色浪潮甚至波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德富苏峰的蜕变尤为典型。德富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当日本的民权运动趋于妥协、消沉之时，他仍勇敢战斗，反对“官民调和论”，大力倡导“平民主义”、“和平主义”，他的主张一度在进步人士和青年中颇孚众望。但德富最终还是没有挡得住日本扩张

主义的诱惑，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的扩张主义者。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公开赞美侵华战争，煽动反华情绪。他胡说什么日本的人口增殖和日本的国土面积发生了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向外“膨胀”，而“膨胀”的敌人不是白种人，而是中国人。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相继变节。这些先进的日本人狂热地走向扩张主义，更何况那些本来就有强烈扩张欲望的战争狂呢？

这样，在日本——东洋一个蕞尔小岛上兴起了一股扩张主义的狂潮，在思想上刮起了一股崇尚战争的飓风。武国主义的思想逐渐成型。

胃口急剧膨胀：武国方案“大东亚共荣圈”出笼

日本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差甚远。在近代1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常受到日本的威胁，特别是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落后，日本的侵略者要负一定

的责任。岂不知日本这只实力雄厚的大虎，曾经虚心地向中国大陆请教过，当然，中国这只猫并未想到它的徒弟会去凌辱它。而事实上，日本自己也未曾想到能从大陆学到对付大陆的绝招。

公元6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恰如一股巨流涌进日本，于是，在大和宫廷中展开了一场斗争，争论是否接受佛教偶像和信仰使之和本国的神道具有同等地位，甚至是更强有力的一种宗教体系。结果佛教的拥护者获得了胜利。圣德太子成了佛教和随之而来的大陆文化的积极赞助者。圣德太子向当时强盛的中国唐朝派"遣唐使"(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留学生)，以便直接向高度文明的发源地学习。他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并起草了所谓"宪法"，其中包含了佛教和中国的训诫。

公元645年，一批革新者发动了"大化改新"事件。他们更加起劲地促进了中国技术和制度的引进。这种引进使日本由一个落后的部落地区，变成东半球名副其实具有高度文明的成员，它袭用了中国的模式，虽然学得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当时的中国作为经济上与政治上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确立起此后将近1000年的世界

领导地位。象日本人那样自觉地大规模地引进先进文化，在西方历史中是找不到同样例子的。这主要是归功于中国文明的光辉灿烂和极强的吸引力。日本这种有意识的模仿中国文化的形式，曾被一些西方人认为是一个没有创造性、专门抄袭人家东西的民族。实际上，日本这个民族在学习外国东西时，特别善于同本国的东西结合，然后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一点，被现代的日本人运用于引进外国技术，从而使日本经济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日本把中国政治团结这个传家宝确实学到了家。日本把统一的政治制度看做高于一切的观点。这一观点不同于强调把宗教作为统一因素的南亚和西亚，也不同于罗马帝国衰亡后被西方接受的宗教统一而政治分散的观点。

日本还接受了中国的关于君言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政体，并想把他们自己的半神化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从而使天皇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是本国神道的宗教领袖，另一方面又是中国那种国家类型的世俗君主。但事实上，天皇很少起后一种角色的作用。有史以来，日本天皇从未通过征服而取得权力。到7世纪

时，天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权力的象征，而不是个人权力的行使者了。天皇主要是履行一些单调的礼仪职能而无法在行使权力方面得到满足。目前，天皇处于仅仅作为“国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这个地位，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反常现象，而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天皇之下，日本人仿效中国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全国划分为郡，中央派遣官吏治理。中国的法典被照搬过去。首都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政府机构。当然，日本也对某些制度稍作改动，如把中国的政府的传统六部改为八部，以容纳管理宫中事务的内务省和一个中央秘书机构，以及与掌管一般政务的太政官相对称，代表天皇的本国宗教职能的神祇官。

同时还建立了一套中国式的复杂的宫廷等级制度，代替原有的皇族和地方氏族的等级制度，并且还设置了大量的官职。按中国的制度，尤其是7世纪末以后，政府的高级职务主要是由那些在复杂而高度学术性的国家考试中表现出自己才能的官员充当的。日本人开始模仿中国时，这一制度尚不健全，以致使日本官僚机构中的等级和职位很快地就变成取决于世袭的家

族地位，而不是靠个人的才华。

日本不模仿中国烦琐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所有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归中央政府所有，并以相等的份额定期分给每户农民，以便使每户农民大体上按照人头担负统一的赋税和徭役。这个繁缛的制度在中国未能运转自如，自然在日本也没有全方位的实行。

日本不仅仅学习中国的政治，而且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整个日本的高级文化都受到大陆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成就，哲学和文学被广泛研究，并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思想风格，乃至生活习惯。在纺织、漆器、冶金等许多不同领域中，技术获得了飞跃前进。日本保存了从中国和朝鲜学来的宫廷音乐和舞蹈。

日本毕竟不同于朝鲜。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其政治脉博与中国高度一致。而日本学习到的中国制度，在太平洋上的小岛内经过几个世纪的筛选之后，已经远离了中国的原型。在中国，如果权力象日本那样分散，就会被邻近的游牧民族征服，或者皇位就会被一个精力充沛，比原来的皇帝更能抗击侵略者的新王朝创始人所夺取。在相对来说没有外来压力的日本，不但控

制权可以分散，还可以在不改变天皇家系的情况下，就把宫廷中的实权转移出去。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使日本把过时的体制和机构保留下来。虽然这些已远不适合于现实。

可以说，日本学到了中国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绝招。那为什么走向战争道路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呢？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中心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国自己以其高品位的势能影响了周边地区，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也视中原地区为生存的最佳空间，这样，在中国境内各民族经常移动，融合，分裂，再融合。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上也一次次的重新整合，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和地域很难达到实际上的统一。对于中国来说，其最大的可能是巩固其已有的松散体系。而日本则不同，虽然日本也出现过战云密布的战国时期，但日本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几个世纪以来，日本没有受到一次大规模入侵。而且日本是由几个小岛组成，一旦认识到外患的潜在性，就很容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侮。而日本没有必要象大陆一样顾及于自己防务体系的巩固，如果有一定实力后，极有可能走向外扩张的道路。而向外扩张的首要

目标便是中国大陆。

在日本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比明治维新的意义更为重大。明治维新成功之处就是日本放眼于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西方的先进政治、思想文化与日本的传统接轨，从而为日本迎头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19世纪上半叶，德川幕府面临着许多难题，表现出濒临崩溃的征兆。如果日本继续推行锁国政策，那么幕府制度可能还会维持很久，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科技的高速进展使日本不能孤立下去，工业化和使用蒸气的轮船开始把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带到日本海岸。

19世纪中叶，欧洲的海上力量已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夺取了东南亚的大部，并且正把中国的大门打破，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制度强加给它。俄国人已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全部西伯利亚，并南下向日本北部的几个岛屿推进。美国船只则驶经日本海岸到中国去进行贸易或在日本近海捕鲸。其中有几个西方国家曾屡次劝说日本人打开他们的大门。

1853年，柏利准将带领美国海军的1/4的

力量，用武力强迫日本准许美国舰队使用其港口。日本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威胁。1858年，美国驻日本领事哈利斯同日本签订了全面的通商条约。接着，欧洲的主要强国也如法炮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和协定。在这样情况下，形成于中国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制度也都加到了日本身上。外国商人在横滨等港口站稳了脚跟。他们受到欧洲军事力量的保护，享有治外法权（即由本国法官根据本国法律审理有关他们的案件）。条约对日本关税的限制，使整个日本经济向西方的机制工业品开放。日本只有纯粹的工业化前的经济和古老的自治领地的封建制度，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前，它看来同其他已被征服的亚洲国家一样，全无自卫的能力。

正如中国广州的三元里人民自发的反英一样，日本人民大众也非常憎恨殖民主义者。他们日益感到，为了对付外国威胁，全国必须振作起来，团结在天皇的周围，把天皇视为合法的统一象征。温和派呼吁宫廷和军方团结起来，而激进派倡导重整天皇雄威，形成“尊王”势力。加上大众的“攘夷”呼声，就是“尊王攘夷”。一些年轻莽撞的武士受到这些模糊不清的思想的鼓

舞，常常脱离领主，变为“浪人”，去刺杀幕府中的官员，有时也杀西方的外交官或商人。

恰如中国的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看出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一样，一些日本人也意识到，要保证日本不受西方入侵，只有采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技术，才能确保日本的安全，进而在政治上取得同西方平等的地位，这样同样也可以达到“攘夷”的目的。实际上，在九州南端的萨摩州和本州西端的长州兴起的这股思潮类似于中国洋务运动中提出的“富国强兵”口号。

与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的是，日本的革新都是打着天皇的名义，而且依靠的是新兴的中下级武士阶层。这也许是中日学习西方，步入世界成败的区别所在。1868 年，以 15 岁的明治天皇为名义，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及下级武士召开了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制，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实权掌握在倒幕派武士和公卿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手中。从而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

1868 年 3 月，明治天皇颁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为日本国民所熟知的《五条誓文》，内容有相当强的号召力。具体为：(1) 广兴会议，

万事决于公论；(2) 上下一心，盛行经论；(3)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4) 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5)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以含糊的语句表达了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对国人的要求。但这些含糊的语句同时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国人团结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学习外国，赶超外国，达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另一方面，天皇本身有“开拓万里波涛，国威布于四方”的大志，这些诱句就有可能被国人看作向外扩张的思想武器。

明治维新的主流是向近代的工业化迈进，如果单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日本会成为纯粹的商业大国，但是……

明治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其中“富国强兵”是推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总方针。日本工业的发展首先是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营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带动私人企业纺织工业的发展。政府自己在军队生产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建立了试验性工厂。为了防止俄国人对北海道这个岛屿的渗透，政

府耗费巨资有计划地增加岛上人口，并在岛上发展美国式的农业。这些防务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大体说来，"富国强兵"作为激励一个国家振作起来求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以"求强"、"求富"为最高目的。但问题是，日本明治政府的骨干是中下武士，因此，在他们认为"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可用于扩军备战，向外扩张，把日本建设为世界武国。

"殖产兴业"在日本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是日本传统的农业思想向西方工业文明转化的起点，其内含是由国家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国家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经济能迅速发展的法宝。而同时代的中国清王朝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清政府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扼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在内忧外患威胁下，才会小心翼翼地迈上一小步，然后中辍更长的时间。而日本明治政府则要"明智"得多，它着重扶植工业的三个方面，军工、交通运输和通讯以及采矿等部门由国家经营；把国营企业转让给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加以援助。从

1880年开始，政府把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的厂矿企业，通过现金出售、分期付款、无偿赠予等方式向大资本家转让。无疑，这样会给私人企业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从而加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取得转让好处的大部分是高利贷政商，他们一经与政府合作，便会形成财阀集团，如三菱、三井、住友、鸿驰等便是。这些财阀并不是由一般的手工业工场主成长而来，而是与藩阀、官僚密切勾结的政商。所以，财阀所控制的企业内部无论在经济结构以及经营管理制度方面都有明显的封建性质。封建性的财阀不可能象美国的托拉斯一样走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组织，而极有可能培殖出一批为他们的市场鸣锣开道的武士阶层，去别的地方以武力胁迫为手段，使别的国家向他们开放市场。到20世纪初，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依然还带有浓厚的军事性和封建性，在对待落后国家上更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与野蛮性。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最明智的举措。政府派学生到国外学习新技术，并出高薪聘请西方专家来日本指导。日本政府精心选择，认为哪国在某一方面最强，就照哪个国家的方式去做。

因为日本取得外援要自己出钱，所以日本要比现在得到免费援助的许多国家更能体会到援助的可贵，也能更好地利用外援。这一点学习外国的办法是日本人的诀窍，直到今天，日本在利用外国技术和外国资金上非常精明，日本能把外国的技术稍加改动成刻意创新后，在国际上具有更雄厚的竞争力。日本是亚洲各国学习西方的最优秀的学生，给亚洲的其他“同学”树立了典范。然而，日本经过一段成功的学习，在羽翼未丰之前，就瞧不起亚洲的其他穷兄弟，日本认为它已与西方国家一样属于文明国家的行列，且自己本身是亚洲的一员，理当代替西方国家统领整个亚洲。日本文化上的优越感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亚洲明显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以武力来显示其文明的优越。

总之，明治维新是日本的放眼于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使日本在19世纪末在现代化方面超出其他非西方国家，最终使日本处于西方世界强国之林，而不再是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一员了。从明治维新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为武国主义，一为商国主义。由于多

种因素的制约，使日本在一段时间内走上了武国主义的歧途，并制定出一个个的武国方案。

日本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特点是日本有自己明确的国策，早在大化政新时的早期日本就决定了大规模有系统学习大陆中国的方案，而后来的明治维新更是一个学习西方的系统工程。勿庸讳言，日本侵略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个方案的出台，也是日本有序国策的一部分，也正因为扩张方案的有序性使日本在初期作战中得心应手。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日本武国主义的总体方案是日本全盘战略的错误，它是不会见容于整个亚洲各国人民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和有识之士的。

丰臣秀吉在15世纪时就举兵企图占领大陆中国。但那时的日本还没有一个系统全面的国策，而只能看作是一次莽撞的尝试。真正侵略方案的出土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事。

1889年12月，具有强烈武国思想的山县有朋组阁。山县一上台就确定向朝鲜扩张的政策。1890年2月，山县内阁纪念皇纪2550年元节制定了金质勋章，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这是日本准备对外战争的信号。当时，日本国内比较

平静，没有明确的地方派和起义军，显然所奖励的武功超群者必定是将来对外战争的有功将领。山县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企图染指朝鲜的俄国的注意。俄驻日公使什维奇为此询问日本内阁，目前日本并没有敌国，也就没有必要制定武功勋章。他警告说，日本政府似乎对俄国的朝鲜政策采取反对的方针，“不至于轻举妄动以俄为敌吧”，并附带声明俄国政府反对日本占有整个朝鲜。

俄公使的话不幸言中，山县有朋于1888年草拟的《军事意见书》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野心。山县从全球的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看出，由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等的建设，运输手段的发展，使欧洲便于侵略亚洲。他分析说，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必然在东亚对立，并敏锐地察觉到，等西伯利亚铁路竣工时，俄国必然要开始侵略朝鲜，引起亚洲原有格局的变动。山县坦率地承认，要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的隐患，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充实兵备”。山县的《军事意见书》表明日本已把朝鲜看作自己日后扩张的跳板，根本不顾当时朝鲜的宗主国大清王朝的权力，而直接与俄国展

开对朝鲜的争夺。

1个月之后，山县为了统一内阁的思想，撰写了第一个扩张蓝本《外交战略论》，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两线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山县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他断言，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就必须用武力赶走；如果日本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线，那么日本就算不上完全独立的国家。显然利益线被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山县同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交点是朝鲜，主张为了在英俄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就要与英德两国在"东洋共同利益之范围内进行联合"。山县的策略相当高明，他想把朝鲜从清朝的怀抱中抢走，却还要联络清朝去当"朝鲜的共同保护者。"与外交策略相配合，在内政方面，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和鼓吹爱国主义。

山县内阁的外相青木对山县的政略理解得

最为透彻，并且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山县的方案。青木把俄国视为首要敌人，而把清朝看成暂时的同盟者。他极力主张日清联合把俄国赶出西伯利亚，然后摔开清朝，把朝鲜、满洲以及勒拿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版图。青木分析指出近期欧洲可能发生战乱，要求乘机驱逐俄国；对朝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政策。然后把亚洲大陆变成日本的市场。青木的意图是，乘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在整个亚洲形势中所引起的变动，"跻身于列强，参与彼等共同之事务，试行奋力之奔走经营，从而使世界公认日本为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员，并借以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青木把修改条约和入侵大陆看作表里如一的事业，其中既有冒险性又不乏一个外交人员的眼光。虽然青木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自己国家稳固的"利益线"，具有侵略扩张的反动性，但他能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给日本提供的良机，并周旋于列强之间，达到日本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而同时代的中国权臣李鸿章与青木相比就差了一大截。

山县首相与青木外相只是提出了大陆政策的蓝图，当时清朝还是被看作日本的同盟者。一

年之后，日本国土又兴起了一股对外强硬论和对外恐怖论。1891年组成的东洋俱乐部已不愿把清朝看作同盟者，并表示必须压制中国之“傲慢无礼”，认为“岂能与中国、朝鲜之流共论东洋之政略，并一一听从之耶?”而应该由“日本掌握东洋霸权而立于统帅之地位”，即打倒清国和朝鲜而称霸东洋。6月出版的一本《东方策》成了畅销书。在该书中，俨然以日本为东洋的霸主，指出俄国必将侵入满洲、蒙古，钻进太平洋，使东洋各国陷于危境。当然，该书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在内，该书认为“英俄以兵战，英美以商战，此三国竞争为经，而法德两国与此三国之离合则为纬。”警告说：“东洋各国行将成为少数强国之角逐场。”日本看出了西方行将角逐于亚洲的事实，但日本担心的是，如果西方独霸了东亚，那么就没有日本的生存空间。

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基本成型，日本国内一时出现了战争的叫嚣，尤其是看到中国清朝海军的实力之后，日本国内纷纷要求造舰造炮，不久，1894年仲夏，日中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1926年底到1927年初，中国南方的革命势力北伐运动势如破竹，越过长江、黄河，下一个

目标就是东北。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田中着急万分，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满蒙（中国东北）不同于中国本部，是日本利益的特殊地区，眼下制定对满政策刻不容缓。

田中过去一直看重张作霖，把张看作日本在东北的看守，最近，田中发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而且成了北伐的主要对象。

田中苦苦思索，满蒙怎么办？张作霖还要不要？田中一个人怎么也难以决断该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

1927年6月27日～7月7日东方会议在首相府召开，会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各持己见，大叫大嚷。田中声称这次会议解决不了满蒙问题誓不甘休。田中老谋深算，狂妄地叫嚷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割开，搞成一个特殊地区，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

会议最后一天，田中宣布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纲要对日本当时的外交作了统一的部署。

田中虽是个极端反共产主义的头子，但出于策略考虑，如果提出反共产主义，那么必然会

分化中国革命。田中对中国革命队伍中的右派领袖极为看重。

但田中决不容许日本利益在中国受到侵犯，他密告中国驻军，如在华帝国权益遭到侵害，即采取断然“自卫”措施。

田中特别强调满蒙问题。他指出：“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他指东三省是日本国防以及国民生存的良好空间，关系重大。

田中首相可以算是张作霖的干爹。早在张作霖由奉天派而成为军阀巨头的背后，就有供职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的田中义一的一贯支持。张作霖进入北京，作出了同国民革命决一死战的姿态。但是，田中为了保存张作霖的势力，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劝告南北两军和解。他依然想依靠张作霖来维持满蒙局面。

蒋介石下野后于1927年9月来到日本。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寻求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他自己声称此行是要考察研究他离开日本13年来“取得奇异进步之日本”，以确定将来计划。

防止共产主义是田中的首要对华政策，田中在会见蒋介石时特别强调说：“共产主义在日

本之蔓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之发展。”田中的意图是故意和蒋介石套近乎，以使蒋介石觉得必须更疯狂地反共产主义才能得到田中的保护。田中还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指出如果长江以南不能统一，那时共产党便要发展；并敦促蒋介石应该首先统一长江以南，待基础扎实后再着手北伐之对策，那才是最好的方法。

田中以反共为诱饵，其真实目的是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局限于关内，而自己继续当东北的太上皇。田中在同蒋介石谈话中流露出威胁的口气，他警告蒋介石在北伐中不能触及日本的利益，更不能染指东北事务。

但是，此时田中仍没有对张作霖失望，田中本人及内阁成员认为张作霖是给日本把守东三省的理想人选。田中认为日本控制大陆的第一步是控制东三省。田中觉得张作霖呆在北京不利于东三省的稳定，而且蒋介石的北伐军已节节推进，张作霖肯定不会支撑住北伐的猛烈攻击。所以，田中劝告张作霖回奉天。

1928 年 6 月 3 日，张作霖奉命乘京奉铁路的专车从北京出发回奉天。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是他上西天的极乐之日，眼看张作霖到

了奉天城西皇姑屯自己的家门口时却听到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一生就此了结。

为什么田中支持张作霖，可张作霖却被日本炸死呢？其实，张作霖的被炸并非田中的初衷。暗杀张作霖的活动是由关东军的一个将领指使下所为，具体情况，下文叙述。

田中内阁为什么极力主张东三省与关中的分立呢？田中为什么要在东三省培养自己的势力呢？这些问题在当时还不太明朗，许多中国人只是以为日本在东三省无非是为了控制东三省的市场而已。但三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令中国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九·一八”事变……

奇怪的是，田中内阁召开的旨在解决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中怎么竟然没有出现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蛛丝马迹？田中在会议上的话也只是口口声声说满蒙的重要性，并没有部署日后侵占东三省的方案。

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田中召开东方会议后不久，中国人就得到了田中在会后向天皇上奏的《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的全部内容：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

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政权……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后日本的侵略活动大体上是按这一方案逐渐推行的。

日本的东方会议制定了日本侵略的依次顺序是满蒙——中国——世界。可见这个东洋小国的胃口有多大。当然，东方会议的直接目的是占领满蒙，可以说“九·一八”事变是东方会议的产儿。东方会议只是勾勒出日本侵略扩张的三个步骤，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充实，其侵略方案越来越具体。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战争初期，日军节节深入而中国军队却节节败退。但是日本并没有使蒋介石政府就范，蒋介石虽然没有能大规模的反攻日本侵略军，但是日军深入中国大陆，却困难重重。

1938 年 1 月 16 日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

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新政权之成立和发展。

第一次近卫声明，正值日军节节胜利之时，近卫虽然希望蒋介石政权能听从日本的指使，但近卫同时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愿意的话，也决不能勉强，完全堵死了和平谈判的道路。近卫这句话为后来汪精卫叛变留下了空档；近卫不愿同不听命于日本的蒋介石政权，但极有可能同听命顺从日本的别的政权友好。

在华日军大本营后来放弃“不扩大战线”的方针，决心开展徐州战役，又制定了开展汉口和广州两战役的计划。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打击南京失陷后迁都汉口的国民政府领导中枢，攻占华南要地广州，切断蒋介石政权的重要补给线，以使国民政府屈服。

1938年7月14日，日苏两军在苏中边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危及日本原定计划的实施，但因有8月10日签订的战争协定，这一事件大体上得到解决，使日本得以在8月至9月间先后开始了汉口战役和广州战役。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7日，占领武汉三镇。然而，国民政府又把首都由汉口迁到重庆，抗战态势并未崩溃，所以这次作战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是徒然扩大了战线。

由于这两个战役，日本的兵力投入达到了极限。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在这两个战役结束时竟达 24 个师团，100 万人以上，国内仅仅剩下 1 个师团。由于准备对苏战争的兵力也转用于中国战场，故在朝鲜仅配置了 1 个师团，在满洲仅配置了 8 个师团。(而当时苏联在远东的兵力达到 28 个狙击师和 18 个航空兵团)，从把苏联作为头号假想敌国的国防方针的目标来说，对苏战备的劣势极其令日本人忧虑。这样，日本陆军在汉口、广州两役之后，已无力继续进行攻势作战而不得不转入“战略进攻——战略持久时期。”

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持久性看得最清楚。他在同年的 5、6 月间所写的《论持久战》中作了预见性的精辟的分析。毛泽东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指出：因为日本攻占广州、武汉，日本军队的“战略进攻”和中国军队的“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将结束；其后中国军队将逐渐转入“准备反攻的时期”。在第二阶段，日本企图“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

起初，日本侵略军相当狂妄。早在华北事变时，一些日军将领吹嘘只用一个月就能结束中日战争。而在事实面前，“对华一击论者”的设想宣告破产。不消说一个月，就是在一年半之后，投入总兵力的2/3以上也没能解决，终于不得不采取“长期持久的态势。”从表面上看，截止1938年秋，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是日军所统治的只不过是一些点（城市及周围）和线（铁道和公路干线），而除此之外的地区，到处遍布抗日据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威胁着在华日军。

11月3日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标志着日本政策的转变，日本开始对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声明一方面承认国民政府已经沦为地方政权，同时却又说，如果“国民政府肯放弃以往的抗日政策，改变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就明确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自我宣告了扶植伪政权的失败。

声明宣布，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确定不移之方针”，而且声明特别重视对日本国民的鼓

动，扬言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肇国之精神，此事业之完成乃赋予现代日本国民之光荣天职。”

同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重新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表明了东亚新秩序的实质。

所谓东亚新秩序，不单是一个经济圈，而是建立一个范围很广的统治圈的设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

汪精卫与近卫声明配合得相当默契。他从所谓的“和平救国”立场出发，批判“抗日救国”的路线。日本政府相中了汪精卫这个亲日派，想以他来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汉三镇失陷后，在国民政府内部“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抬头”，这使日本对汪精卫的工作迅速具体化。12月20日，汪精卫从重庆逃亡河内。

12月22日近卫与汪精卫的逃亡相呼应，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然后作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并列举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即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在河内向重庆政府展开宣传活

动，预计国民政府内部的和平趋势将会高涨，然后在日军非占领地区的中国西南部将会建立起新政府。

然而，对汪精卫的呼吁，蒋介石国民政府却并不为之所动，汪精卫被骂为卖国贼，并撤销了他国民党副总裁的职务，连国民党党籍也被开除。这样，汪精卫完全陷于独立，日本政府对汪精卫进行活动而开展的政策进攻遂告失败。

综合近卫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可以看出，作为一项策略来说，是为了分化中国大陆的抗日力量，使日本顺利的领导这个东亚的新秩序，而我们必须清楚，东亚新秩序完全是冠冕堂皇的骗人把戏，要知道近卫发表东亚新秩序时，日本2/3的部队都在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怂恿中国加入东亚新秩序，就是日本骑在中国人的头上独霸整个东亚。

而从东亚新秩序的本质上说，日本准备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以中国大陆为主要阵地的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区、政治区、军事区和思想文化区。由此可见，东亚新秩序比此前的东方会议时侵略的计划更直接，更深刻，考虑得更为长远。

日本制定侵略方案都有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日本的每次国策中都要提到未来的野心规划，同时每次国策都有重点。大陆政策的关键，是同中国和俄国争夺朝鲜；而东方会议的当务之急是使满蒙与中国分离进入日本的版图；东亚新秩序的核心是如何顺利地控制整个中国；而这里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是在占领东亚的基础上寻求对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控制，显然大东亚共荣圈的“宏伟计划”是空前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日本“武国梦”的能否实现问题，是日本生死攸关的问题。

1939 年 9 月 1 日，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以排山倒海之势侵略波兰，揭开了欧洲战场的序幕。德国比日本的来势更为迅猛，因为德国有“闪电战”的经验和先进的武器。这次对波兰的袭击出动了 57 个师，约 100 万人，2500 多辆坦克，2300 多架飞机，整个波兰迅速淹没在战火之中。德国用 20 多天的时间控制了整个波兰，接着向北占领丹麦，控制挪威，向南征服荷兰，占领比利时。

德军战绩辉煌，最为注目的是德军在 1940 年 5、6 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击溃了号称欧

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

而同时的日军却在中国战场上陷入僵局，日军85万军队被拖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泥沼般的长期消耗战中。

但是，日本陆军大本营被德军闪电战的辉煌成果搞得眼花缭乱，他们也想象德军一样取得辉煌战果，他们深知在中国一时难有突破，就盘算起南进，他们"生怕误了一班车"，准备缩减在华兵力而用于南进。南进的目标已超出了东亚的范围，因此，日本政府就有必要调整新的方案。

近卫于1940年7月再次组阁，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新的扩张方案——《基本国策纲要》即：

> 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首先大东亚新秩序与欧洲德意的欧洲新秩序相呼应。为了取得与德国的配合，1940年9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与德意两国签订了《三国公约》，其中的第1、2条规定，日本将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

位，而这两个轴心国也将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

松冈在会谈中道出了大东亚的范围应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新喀里多尼亚，并将逐渐扩大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见，“大东亚”这个概念就有了世界意义，因为大东亚的范围已触及英、法等盟国的利益，显然配合了希特勒的行动。再就是大东亚实际上就不仅仅是东亚，而且还包括了南太平洋和大洋洲。

自然，这次的《基本国策要纲》也不乏鼓动其国民的美丽言辞：

皇国之国策，乃基于八弘一宇之建国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这次大东亚新秩序同 1938 年至 1939 年出现的各种秩序论不一样，以前总要标榜“王道主义”和“五族协和”为核心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而此次日本是地道的日本本位主义和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指出：“现在的日本版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以侵华战争为开端，进而征服亚洲和控制整个亚洲经济的垄断主义，”其目的是“首先炮制

满州国，接着再炮制华北国、华中国、华亚国、印度国、澳大利亚国和西伯利亚国，把这些国家作为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行省。”

大东亚新秩序由外相松冈洋右首次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府这样表述是为了说明“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的重大关系，突出是日本的“生存圈”，这与德国法西斯提出的争取“生存空间”如出一辙。

“大东亚共荣圈”同以往的扩张方案不同处有二：一是它的世界性，这主要是指日本与德意同流合污的反动性；二是它的仓猝性，这主要是指，日本虽被拖在中国战场，却要在此种不稳固基础上继续扩大战争。

这两种属性又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一是由于它的世界性，如果与日本命运息息相关的德意法西斯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垮台的话，日本也难逃厄运；二是其仓猝性使日本在初期有可能抽调兵力南进，而一旦南进受到亚洲以外的美英的打击，则日本在东亚的空虚会使其亚洲优势荡然无存。

“大东亚共荣圈”是一项“宏伟”的工程，也是一笔冒险性很强的大投机生意，它的成败直

接关系到日本武国道路的畅通与否。

群魔粉墨登场：武人相继专权

日本传统有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是由中国的理学与日本的神道及本民族的性格结合而成。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武士，特别是中下级的武士在推翻幕府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出现两种道路的迹象，一是日本的商人逐渐由本国走向世界；二是日本的武士越来越专权，有的不听政府指令擅自行动，有的跻身政府明火执仗发动一次次的对外战争。而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武人专权的趋势成了主流……

1928年6月4日清晨5点，奉天城西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浓浓的黑烟升上200米的天空，日军制造的又一起暗杀成功。乘京奉铁路专车的张作霖被炸成重伤，旋即身死。

这一爆炸事件宜确是日军所为，那么可以算是张作霖干爹的田中首相，为什么要杀张作霖呢？

事件其实并非田中初衷，而全系关东军所

为。

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斋藤少将与老资格的参谋河本，不同意田中的意见。斋滕在平时就想在满蒙设立“自治联省”，以实现满蒙的半独立。所以，他对积蓄实力后便离开日本而独立行动的张作霖非常憎恶。他策划当张作霖返回满洲的同时，即解除其军队的武装，使张下野，从而建立“符合帝国希望的新政府”，把满洲引向“独立”。他准备让关东军由锦州出动，让关东军充分准备。

但田中内阁并没有要关东军向锦州出动，可是直到5月下旬斋滕还寄希望让田中给他命令，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接到命令。于是斋滕大发牢骚。他说：“奉敕命令终于没有下达，越发可知统帅为政策所搅乱的情况。”并说：“可以认为，政府从一开始就存心让张作霖随意退却。”

斋滕的思想具有很明显的重兵倾向，他认为不应是“政策左右用兵”，而应是“用兵来左右政策。”这才真正是“统帅”。斋滕的这种“用兵来左右政策”的论点为后来一些武将所推崇。斋滕因而以为田中首相不断然决定处决张作霖，“其结果岂非两头落空”。但斋滕并没有下决

心自己去除掉张作霖。

而河本大佐则凭着自己的独断专行，策划暗杀张作霖，以造成控制满洲的机会，他下了坚决的判断。

> 杀死巨头。解决满洲问题之关键唯在于此。除掉一个张作霖即足够。……在万一情况下，不让军队、国家负有责任，而只使责任落于一人身上，否则不知虎视眈眈之各国又将乘虚而入，我决心来干，舍此别无他途。

因此，河本才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暗杀张作霖，打乱了田中首相的计划。田中内阁在满洲的计划全部化为泡影。为此，田中大为恼火，他表示为了不使“将来的策划遭受挫折”，就必须严厉追究陆军以“统帅”的名义颠倒了“政策”与“用兵”的关系的作法，元老西园寺要求田中采取严厉态度，忠告田中向陛下报告。西园寺表示：“只要西园寺还活着，这个事件就不能含糊了结。”

但事件的结果仍以含糊而告终。田中对肇事者采取的是行政处分，而且很轻，对河本大佐

是停职，对斋藤是幽禁。

田中起初向天皇说的形势相当严重，他说："考虑到在我帝国陆军中或多或少有首恶之嫌疑。"但田中经过调查后，处理得程度与他诉说的很不一致。所以，使天皇很生气。田中因此而惊恐不安，流着眼泪，向天皇提出总辞职，田中内阁终于垮台，两个月后田中死于住宅。

陆军私自作主暗杀张作霖，说明陆军与政府有离心倾向，如果政府措施得力，完全可以制止陆军的胡作非为。但由于田中没意识到严重性，或者说田中自己也有视而不见的错误，以后，陆军乃至军部私自作主，得寸进尺的事屡有发生。

继前面所说的斋藤提出"统帅"问题后，日本政府于1930年4月召开特别议会，会上围绕"统帅权"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政友会批判的重点是：政府不顾军令部的反对而自己决定，是关系统帅权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违宪。政友会的言下之意是让统帅权独立，不必听从政府的一切旨意，这实际上是为军队开了绿灯，而对政党是无意的自杀行为。

统帅权的争论激发了凭直接行动来改造国

家的运动和军部的公开干涉政治。

1930年夏天，正当统帅权争论方酣之时，参谋本部的桥本结织了樱会。樱会“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要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樱会是个秘密组织，成立的动机是不让政府干涉军队，该会担忧“政党者流指向海军之毒刀，显然行将施之于陆军裁减问题”。

樱会的宗旨和目的清楚地表明了军部对现状的认识和所抱的危机感。他们害怕，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会削弱国家观念。于是樱会认为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改造国家，另一方面对外侵略。

樱会头目桥本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得出结论：政府现时还没有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能力，对外侵略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改造国家内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从1930年到1931年2月，樱会计划利用主张大肆侵略的陆相垣埂一成，断然发动改造国家的政变，然而预定于3月20日发动的政变却因陆军的高级幕僚反对而未遂，结果却只留下了“三月事件”的空名。但一个月之后终于迫使滨口内阁辞职。

三月事件虽然未遂，却给以后的改造国家运动以巨大影响。一是，由于军部首脑带头以政变来实现改造计划，这样的范例使日后的政变计划接踵而来。二是，由于这个计划遭受挫折，使先内后外主义退居劣势，而先外后内主义逐渐抬头，其直接结果就是“九·一八”事变。

三月事件失败后，樱会的桥本和大川周明等人野心并未泯灭，他们卷土重来。三月事件之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31年9月发生的以关东军参谋将校为中心而策动的十月事件；一是“九·一八”事变，这里只叙述与武人专权有关的十月事件。

1931年8月，樱会在东京召开了有关“满洲问题”的集会，为适应必然发生事变的情况作好准备，进一步策划立即利用事变来发动政变。

当时驻在北京的樱会得力干将长勇，秘密回到东京，潜入一家花酒馆，并以此为本部，开始准备工作。桥本为首的樱会和大川周明为首的民间人士制订了政变的具体计划：企图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个月内，暗杀若木规首相、布原外相、牧野内大臣等，与此同时使东京陷于一片混乱，然后出动军队，发布戒严令，组

织新内阁，实现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政策，并预定以荒木贞夫为内阁首相，并确定了其他阁员。

然而，在准备政变期间，他们始终呆在花酒馆里，整天纸醉金迷，玩弄美妓，举行盛大宴会。他们的这种滋肆行为引起了纯真的尉官级青年军官的愤怒，他们全部退出而另外组织了皇道派，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政变计划在即将实行以前就泄漏了。这个计划马上为陆相等高级官员获知。所以军部首脑下令逮捕桥本等人，防止了这次政变的发生。

由于十月事件的失败，在军部内发生了皇道派和统治派的对立。三月和十月两事件的核心分子的陆军参谋本部中的校官级军官，大部分放弃了实现可能性不大的通过政变来改造国家的计划。"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局势已使军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骤然增强。这样，即使不发动危险的政变，也可能逐渐达到扩充军备和实现"国防国家"的目的。因此，他们就开始与中央各机关中新近抬头的革新派官僚、代表新兴康采恩的鲇川、森矗以及宫庭里的革新分子近卫、木户幸一等青年贵族加强了联系，并经常利用早餐会等形式研究具体的改造计划。

和这一派相反，尉官级青年军官非常单纯和莽撞，激烈地反对与官僚财阀的联系，并由于他们更加缺乏理性的观念主义作祟，仍然没有放弃采取武力行动的计划。他们与主张武力政变的北一辉等人的关系愈益加深，从他们的精神主义倾向出发，拥戴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领。因为这一派口口声声称他们以皇道为最高原则，故被称为皇道派，而前一派则为了镇压皇道派，经常主张在陆军保持统治，故称为统治派。

但是，皇道派与统治派的对立，使右翼阵营中策划武装政变的军部革新派不得不暂时中止武力行动。而此时的对立给民间右翼团体中的激进派提供了契机。

1932年2月，政界人物前大藏相井上在讲演时被杀；3月初，财界人物、三井财阀的总管、财阀巨头、三井合股公司理事长同样被杀。

日本政府的警视厅立即进行侦破审讯，原来这些暗杀行为全系“血盟团”组织所为，因此，“血盟团”的首领井上日召及党徒10余人被捕。

原来“血盟团”的首领井上日召为首的13人组织的恐怖组织，按照其一人杀一人的方针，

计划不仅仅是以上被杀的两个人，而且还包括地田、西园寺、若木规、乡城等其他政界、财界的大人物。

“血盟团”的首领井上日召出身于农村家庭，曾到满洲流浪过，归国后狂热信奉日莲案。他目睹农村的贫困而抱有强烈的革新思想；同时又接近民间右翼团体和中下级军官。他们认为农村的破落是由于前任大相藏的政策不好而造成的，因此要有计划地杀一批政界与商界的大人物。“血盟团”显然带有法西斯的某些特征，并不是一般的恐怖组织。

“血盟团事件”是右翼分子所干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恐怖行为，不难看出，“血盟团”只是针对政界与商界大人物，而并没有针对军部的将领。所以，“血盟团”使政界商界人物胆战心惊，经常惴惴不安，遇事总想依赖军部；而军部则看出这种法西斯组织并不反对自己，相反这种组织的活动反倒会促进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巩固。因此，可以说“血盟团事件”既是法西斯自下而上的一次尝试，又是日本转向自上而下走法西斯道路的催化剂。

“血盟团”刺杀事件血迹未干，接着又爆发

了一件震动日本社会的刺杀事件。

右翼极端分子大川周明交给主力杀手古贺手枪5把，子弹125发和资金1500日元，此后大川又提供资金合计4500日元，而且就在5月13日，政变的全体参加者一起决定于5月15日采取行动。

1932年5月15日这一天，以海军军官和陆军候补军官为中心的本队分为四组，于下午5时30分分别袭击了首相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主力部队在首相官邸时，首相犬养毅曾哀求说："你们有话尽可以说……"但那些军官要他"无须多言"，用手枪击毙了正值是星期日休息的首相。

在其它各处，或者开枪射击，或者向门前掷手榴弹等等，进行了示威，然后到宪兵队去自首了。而在当天夜晚，又有几伙平民袭击了几个电力变压所，但是未能进行任何破坏就全部被捕了。袭击首相官邸等处的是海军中尉古贺、中村等人和12名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袭击变压所的是16名爱乡塾学员。除了这些直接参加行动的以外，还有支援这次行动或参加策划的大川周明等右翼的重要人物也被捕了，爱乡塾的主

持者橘孝逃往满洲以后，也被逮捕了。

为什么会发生刺杀犬养毅的政变呢？这是因为右翼势力认为犬养毅内阁对承认满洲国踌躇不定，不宜采取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他们认为“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因此“必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就是要推翻犬养毅内阁，以便尽快地走上扩张道路。

军部当局对青年军官采取绥靖态度，陆相荒木贞夫对青年的行动还颇有几分怜悯，他说：“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制其心情，实不能不令人流泪。”后来，军法会议对这次事变的参予者进行审理，但处理得相当轻。最重的一个是无期徒刑，而对于刺杀首相的三上卓只判处了 15 年监禁。

“五·一五”事件仅只暗杀了犬养毅首相，其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并未能实现在戒严令下建立军政府的目标。然而，现役军人集团暗杀首相于官邸，国内外震动很大。

“五·一五”事件的最大效果是结束了政党政治。元老西园寺经过反复考虑和商量，决定避

开第一大党政友会的继任总裁铃木，而奏请由历任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下届内阁首相。5月26日，成立斋藤内阁。西园寺预计斋藤内阁能起“过渡内阁”的作用，准备事件风潮平息后恢复政党内阁。然而与西园寺初衷相悖，斋藤内阁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了。政党政治的崩溃，使协调外交的基础更加缩小。日本国内的民主气氛一时冷落，法西斯思潮甚嚣尘上。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建立军事独裁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统治派”一直控制着政权，“皇道派”则认为那些元老阻碍了自己的道路。“五·一五”事件后，两派对抗越发激烈。1935年8月，皇道派相泽中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统治派首领，被统治派视为罢免真崎的元凶。斗争的尖锐化达到极点。

1936年2月20日的议会选举，对法西斯势力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法西斯组织和法西斯口号遭到人民的唾弃。于是，“少壮军人”决定发动公开的暴乱以夺取政权。他们妄图抬出皇道派头子之一真崎甚三郎将军建立法西斯独裁。

2月26日，由9名军官所指挥的1474名官

兵、作为卫队而出动的75人与9个民间的参加者，开始行动，分为7队，在首相官邸暗杀了被错当成首相冈田启介的海军预备役大佐松尾，首相冈田终于幸免于一死，又暗杀了大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杀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占据了内相后藤文夫的官邸与警视厅，袭击了东京朝日新闻社。

皇道派的目的是要由皇道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以打开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他们担心天皇制军队势将崩溃，他们是狂妄的天皇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感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加之叛乱部队主力所属的第一师团派往满洲的行期迫在眉睫，所以这些条件凑合起来迫使他们发动了武装叛乱。

面对大规模的叛乱，统治集团乱做一团。政府张皇失措，军事最高当局有的还策划利用叛乱。到了29日，叛乱才逐渐被镇压下去，部队归顺了。青年军官们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军部却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叛乱，更加强了它的政治地位。冈田内阁辞职之后，陆军立即对继任内阁的组阁工作进行干涉，那些被看作自由主义和协调主义的人物均被排除于内阁名单之外。经

过难产，迟迟组成的广田内阁由寺内寿一任陆相，搞了所谓军队的人事整肃，把“皇道派”统统赶走，代由“统治派”占据了重要职位。

不过，这并不是统治派的单纯复活，而是清算了军队内部的新派系，形成了新体制派，以图达到军队统治一元化的目的。其组成是以陆相寺内为首，外加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和教育总监杉山元为最高领导的新的军部独裁体制。

5月间，继军队人事整肃之后，又复活了对政治进行干涉的有力武器——军部大臣、次官的现役武官制，夺回了对护宪运动所作的让步。8月间，又在军务局新设了拟定政策的机构——军务科，明确了军务局作为陆相政治幕僚的地位。还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把以往分散在各部局的人事权集中到人事局长手里，以此加强陆相的集权；并修改军人著作规则，以统治内部的言论活动；陆军的政治要求则通过陆相统一进行。这样，陆军制止了下级军官激进的国家改造运动，同时消除了派阀对立，实现了军队的一元化统治。这种新统治路线发展下去就变成东条独裁体制。

总之，“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武人专权的

标志，从此，日本沿着自上而下的法西斯道路走下去……

“二·二六”事件之后的一个月，即1936年3月，在统治派的支持下，广田弘毅组阁，但广田内阁中陆军的统治派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并乘机形成了军部独裁。然而，以宫廷势力为首，对军部独裁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多，海军也不赞成参谋本部所要求的国策，参谋本部甚至打算由天皇的亲裁——统帅大权的直接行使——来解决同海军的对立。就这样广田内阁受着来自陆军和海军的夹击，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于1937年1月辞职。

6月，颇孚众望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组阁，近卫自诩以“缓和相互克制与摩擦”的方针，但组阁一个月后的1937年7月7日，就由于不能解决因芦沟桥事件而开始的日中两国间的武力冲突，反而成为使“相互克制与摩擦”激化的内阁。

近卫回旋于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间，最后决心将事变扩大，于8月13日派遣陆军前往上海，挑起了全面战争。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近卫内阁是应负重大责任的。近卫为了让日本全民投入中日战争，于24日又决定了国民精神总

动员的实施纲领。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本手段，是强调国体的思想体系，使国民更深入地成为显教的信徒。显教无非是蛊惑人心，为侵略制造的思想武器。请看显教的教义：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彪炳生辉。其将随国家之发展而弥坚，与天壤共无穷。我等首先必须处晓，于我肇国之事实中，此根本原则如何光灿辉耀。

近卫的政策重视日本国民的精神动员，这要比狂妄叫嚣侵略的武士更阴险，更长远。10月，他还专门成立了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企划院，负责战时体制下的规划事宜。

但是，近卫仍觉得自己处理事情还不太自在。他常对人乱发牢骚，说什么“外务大臣文田弘毅不向我报告，陆军大臣杉山元也完全靠不住”，他向天皇自嘲地诉苦说：“我这样的人完全

象个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这实在叫人为难，真是对不起。”

中国事变已经超越了首相近卫的控制，继续扩大。1938年1月16日，近卫政府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期待“足以同帝国真正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出现。但和平的线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和日本的暴行而中断。

近卫首相仍不放弃关于解决事变的希望，于1938年5月对内阁加以改组，任命内阁参议宇垣一成为外相，池田成彬为藏相，企图借助这两个人的力量，恢复内阁的领导能力。然而事态却继续恶化。宇垣外相想以和平的方针来执行对华外交的一元化，但是陆军仍然计划扩大战争，最后还是由天皇批准了汉口的作战。10月27日，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的必要性。但11月20日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宣布将首都迁至四川省的重庆，并没有理睬近卫“新秩序”的谎言。

近卫让蒋介石政府听从日本领导的计划破产，更为严重的是军部不听近卫的指使随便扩

大战争。当时外界传闻说日本有“两个政权”，首相是没实权的政府，而日本好象是陆海军部的政府。

日本政府的元老、“高级顾问”、幕后策划者西园寺公望对一位众议员说：“近卫已筋疲力尽，无计可施，真是没有办法。”近卫内阁如果没有这位深孚众望的元老来支持就很难支撑门面。虽然12月22日，近卫首相仍然以谈话的形式提出了调整日本外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互助”的三原则，然而近卫自己也感到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便在1939年1月4日放弃组阁。

继任的内阁首相先后是平沼、阿部与米内，他们都没有使内阁的和缓有所起色。陆军出身的阿部早就想到对陆军内部的反常现象有所纠正，但也无能为力。他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日本“完全象是两个国家——陆军这个国和陆军以外的国。”而海军大将米内也无法改变政府格局。

日本不得不组成重臣会议讨论继任首相，结果推举了近卫，并得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支持。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

这次组阁的近卫几乎完全满足陆军的欲望。内阁成立后的第四天，即26日，近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纲要强调了“以八弘一宇之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皇国之国是”。他指出当前的重点是中国事变的完成，要根除第三国的援蒋行为，使重庆政权屈服，同时又提出了“南方问题之解决”。解决南方问题的企图，一方面在于彻底截断印度支那和缅甸的援蒋通道，另一方面则在于确保资源。这样，近卫内阁大体上是按着陆军铺设的战线推进其对外政策，从中国领土扩大至向印度支那的发展，甚至决心同英、美两国发生战争。

然而，追随陆军并非近卫首相的初衷，近卫组织“新国民组织”，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帅统一起来。为展开自己的政策而要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想以“国民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对于近卫的所作所为，读者切莫以为近卫是主张和平的，实际上，近卫比普通陆军军官的野

心更大，看得更远更深刻。日本政府侵略的两个大方案："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由近卫内阁提出来的。

近卫从第一次内阁时扮演"服装模特儿"的痛苦经验中引出了重要的教训，他说："我在过去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关于首相生活的结论是，自己的内阁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中间内阁，而且没有任何舆论作为后盾。……尤其是统帅与国务，恰似完全不同之物相互乖离，而联系其间的线索，则仅是通过态度极为暧昧之陆军大臣进行，而且，此陆军大臣能置内阁于死命。因此，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被统帅所操纵的脆弱的装饰。国民的生活，外交的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近卫的话对首相屈从于统帅的境况一语道破。

近卫在内阁会议中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是个综合性的指导文件，该纲要提议首先要在国民中间"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要义的国民道德。"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显然，内政的中心

问题是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向前发展，然后再利用新体制的政治力量来加强政府的法西斯权力。又次，在经济方面，大大加强1939年秋季以后陷于停滞的军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近列入日程的战争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的统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这就是说，为了配合国政的一元化，要求经济统制也实现一元化。

近卫在其《基本国策纲要》指导下开始了他的“新体制运动”。按照近卫的本意是要组织一个“与现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扎根于全体国民中间的组织和以它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的政府，以国民的舆论为后盾来抑制军部。”

在近卫的提议下，日本的政党纷纷解散，社会大众党、政友会、国民同盟、民政党相继宣布解散。他们组成了促进新体制同志会，一心想让近卫成立新党。他们希望新体制将“彻底清算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流域中的旧有的个人主义体制，而以一切归于天皇、万民辅佐的国体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政府和军部的有机结合为前提的领导国民的力量。

1940年8月28日，近卫着手构筑以国民组

织为根本的新体制，为此举行了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声明，表达了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

> 新体制乃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之建设指导作用，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其构成基础为万民翼赞会国民组织。

近卫强调，“国民组织乃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之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下意上达，把国民之全部力量结于政治上。”为了实现国民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

近卫出身于宫廷贵族，他过去一直同国民疏远，并且曾毫不客气地镇压过国民的自发运动。在他第一次组阁的1937年6月到1939年1月，曾压制人民阵线运动，禁止出版反法西斯的思想杂志《世界文化》，禁止出售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

因此近卫主张的新体制包含着奇怪的矛盾。他的新体制运动虽然开始寻求抑制军部的手段，但是，他为抑制军部而寻求的最终手段又是什么呢？是“国民组织”，是“亙断”？是国民？

不是天皇?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次总结新体制运动的第一次大会上，首先发表了暗示新体制运动已经改变方向的近卫声明，虽然近卫在已经腐朽僵化的国体面前表示了畏缩，而在这次声明中，他竟然把自己理想中的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限定在国体这个框框以内了，他说："这一运动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决不是所谓的政治运动。"勿宁说客观存在应该成为使一切政治党派、经济团体、文化团体在公益优先的精神下统一起来的超越政党的国民运动。……"然而，我们也坚决反对采取所谓一国一党制度。……不管这种制度在其它国家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然而把它搬运到日本来，那将违背我们一君万民的国家根本精神。在我国，万民都有翼赞的责任，绝不允许某个人或一个政党利用权力垄断翼赞的职责。"

近卫真可谓出尔反尔，他所说的高度政治性，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动听的空话而已。想利用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来推行国政的新体制的初步方案也终于落空了。这样说来，近卫的军务局长主张删去一国一党的那一部分论述是很自然

的。

从新体制筹备委员会的人选中也看出近卫避免"垄断翼赞"的意图，在委员会中广泛包括了天皇制下的各个派阀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一委员会也成了两派人激烈争吵的场所，其中，一派人是追求新体制原来的目的，另一派人则要把新体制变为八面玲珑的精神运动。

这样，近卫的新体制运动却成了已有的各种势力隐秘着各种不同想法而混杂在一起的场所。陆军坚持把新体制作为模仿纳粹的一国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军部独裁的国民基础而加以利用。率先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内务官僚，则企图把新体制当作内务行政的辅助组织。政党势力看到近卫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便蜂拥解散原有政党，要把新体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团体，使之政党化，谋求政党势力的起死回生。新体制运动简直是各种各样势力及形形色色思想糜集活动的舞台。

正如近卫的智囊人物所描写的："委员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皇道派，鼓

吹国体明征的纯正日本主义者）……”

委员成分复杂，其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各样的势力根据形形色色的思想而提出来的各不相同的要求，在使近卫为难的同时，也引起了近卫的动摇。元老西园寺公望对近卫的处境很忧虑，他担心近卫“是否也要把性命搭上。”

新体制虽然以大政翼赞会而具体化了，但糜集着各种各样势力的大政翼赞会，只能成为一个吴越同舟的争夺领导权的旋涡中飘荡的浮游组织。

大政翼赞会成立的日子有特别的意义。1940年10月12日正是近卫的生日，近卫作为该会总裁在会上致辞，其发言令人大吃一惊。他说：“本运动纲领，仅在于实践翼赞大政之臣道，此外别无纲领和宣言。”他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日日夜夜，竭诚为天皇服务”就一切都解决了。

一贯同国民最疏远的近卫一到紧急时刻，便象弃之如敝屣那样，抛开了国民与国民组织。近卫所以改变方向，不用说，是因为听命于宫廷的“圣断”所致。

近卫首相在作为新体制而组织大政翼赞会

的同时，也曾计划了经济新体制的组织。1940年11月，近卫令企划院起草经济体制草案。但由于草案中有许多缺陷，如"该草案抛弃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以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的经济原理为基调的扩大生产为其根本目的。"还有"经营与资本的分离"刺痛了资本家，所以，到后来随着翼赞会的精神运动化，财界对大政翼赞会的态度开始冷淡，并终于拒绝提供资金。住友本社总理拒绝翼赞会的资助时说："在银行家之间已决定不出借资金。"这样，翼赞会失去经济支柱，很难想象它能存在下去。

围绕翼赞会的斗争逐渐趋向明朗。政府中反对翼赞会的势力抬头，1940年12日，平日反对翼赞会的平沼出任国务大臣。平沼的入阁就是为了剥夺翼赞会的政治权力。至此，近卫内阁成为近卫、平沼联合内阁，已经变质。这样联合内阁的经济新体制充分采纳了财阀要求的形式。

大政翼赞会内部虽然充满矛盾与斗争，但是就全国范围讲，该会将日本法西斯力量组织起来，并自上而下在全国成立了各级支部。近卫

的新体制运动还加强了对战时经济的严格控制，对生产配给和消费实行统制。对工业严格限制，使日本经济进一步军事化，整个日本变成了一座兵工厂。此外，近卫内阁还实现教育军事化，在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加强了法西斯控制，从而也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方面加强了日本的法西斯专政。

综观近卫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可以说是日本侵略扩张的总设计师。他虽然不象军部一样随便叫嚣战争，但他的每一行为无一不是为战争服务。他确实准备削弱军部的权力，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缩小战争范围，而是为了使军部与内阁统一，以便实现战时的一元化领导，更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国民。与一些军部的粗鲁将领相比，他更注意军队各派的团结，在他的撮合下各派在对外战争上行动高度一致。可以说，近卫是各派法西斯势力的总头目，要知道，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9月，每一个重大战役，都与近卫有直接的联系。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组阁。

东条英机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最骄横的悍

将，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是积极推动扩大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一向以办事果断而著名，人称“剃头刀”。他继任后不到两个月就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成为真正的世界大战。

近卫处事优柔寡断，对日本南进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担心南进会挑起与英美的战争而使日本归于失败。近卫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预见是正确的，日本后来战争失败，首先就是受到美国的大举进攻造成的。

但是，东条英机不象近卫那样考虑得太多，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人总不能没有战争，如果没有战争，那就不叫军人。虽然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不可自拔。但是，当东条听到德国希特勒“闪电战”的辉煌战果后，东条英机的那颗心就按捺不住了。他不同意近卫暂时不扩大战争的主张，他觉得继续扩大战争才是日本军队的唯一出路。

天皇同意了东条的主张，于是在 1941 年 10 月 18 日成立了东条英机内阁。东条为了集中权利和加强统治，纠集了了解以往情况的官僚，他自己则兼任陆相和内相。他把他的爪牙安置在

陆军的重要位置上，通过这种任用私人的办法，完全把这个官僚内阁变为自己的事务机构，初步开始了东条“独裁”体制。

东条素以“战争狂人”著称。早在近卫内阁中任陆相时他就极力主张不停的战争。东条英机要求他手下的人也象他一样变成“战争狂人”，在一次陆军阅兵式上向全军发布了《战阵训》。《战阵训》的序指出了战阵的根本：

> 夫战阵乃根据敕命发挥皇军之精神，攻必取，战必胜，广泛传播皇道，使敌人感受天皇盛威尊严之场所。临战阵者，必期深刻体察皇国之使命，坚守皇军之首义，以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

在《战阵训》的“本训”中又强调“我国体之本义”，指出“皇军军纪之核心，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顺从之崇高精神”，晓谕称“神灵在上予以鉴察。”

东条为军人作战规定了原则，并且把军人的作战说成是为了天皇和神灵，这使军人在战争中必然要卖命战斗，以效忠天皇，尊奉神灵。

东条英机一上台就面临着日美谈判问题。

最后决定，外交谈判的目标应放在取得开战的借口并隐蔽作战的企图上；同时还考虑到雨季等气象上的条件，为了不失作战时机，主张从速下定开战的决心。最后终于决定在12月8日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人们把东条发动和推行太平洋战争的权力称为“东条独裁”，这种独裁形成决非偶然。本来这种权力无非是在战争已经不可能避免的局势下，作为现役军人的东条陆相接任了首相和内相的职务，从而形成了以军部势力为基础通过天皇制官僚机构发号施令的独裁体制。这种独裁体制排斥军部以外的政治势力，或者使其从属于自己，以便保障一元化的推行战争的体制。因此，东条内阁是一个由唯东条首相之命是听的一批官僚组成的“事务官内阁”；对于天皇，则在与内臣木户合作下，不许除统帅府、政府等的负责官员以外任何人与之接近，防止军部以外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即使皇族重臣也不例外。

东条英机还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开战以后不久，就以“间谍”嫌疑的罪名把宫本百合子等左翼及反战思想家同时加以逮捕。并召开临时议会，制定了“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

的临时取缔法”。该法律把原来只需申报的集会、结社改为批准制，而且把已经成立的结社也改为必须重新呈请批准；关于言论、出版，不仅禁止发售，还可以勒令完全停止发行。

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申请的500多个社团中，有立宪养正会等大约半数遭到了禁止。当时既有政党、工会、农会等已被解散，所以除平野力三等领导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者稍有不同而外，一般取缔的对象当然都是右翼团体。就连右翼团体也被指定为是扰乱以军部为中心的进行战争体制的步骤的存在而被取缔，足见东条内阁的独裁程度。

所以，东条独裁完全是以军部为背景：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气氛，借口进行战争的必要的而肆行暴力的宪兵统治。

1942年4月，东条内阁利用开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举行了“翼赞选举”。政府在举行选举时为了避免引起摩擦，不仅加强了监督，而且还采取推荐候选人制度，召集了贵众两院、翼赞会、实业界、言论界等代表，委托他们筹组推荐候选人名单。结果，组成了以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通过协议

会及其支部的活动的决议，推荐了466名候选人。

东条内阁在投票之前积极准备。一方面，对于官方推荐的候选人，除行政官厅及新近按照中央集权实行改组的翼赞壮年团积极予以支持外，政府还挪用临时军费作为选举经费。另一方面，镇压了未经推荐的候选人，特别是自由主义者。选举结果：被推荐候选人当选382名，被推荐者占当选人数的80%强。

大选以后，为了代替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同样由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召开翼赞政治集结筹备会，并于5月20日成立了以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赞政治会。阿部在成立大会上表示：

"今后的议会必须与政府表里如一，积极努力，协助政府推行国政。"

也就是说由与近卫内阁的成立的大政翼赞会一同形成政府的两翼，推行战时政策。所以，翼政会包括了未被推荐的议员在内的贵众两院全部议员1300人，这样，在议会中不再允许组织其他的政治团体。议会权力虽然集中在翼政会里，但它不设地方支部，可说是无根之木。

在议会力量进行改组的同时，大政翼赞会

也进行了改组。作为新体制运动的核心组成的大政翼赞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违背了一般人期待的官方御用机关，经过几次改组后，官僚色彩越来越浓。东条内阁成立后，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专门驱使人民为战争服务的启蒙机关了。改组翼赞会的目的是为了沿着上述路线更进一步地加强领导。作为翼赞会外围组织的翼赞壮年团被统一为翼赞会总裁领导下的中央集权的组织，在“翼赞选举”中起了行动队的作用。接着一些由其他中央机关所辖的国民组织及国民运动统统都被置于翼赞会的领导之下。这样，翼赞会在表面上已经成了统治人民的核心机关；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官僚，特别是听凭军队任意摆布的不能自主的组织，只是给官僚统治起了掩饰作用罢了。

翼赞会对国民的控制却十分有效。其基层组织街道会、村会和街道小组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国民的统治而采取的手段，是把这些组织充当生活必需品的配售机构，从而将每一个家庭紧密地束缚在它们的组织里。

东条内阁组成翼赞政治会和加强大政翼赞会，使法西斯势力笼罩着整个日本。

在整个东条任内，先后经历了东条独裁和翼赞政治体制。翼赞政治体制看似有点民主的味道，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东条独裁。

日本第81次议会通过了包括270亿日元临时军费在内的474亿日元的庞大预算和89项法案。这些法案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把行政权进一步集中到首相手里和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限。这说明东条内阁企图利用加强独裁的办法来解决随着战局趋于不利而日益尖锐化的国内和国际间的各种矛盾。

东条独裁固然与东条出身于陆军军官和他个人的暴躁性格有关，但实质上东条独裁是在日本卷入世界大战之后，而不得不采取的战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东条独裁保证了国内的相对稳定，使日本法西斯犹如困兽一样仍然继续扩大战争，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日本国内的舆论、政策及武人专政使日本由叫嚣战争，转向实际的战争；由局部战争，变为大规模战争。本国内虽然没有产生象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样的绝对法西斯主义头子，但是日本武人专制加上法西斯主义的浸染，达到了同德国法西斯同样的效果。近卫、东条英机先后操

纵日本内阁，一方面对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控制，一面统一调度远离日本在外作战的日本侵略军。由叫嚣战争到策动战争，日本国内简直成了战争的策源地，大东亚战争的指挥部。

可以说，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方面跨入了工业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却埋下了战争的祸根。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国土上升起的是“黑太阳”，这个“黑太阳”企图使整个大东亚细亚一片漆黑。

第三章　战雨倾东亚

日本近代历史是一部不断战争的历史。战争是日本实现“武国梦”的主要手段，不仅一次战争与另一次战争的间隔非常之短，而且间隔时间也只是被用来处理前一次战争的差别和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准备而已。这恰如经常服用麻醉剂的人必须不断增加药量一样，日本发动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争的辉煌确曾给日本的“武国梦”套上了一圈绚丽多彩的光环，但是……

从战争走向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似乎是在朝着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迈进。有议会，有文职部门，有议

员，有首相，好象与西方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没什么不同。

然而，在民主表面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隐患。从首相来说，首相并非由议会的多数票产生，而是由行使天皇特权的少数几个人递选，而且是在被任命后才举行选举。选举中，被任命者一般都能得到议会的多数票通过。而递选人在1922年以前主要是山县有朋，以后就是被称为最后一个“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前面已经提到过，每届内阁的首相不是经过他的提名就是得到他的首肯，权力很大。所以，国会对首相职位和内阁控制并不是既定的立宪制度的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是最严重的缺陷是军事和文职部门截然分开。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多为现役军人，不受政党纪律的约束。国会对军部控制松散，只能讨论通过军事预算。而且有野心的军人在退役后参加政党，以谋取最高的政治权力，如田中义一将军是1927年以政友会总裁出任首相的。更何况，武装部队完全不受文官的控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有可能脱离政府而私自决定一些军事行动，甚至挑起

或扩大战争。

经济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工业增长缓慢，这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突飞猛进形成明显对比。一些日本人就准备用经济以外的手段来求得日本的发展。

日本农村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大米和蚕丝价格猛跌。日本不少地区发生了“米骚动”事件，日本的农民处境特别艰难，经常缺衣少食。农村经济的不景气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农村农民生活的凄惨，使不少人产生不满情绪。前面提到过的“血盟团”就是借口政府农村政策失败而进行法西斯的暗杀活动。

日本城市里的经济问题也很严重，一方面现代技术的新型工业和尚未机械化的传统工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悬殊太大。这种经济上的“双重结构”使一些人不满。另一方面，日本一些工业发展相当迅速，使领导人对一些新问题显得措手不及。毕竟，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殖民地国家，一些领导人对繁琐的经济现象感到头疼。

再就是日本人的思想水平失衡，参差不齐。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观念相差万

里。有些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日益广阔的知识境界，其思想与整个世界的先进步伐一致；而更多的是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他们接受的是忠孝守法的思想。这种差距产生一种现象：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自以为日本人的思想水平与西方文明国家处于一个平面上，那么日本人应该在文明上为亚洲人做出表率，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而那些受低层次教育的人觉得日本在文明上的领导必须通过武力来解决，企图使日本走上“武国主义”道路。

在日本，有许多人对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不满。他们看出日本议会存在着大量的腐败现象，因此他们怀念过去的贵族化领导，在他们看来那些贵族是不谋求私利的。他们老是希望通过协调一致作出和谐的决定，并由忠诚于国家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予以执行。这些效忠于天皇的人有许多是想让日本走“武国主义”道路。更严重的是许多日本人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与日本真正战略利益相背，这使政府领导人在经济上一筹莫展，不得不屈从于经济以外势力的意旨。

日本早就发动过小型战争，那么日本发动

大规模战争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日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国际贸易收缩,各国只能采取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以求自保。日本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英、法、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大块的海外属地,而俄美两国有广阔的国土。但是众所周知,日本的面积是很小的,在国外只有朝鲜可算得上它的属国。

从人种来说,白种人已将西半球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称心如意的土地弄到自己手里,而把黄种人日本拒之于门外。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和英国的自治领公开以种族的理由,完全禁止日本人进入。美国人甚至通过了排斥异族的法令。这在日本人看来,不仅是侮辱性的歧视,而且使他们的经济也受到遏制。这样,使一些极端分子感到,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向邻近的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

中国当然成为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但是,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使日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捞到殖民地。1927年后成立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在试图收回对满洲的某些控制权。日本在满洲控制了经济命脉,很害怕蒋

介石政权会危及日本的利益。日本人有一种身不由己的紧迫感。

而日本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他们能够将这一民族危机感转化为对外的实际行动。

如前所述，在日本满洲驻军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在1928年6月策划了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策划者在陆军的保护下，逃避了首相田中的惩罚。1930年，内阁要求海军接受伦敦海军条约，把在华盛顿会议上决定的日本对美、英的主力舰三比五的规定，扩大应用到重巡洋舰方面。但海军总是觉得日本的海军力量太弱。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满洲的一批陆军军官，在得到满洲和东京的上级的默许下，制造了侵略中国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受到中国人抵抗，便获得借口，在几个月之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成立了以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为首的满洲傀儡国。

日本政府本来就准备占领东三省，但并没有准备马上就行动。现在既然占领东三省已成事实，就力图为军方向全世界辩解。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满州的行动时，日本政府在国内好

战分子的叫嚣下干脆退出了国联。

由于日本需要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国内的政党内阁很难满足军部的野心。一些军官和平民中的极右分子团体如樱会、“血盟团”不断煽动发起军事政变。1930～1932年，先后发生了几起首相和其他领导人被杀的流血事件。

日本全国为夺取满洲而狂欢，使得军部领袖更加趾高气扬。于是一些来自右派的狂热分子，尤其是青年军官极力要国家政策按他们的方向转变。这些极右派总是借口给农民说话，他们认为必须刺杀天皇周围的那些“邪恶领导人”。这样，就爆了发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结果，事变的策划者皇道派受镇压；而统治派却以此更加加强了军部的权力。这个事件同时也削弱了议会的权力。到1937年6月近卫出任首相时，完全取消政党参加内阁。

日本国内的政府体制，使日本更容易走向战争。日本为作战所做的准备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异常相似。虽然，日本没有象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的绝对独裁者，整个制度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民众运动的产物，但是，由于日本国民中的好战势力及近卫、东条英机等相

对独裁者所执行的对外政策具有连续性，所以，和德意法西斯一样，日本在侵略扩张上也毫不示弱，这样，日本从战争走向战争……

亚洲最强大的两支海军交锋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国策，一面推行“国权外交”，摆脱殖民地危机，一面对外扩张，掠夺殖地民，并首先将其锋芒指向了朝鲜与中国。

早在明治初年，西乡隆盛等“征韩论”派就曾提出侵略朝鲜的主张，但因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当权派赴欧考察后，深感日本国力不足，认为应“以内治为急务”，暂时使“征韩论”者退出政府。

但当权派并非反对对外扩张。

1874 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漂流到中国被杀害，便派出 6 艘战船侵入台湾，攫取“抚恤金”50 万两白银。

1879 年，日本把琉球撮入其帐下，改设冲绳县。

1875 年，日本武装侵入朝鲜。

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而打开了入侵朝鲜的门户。

两次对中朝两国的武装挑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是中日两国首次大规模的直接交锋。

明治天皇主张以武力"开拓千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野心勃勃，马不停蹄。

1884年12月，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迅速镇压了"甲申政变"。就此，日本政府对清政府进行要挟，1885年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通知。这种规定，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随着日本在朝鲜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885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1887年部分军国主义分子还制订了《征讨清国策》，计划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清军北上。并狂妄地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

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企图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可以说，日本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就是日本商国主义道路的挫折，而日本企图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是对外战争，那说明日本企图走“武国主义”的道路来取得日本的富强与自立。

日本军阀头子山县有朋于1890年出任首相后，赤裸裸地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台湾等地都说成是与日本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有权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公开煽动侵华。

日本着重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1890年以后，日本开始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于海陆军建设。日本政府以超过中国的北洋海军为目标，把添置速射炮和购买最新快舰作

为发展海军的重点。

而同时期的北洋海军却自以为实力相当雄厚，发展的速度很慢。1892 年 7 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抵横滨，受到了日本外相的热烈欢迎。丁汝昌也在“定远号”旗舰上招待日本议员。日本人看了这两艘军舰之后，认为“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舰队”。当时，清朝北洋水师的这一行动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他们觉得清朝水师来日本是为了吓唬日本。而日本人也看出中国水师确实有一定的实力。其实，清朝派往日本的两艘船是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铁甲舰，而日本却以为这两艘船是北洋水师中众多铁甲船中的其中两艘。所以，日本人心里非常着急。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了日本的目标。

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已经拥有 63000 名常备兵和 23 万预备兵，并拥有 72000 多吨的海军船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同时，日本参谋部还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的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机器也启动，紧锣密鼓，为战争摇旗呐喊。

天皇诏敕中警告“世界列强攻势”的威胁，主要是针对俄国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和中国海军实力的威胁。

德富苏峰和陆羯南是配合日本大陆政策的两个宣传鼓动家。

陆羯南声称：“左者，皇祖建国之初，有兼六合而掩八绂之诏，”并阐述如下：

“所谓兼六合而掩八弘者，乃推广吾国教化于世界，传播王道于寰宇之谓也。万般方策既皆基于此远谋，则天皇旨意所在即不可复疑。吾辈蒙言论自由之惠，敢于不避僭越之嫌而谈论‘国命’者乃出自恭赞皇猷之微志，岂敢妄自以私见附会公道，试诸空言哉！”

显然，陆羯南把侵略扩张披了一件漂亮的外衣，即为了“兼六合而掩八弘”。

相比之下，德富苏峰对侵略说得更露骨，他公开鼓动“日本国民的扩张性”。他指出，“维新开国二十余年，君不见我国国民有如挣脱羁轭之烈马，飞出樊笼之猛鹫”。他得出的最后结论令人吃惊：

“试思我国将来之历史，必将成为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之扩张史。详而详之，则恰如17世纪至18世纪英法两邻国在世界各地扩张争斗一样。或将为日清两国国民，勿宁说是两个人种，在世界各地之扩张史亦未可知。扩张之冲突史固然可以，但愿使之成为日胜清败之冲突史。”

不难看出，德富苏峰不仅抽象地论及“日本国民的扩张性”，而且还具体谈到了希望有“日胜清败之冲突史”的愿望。这种思想，使日本国民也叫嚣战争，错以为由于日本国民有的扩张性，必须走侵略扩张，即武国的道路。

当日本国内磨刀霍霍之时，朝鲜发生的农民叛乱，使日本有机可乘。

1894年，朝鲜不断发生反抗地方官员暴政的农民起义。5月，民间宗教东学道主要领导人全棒准发动起义。他们要求：肃清不法官员，驱逐日本人，允许自由信仰东学道。

日本政府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起义军，保证日本别无他意；而日本国内却秘密下动员令，作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的虚伪“保证”深信不疑，便于6月5日派直

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 1500 人去朝鲜。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以保护侨民和“维持日清两国对朝鲜权力之均衡”为借口于 7 月初陆续出兵朝鲜达 10000 余人，并且占领了从仁川到汉城的战略要地，对驻守牙山的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并伺机挑衅。

日军在朝鲜的驻军变为中国驻军的 5 倍。清朝重臣李鸿章惊慌失措，既不敢抵抗，也不敢增援。他还傻乎乎的建议清日两国同时撤兵，以求早日“收场”。但是日本蓄意战争，怎么能听从清方的建议呢?

李鸿章慑于日本的威力不敢出动北洋海军，主张“避战自保”。李鸿章的顾虑不无根据，因为他深知北洋海军自 1888 年正式成军后，没有再添任何舰只。更可悲的是 1891 年以后的海军经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去了。李鸿章非常清楚北洋海军不仅总吨位远远落在日本舰队之后，而且舰龄老化，行动迟缓，火力极差，炮位移动不灵活。

这样，重臣李鸿章对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不肯轻易一试，但他却幼稚地乞求列强出面调停，特别幻想“联俄制日”，希望依靠第三

国的力量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而慈禧太后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又忙于准备她的60寿辰的庆典，一心想让她的生日在国内谐和的气氛下度过。所以，她支持李鸿章求和的主张。

然而，李鸿章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却没有收到一点成效。各列强心怀鬼胎，岂肯轻易地答应一个弱国的请求。李鸿章的求和外交宣告失败。“弱国无外交”确是至理之言。

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终于爆发了日清之间的黄海战役。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战，成为检阅日本和中国海军实力的试验场。双方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将来在亚洲各国中的发言权。

1894年7月25日，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对中国“济远”、“广乙”、“高升”三舰发起攻击。结果，在朝鲜牙山口外爆发的这次小规模海战中，日本击沉了中国的一艘“高升”号。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9月16日，中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到达中朝边境的大东沟。17日11时，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出现在西南海面上。丁汝昌立即命令各舰升火以待，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居中，排

成“人”字雁行阵列迎战。12时55分，日舰首先向北洋舰队开炮，这样双方在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

整个黄海海面浓烟滚滚，炮声隆隆。舰艇穿梭往来，一艘艘的船沉没，一批批的人倒下。双方战斗激烈，决心试一雌雄。结果，日舰首先退出黄海，北洋舰队退返旅顺。双方各自都不知道是怎样结束战争的。5个小时之后，整个黄海海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次海战，中日参战舰船数目相等。中国方面损失了“致元”、“经元”等五艘战舰，并牺牲了象邓世昌、林永升这样的海军将领和许多爱国士兵。日本方面，5艘舰受伤，无一舰沉没。日军虽然没有能以绝对的优势摧毁中国海军，但他们认为日舰是远离日本国土作战，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已经不错了，并伺机再次发起对中国海军余部的进攻。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海军领导人刘步蟾、邓世昌与日本海军领导伊东佑亨同为各自国家派出去学习海军的留洋学生，论个人学习成绩的话，刘步蟾、邓世昌决不亚于伊东佑亨，但是由于中国清王朝的腐败，使这些海军之花逐渐

凋谢，终于没有使中国的海军强国之梦变为现实。而日本却决意要胜过中国海军。

甲午中日海战方酣之时，陆战同时进行。

1894 年 9 月 16 日，由军阀头子山县有朋担任总司令的日本陆军第一军占领朝鲜的平壤，10 月 24 日，开始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满洲。10 月 26 日，占领盛京（辽宁）东部重镇九连城，接着占领丹东、凤凰城。由于中国地方武装的抵抗，而没有占领辽阳。

由大山岩任司令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与第一军紧密配合，11 月 6 日占金州，11 月 21 日占领旅顺。接着日军在旅顺进行连续进行了 4 天大屠杀，整个旅顺城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据传，旅顺全部居民仅 36 个人幸免于难。日本残忍如野兽，使中国人至今都难以忘记。

占领旅顺后，伊藤博文首相决定转而进攻山东省的威海卫。伊藤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欲置中国海军于死地。日本把蜷缩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视为进犯京津地区的最大障碍。

1895 年 1 月 20 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山东荣城龙须岛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10 天后，日本海军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

台。这样，北洋水师被日本海陆两军包抄在港内。日本海陆两军一齐发炮，猛烈轰击，使北洋舰队的多数舰只被击沉。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写信给丁汝昌，劝其率舰队投降。丁汝昌、刘步蟾不失民族气节，双双自杀身亡。

1895 年 2 月 17 日是中国海军令人难忘的耻辱日。这一天，日本舰队攻陷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后半个世纪，中国沿海再也没有一支能威慑日本的海军力量。这也是其后日军能多次登上中国大陆行凶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阴险狡诈，在大举进攻中国之时还扬言要和中国谈判。当中国派出使节张荫桓、邵龙濂去日本时，日本却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而对两人百般羞辱。张、邵二人身为中国使节被恣意欺侮，实际等于对中国政府的轻视。

伊藤博文公开指定要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不必派代表前往日本。伊藤盛气凌人之势可想而知。

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如果拒绝和谈吧，日军就会继续进攻，直至中国的首都北京；而同意谈判吧，他又很清楚肯定要割地、赔款，这些屈辱的事必然使自己背上黑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但是，清政府为了苟安还是派李鸿章去谈。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从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开始，李鸿章开始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

本来李鸿章就心有余悸。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的暗杀，虽免于一死，但身负重伤。从此，李鸿章更是提心吊胆，哪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而只得唯唯诺诺。

4月1日，日本全权代表向伤愈的李鸿章递交了和约草案。同时，日本一直偷听并破译了李鸿章的全部密码电报，了解到清政府和李鸿章都有割地赔款的准备，而且伊藤博文还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扬言如果再打下去，日本的议和条件将更加苛刻，伊藤还要求李鸿章在对草案允与不允之间选择，不能另提请求。

日本的讹诈果然奏效，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终于不得不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对条约的结果，日本人基本满意。

中国清朝政府承认了朝鲜独立，从而把清朝势力驱逐出朝鲜。

日本和清朝签订了与西欧列强各国并列的条约，从而否定了过去对清朝的平等关系，并把清朝强行纳入以不平等关系为内容的新的条约体系。

日本获得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从而成为与西欧各国并列的殖民地占有国。

日本唯一感到不高兴的是：中国已经答应把辽东半岛割让给它，而不答应给它的是俄国、法国和德国。足见清政府出手的大方慷慨。由于俄、法、德各有目的而形成干涉还辽集团，当时的日本毕竟羽翼未丰，还不敢同这三个欧洲列强为敌。但是，日本却强烈要求中国给它一大笔钱。这样，清政府给了日本"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这等于说日本武力占领辽东半岛是一个利润颇高的投资生意，因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费用不多。这全要归功于中国叶志超那样

“一夕狂弛三百里”的马拉松世界逃跑冠军，当时清政府中的将领除了徐邦道等少数人抵抗外，其余的不少将领压根就没有同日军交过面。

这样，日本得到军事赔款2亿两，利息1083万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以及威海卫守备费150万两，合计24233万两——折合当时日元36408万元。这么多的钱在当时是颇为可观的，这些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侵略扩张的基金。就是今天，能得到这么多的钱必定能给一国的经济和军事注入强大的活力。

如此看来，日本侵略中国获益甚丰，地钱两全，满载而归。

日本当初确实决意要同中国清朝一战，但日本自己都想不到侵略的效果要比日本自己预料得好得多。日本对中国残忍无比，而清政府对日本的款待十分殷勤。许多清朝将领一听说日军的到来要么主动相让，退避三舍，要么撤离要道，让日军长驱直入。

清政府为了苟安，特把台湾、澎湖拱手相让，而且还给日军发占领费、守备费、支出费等多种多样的“奖金”。这使日本更加坚信走扩张侵略的“武国”道路，同样可以使日本势力扩大

和国家昌盛。

日本认为，日清甲午战争的重要性更在于，通过双方直接的正面的大规模的交锋，使日本摸清了中国清朝政府的底细。日本以后在中国领土上可以象西方列强一样，随意的胡作非为，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由于日本本国的封建性相当严重，致使日本对中国更具有野蛮性。

日清战争使日本天皇的权威大增。“忠君爱国”的口号不仅成为学校儿童的口头禅，而且深入到大街小巷，家喻户晓。据传说，日本老师拿出一个红红的大苹果给学生看，而当学生想要吃时，老师就说，这些苹果在中国大大的有。这种教育比抽象的忠君爱国教育更具有煽动性。

日清战争最终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日本的国民在天皇上下团结起来了。日清战争使天皇“君临在每个国民的心中”的同时，也在“每个国民的心中”，确定了“臣民”的意识。

作为臣民的国民，对天皇越是深切崇敬，则对中国人越加侮蔑。日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军阀们借日本战胜清朝之“余辉”，恣意鼓吹军

国主义。

奇怪的战争：为争夺中国领土、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中国政府保持“局外中立”，让别国渔利

甲午战争后，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竞争。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本与沙俄同为“八国联军”的主力。根据战后的《辛丑条约》，日本分得5000万日元的赃款。但是，日本希望从中国获得的何止是钱呢！

日本到嘴的肉却让俄、德、法三国的干涉而不得不吐出，虽然日本得到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但日本控制中国满洲的第一步却不得不因此而中止。日本尤其痛恨策划三国干涉还辽的沙俄，于是日本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企图报此一剑之仇。

日本为了宰割中国而驱使国民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准备，开始全力投入他们的“战后经营”。日本经过10年的扩军备战，1903年，军事预算比1896年增加1倍多，陆军以“师团倍增”为

目标，扩建13个师团，海军以"八、八舰队"为标准，即以战舰8只，巡洋舰8只为主力，并拥有百余只以上的补助舰只的舰队，经过三次扩充，增强近4倍。另外，又新增了骑兵和炮兵兵种。

而俄国此时也不示弱。《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各国陆续从华北撤走，而沙俄却仍然把10几万大军驻守在中国东北不肯离去。沙皇俄国甚至任命阿历克谢耶夫为远东总督，想把中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

这样俄国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冲突。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日英于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美国也不愿意让沙俄独占东北，这样日英美形成一个集团；而另一个营垒是干涉还辽的俄法德三国，法国与俄国已有同盟关系，而德国仍希望俄国卷入东亚的战争。这样日俄两国的战争实际上就具有世界意义。

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日俄战争也是从海战开始的。1904年2月6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突然袭击，日俄战争拉开了序幕。

日俄海军从当年的2月到8月在旅顺口多

次进行海战，结果俄舰损失重大。沙俄把同日本的战争赌注押在海军上，故由欧洲调舰队来挽回海军败局，但由于日本舰队的猛烈轰击而于1905年5月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

海军的胜利对日本人的鼓舞远胜于10年前对中国的胜利，因为俄国再弱，也是欧洲的强国；而中国再强，无非还是世界的弱国。日本敢于同欧洲强国决一雌雄，那对中国更不在话下。1904年的2月开始，日本陆军也展开对沙俄的进攻。一路自新义洲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凤凰城，进逼辽阳，扼制辽沈地区的俄军主力；另一路由海上登陆，攻占金州、营口，切断了俄军主力与旅顺口及海上之间的联系。经过激战，俄军主力不断败退。1905年2、3月间双方一共投入60万兵力展开沈阳大会战，结果日军进展不大，到开源、铁岭之后，双方呈胶着状态。

一个国家软弱无力时，总要闹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日俄战争是来自中国以外的日本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而日俄的这次战争却是在日俄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而且日俄两国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可是，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却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日俄在中国

疆场上厮杀，清政府竟宣称与日俄“彼此均系友邦”，甚至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清政府却好象一下就懂得了国际惯例一样，竟然宣告“局外中立”。

一个政府允许另外两个国家在自己领土上厮杀而自己却恪守“局外中立”，那么这个政府、这个国家的人民必然会遭殃。事实也正是这样，战争给盛京地区（今辽宁省）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正如该地区的报纸所记述的一样，日俄战争使该地区“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另一种记述：“自旅顺迤北，直至（柳条）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用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刈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

最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双方都陷入了困境。俄国国内有革命的危险，而日本也想乘好即收。

日俄两国都向美国表示了求和的愿望。1905 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争取在亚太地区的发言权，出面调停。日俄双方在朴茨

茅斯签订了条约。结果，日本取代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当时日俄双方交战时，日本国内盛传日本海陆军的辉煌胜利，而签订条约后，日本这次却没有得到一日元赔款，一平方米领土。日本国民很不满意。

实际上，日本虽然没有从俄国那里得到好处，但从中国获得了不少利权。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创办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作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大本营。1907年日俄两国又划分了他们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干脆吞并朝鲜，这样朝鲜就成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

日俄战争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许多权益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日本以后侵略中国的战争首先在东北爆发。

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趁火打劫，获利颇丰，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战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但是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并没有减慢，日本通过向中国软弱的政府提条件，通过扶植代理人，通过暗杀活动或搜集情报等行为来为大规模侵略中国作准备。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都卷了进去，无暇东顾。日本元老井上馨把大战的爆发当成日本国运发展的良机。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的间隙，企图以更大规模来实现其在辛亥革命时没有成功的向大陆的扩展。

1914年8月23日，大隈重信内阁向德国宣战，并以此为借口，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进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

日本出兵中国胶州湾这一行动同日本与沙俄的战争极为相似。日本同德国的争夺同样是发生在中国国土上，而袁世凯政府竟象清政府一样宣布“局外中立”，也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听任日军武装占领青岛及胶州铁路全线。日军所经之处，照样是“骚扰甚重”，“民不堪累”。

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总统，而终身总统，权力越来越大，下一步就是称帝了。但他

还有许多顾虑需要国际上的支持。日本摸透了袁世凯的心事之后，决定以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向他要挟。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置益向袁世凯软硬兼施，表示若不接受，那么就会发生混乱；如果接受，那么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世凯帮助。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第二号，日本要求延长在南满和蒙东既得利益的期限与规定新的权益，以实现“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第三号，日本要求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日本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日本提了几项希望条款。

二十一条要求更加强了向“中国本部”扩展的计划。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了前四号内容。

在护国运动的波涛中，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失败并最后垮台。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

日本选中了继袁世凯以后掌握中央大权的段祺瑞，想通过他来控制中国的全局；同时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偏爱”，又选中了张作霖作为日本在东北的看守。

在日本的鼓动下，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

继大隈重信后，寺内正毅组阁。寺内汲取前任的教训，对华不是象大隈一样赤裸裸的要挟，他总是打着“中日亲善”的漂亮幌子，实际上积极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并依然想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

从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西原龟三前后6次来华，经手贷款14500万日元，这些借款被称为“西原借款”。日本通过借款从中国获得许多权益。

日本获得了开采矿山权、修筑铁路权、发展电讯权。更使中国人民气愤的是，日本通过所谓的“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装备段祺瑞的参战军，进而控制参战军的指挥权，日本还以“顾问”、“教官”等名义，给段祺瑞政府派来大批间谍、特务、军国主义分子，加强对中国军事控制。

日本始终没有忘记它在山东的利益。当日本向中国提出霸占中国山东的各项权利的要求时，段祺瑞非常客气地表示“欣然同意”。段祺瑞的一句话成了日本的口实，日本老是不肯把山东交还中国。

日本非常精通钻空子的技巧，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不再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将俄国驻中国东北的军队撤回。日本心明手快，假惺惺地说要和段祺瑞政府共同对付新生的共产党政权。1918 年 5 月，日本和段祺瑞政府签订了所谓的中日海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协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不久，日本大摇大摆的把 8 万日军开进东北，进一步代替沙俄占领了东北北部地区。日本驻军随时都有可能挑起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寺内正毅看似执行了温和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当时的日本从中国获利远不亚于前任大隈重信。寺内下台时曾大言不惭地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

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日本和中国同为战胜国而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涉及到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日本代表团蛮横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而中国全权代表，留美归国学生顾维钧据理力争。日本竭尽其威胁恫吓之能事，让中国代表团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合法性。弱国无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得到体现，中国和日本同为战胜国，而日本却要从战胜国中国那里获得战败国德国原有的权益，受害者当然还是战胜国中国，这简直是一个国际玩笑，但这又是一个铁的事实。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凡尔赛和约》。

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坚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适应国内进步势力的要求，最终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启示。并非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顾维钧缺乏外交能力，也非中国人的智力不如日本人，而只是因为中国太弱，国内混乱。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国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就是钻了中国国内落后、割据的空子。日本政府总是利用中国国内各派系间的矛盾，而向其中的一方提出苛刻条件，以帮助这一方击败其它各方；日本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国发动战争，无一不是在中国国内最混乱的时候。因此，中国人必须团结统一求得富强独立，才能对付国外的各种侵略势力。这一点，直到今天对中国人都有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前，日本没有发动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但是这段时间内日本在中国获利并不少，这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及巴黎和会的有关叙述中明显看得出。但是，日本在这一段时间内，总是站在中国最反动的一方，干了不少坏事。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南京时，日本于1927年3月伙同英、美、法，对进入南京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击，打死打伤2000多

人，日本侵略分子欠下了南京人民第一笔血债。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占领济南。这时，日本害怕国民党军队危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就派1个师团驻守在济南城外，同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对峙。5月3日中日两国军队发生冲突，造成济南惨案。日军屠杀中国济南军民达一星期，使中国军民死伤达1万人以上。日本在济南的大屠杀是继旅顺大屠杀之后的又一个对城市军民行凶的大事件。日本占领济南城还没有满足，其后日本又派1个师团的兵力在山东青岛登陆。这样，日本在山东的驻军达1.5万人之多。

日本侵略者总是要选择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代理人。当日本人发现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对日本控制不服气的苗头时，就策划刺杀张作霖的事件，这就是把张作霖送上西天的皇姑屯暗杀事件。

日本在日清甲午战后，直到1931年前，总体上说没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但日本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是为大规模侵略中国作准备，日本"武国主义"道路并未改变，因此，只要时机成熟，日本就会继续其武力征服中国的

既定方针。

贼喊捉贼：柳条湖铁路被炸成了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导火线，清末废帝甘做日本的儿皇帝；远东战争策源地成型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飞上天空。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沈阳附近有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驻守，那么究竟是哪支军队首先制造事端的呢？

不出中国人所料，这起爆炸事件完全是日本关东军有预谋的挑衅。

1929年秋天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资本主义各国。这场危机的发生，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进行恐怖统治和残酷压榨；另一方面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准备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更残酷的掠夺。德国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则以其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成

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原料依赖进口，经济危机对日本的打击更大，此间日本各项产值急剧下降。工人失业，农民负债，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日本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就转而想通过武力扩张来缓和国内的矛盾。

日本把矛头直向中国东北。

田中毅一在1927年6、7月间的东方会议上，确定了“满蒙政策”，并制定要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开的方针。他们公然否认历史事实，胡说：“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田中向天皇的奏折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由此看见，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东北确系按既定国策办事。占领中国东北，日本既可以获得庞大的市场和资源，又可以作为侵略苏联和鲸吞中国的基地。为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政府及右翼团体在国内大造舆论，并大规模地扩军备战。到1931年，日本政府军费开支占其财政总支出的30.8%。日本还建立了一支23万人的常备陆军。

日本感觉到应尽快发动起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在东北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生意极不景气。因为中国的国民政府趁中国的统一势头，决定修建葫芦岛港来对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执行的五年计划缩短为四年。日本很担心苏联的势力伸入满洲北部。

日本准备明火执仗的侵略，可是总还要找一些借口。1931年7月，日本在吉林省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日本又借口日本参谋本部军官中村和随员3人非法潜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驻军处死的所谓“中村事件”，狂热地煽动战争，决心诉诸武力。

日本觉得仅凭上面两件事不足以挑起战争，就准备制造更为“有力”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的策划下，几个关东军将领策划了一个爆炸事件。他们计划：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火车即将进入奉天境内的柳条湖一段前的20分钟，制造爆炸事件，然后诬称是中国东北军所为，借以挑起战争。

当爆炸的余音还未消失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就贼喊捉贼，说是中国军队有意袭击日本驻军。于是，不宣而战，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使中国东北军不知所措，加以中国国民党政府态度模棱两可，所以日军进攻异常顺利。仅9月19日这一天就攻占了沈阳、长春、营口、海城、辽阳等13个城市。11月占黑龙江省。1932年年初，日军又侵占锦州。这样，东北近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成为日本的统治区，3000万中国同胞为日本当了亡国奴。

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欢呼日军的胜利。他们高兴地看到整个东北终于变为日本的国土，昔日梦寐以求的东三省终于飞向了日本人的怀抱。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受到欧美列强不同程度的谴责。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再燃战火，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注意的视线，同时也想在中国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附近给国民政府一个颜色来看，以恫吓国民党承认日本占领东

北为既成事实。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几路向中国的闸北发动进攻。中国驻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所部十九路军英勇抵抗。3月1日，大批增援日军到后，又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总攻击，中国军队败退。经英国公使调停，日军才答应停止军事行动。

日军同中国政府谈判结果，获得了比预料还要好的成果。通过5月5日的《上海停战协定》，日军可在上海驻扎并可扩大其区域。日本侵略上海配合占领东北，但仍然取得了胜利。这给日军增加了信心。日本在1931年底到1932年初，占领东北和侵略上海的战争成了日本侵略整个中国的实地演习。

法西斯势力在初期总是有很好的运气，希特勒派兵进驻莱因区，攻占苏台德区都没有受到国际上的坚决反对。

日本在初期的各项侵略活动频频得逞。日本先后同中国的清朝政府、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打过交道，这几个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都比較恭敬。日本以为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将来所建的政府必定要对其强硬。而从蒋介石

国民政府对日本占领东北的态度和在上海抵抗日本侵略的程度来看，日本觉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自己也不算冷淡。日本觉得从南京国民政府那里还是有油水可拿的。

而国际上的瓜分对日本也相当有利。国际联盟的绥靖政策同样垂青日本。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经过半年的“调查”，发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轻描淡写地说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东北是非法的，并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而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制裁措施。这样，日本又安然地逃过了国际联盟这一关。

占领东北是日本的最大心愿，然而却并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日本法西斯心目中的“武国方案”远远没有达到。

日军占领东三省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以何种形式统治这个地区。1931年4月，日本参谋部提出了三种统治方式：一是建立名义上受中国政府管辖，而实际上是亲日的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的独立的亲日政权；三是将中国东北直接纳入日本版图。

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

四郎等将领认为，东北是由关东军以艰辛的战争才得以占领的。既然是日本军队自己通过战争所得，那么中国东北当然应纳入日本国土；同时板垣觉得这样做也正好符合日本既定的大陆政策和田中奏折的精神。

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显得更加老练，更加阴险，本庄繁说他自己何尝不想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呢？并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能使东北相对稳定而又不会脱离日本的控制。所以，本庄繁认为采用第二种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目的。他还特别强调满蒙必须独立；满蒙须统一；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际上由日本控制。

于是，关东军着手建立“满洲国”，他们先后扶植起吉林、辽宁、黑龙江三个省级伪政权。关东军相中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做“满洲国”的傀儡，就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邀请溥仪到东北。关东军参谋板垣既想利用溥仪，又不想让溥仪拥有权威，就规定溥仪就任“满洲国”的执政，而不允许溥仪称皇帝。这样，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以长春为国都，更名为“新京”，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这

个政权名义上是中国人建立的，实际上执握实权的是日本文武官员，幕后操纵者是日本政府。

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又扶植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使中国境内继外国租界之后有了真正的“国中之国”。日本把“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之后，日本政府成为“满洲帝国”的太上皇，而溥仪则成了日本的儿皇帝。

“满洲帝国”成立后，日本出入东北，如同出入自己家门一样随便。在东北，日本的关东军可以驻扎在任何一个地方，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各处旅行、居住，日本人有了继续侵略中国的稳固基地。于是，日本又紧锣密鼓实行其下一步战略，企图在中国境内再寻找象“满洲帝国”这样的“国中之国”。

让华北步东北之后尘，日本对蒋介石基本满意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并没有停止过武装侵略。

日本认为侵占中国东北与其“武国方案”相差甚远。因此一个东北怎么能满足日本侵略者

的贪欲？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分子立即以东北为基地，以军事与外交相配合，力图向中国关内扩张。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进行了艰苦的长城抗战，但终因孤军无援，没能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日本攻陷山海关。

2月，日本关东军纠合伪军10万人，分三路进攻与伪满相邻的热河省。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军不战自溃，闻风而逃，汤玉麟本人把多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入200多辆汽车，逃往天津。3月5日，日军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

接着，日军在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又进犯长城沿线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冶口和古北口，中国守军虽英勇迎敌，但终因腹背受敌而撤退。日本随即占领这三个军事要地。5月初，日军越过滦东，占领冀东20余县，逼近平津。

日本的政治手段随时都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1933年5月31日，在中日塘沽谈判中，日方代表、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中国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的代表熊斌，完全接受日本的方案，在日方的威胁下，签订了中日《塘

沽协定》，协定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协定实际上默认日军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军可在那里自由行动。日军打开了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华北门户洞开。

1934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狂妄的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准备排挤美英等国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这就是《天羽声明》。日本还想继续侵略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1935 年 5 月 29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借口一起暗杀事件，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调出平津和河北，并禁止河北省内的排日活动。6 月 10 日，何应钦竟然口头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6 月 23 日，日本方面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之间，又签订了秦土协定：撤退察哈尔省境内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清除察哈尔省内的排日机关，这简直是何梅协定的翻版。

何梅、秦土协定的签订，使日军得以自由进

出华北5省。日本的下一步就是要在华北增强建立日本控制下的“华北国”。

担任策动华北“自治”的是受关东军委派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少将，他曾想以旧军阀头子吴佩孚为首脑建立华北5省的自治政权，但遭到吴的拒绝。接着，又策划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由于国内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宋哲元拒绝出任。土肥原贤二成立了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6年4月，关东军又在内蒙扶植德王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这两个政权范围小，远没有达到日本分裂华北的阴谋。

蒋介石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政权标榜中日亲善、防共等口号，给日本分离华北提供了可乘之机，但与日军最初计划的华北自治权相差甚远。

日本成立了两个华北伪政权之后，“冀东政权”成了日本控制的“满洲国”的经济出口地带，日本在华北设立电业公司、纺织工厂，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

然而，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并没有成功，

日本侵略整个中国的活动仅仅是开始。同时中国国民党政权也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日本策动华北的“自治”已经涉及到国民党政权的中枢地区。双方对这种现状都不大满意。在华北地区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战争。

芦沟桥的枪声：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日本在华北各地随处驻军，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唯有位于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和芦沟桥是北平通往南方的要道。

日本就是要在这条要道上大做文章。

1937 年 7 月 7 日晚，日军举行所谓的演习。演习结束时，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响，至使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方拒绝。在交涉中，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芦沟桥，并和中国芦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交火。

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是日本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此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要向中国发动更大规

模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发动政变，以使日本尽快走上战时的轨道。

桥本欣五郎拟定于1931年10月21日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杀死首相若规礼次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政权。这个所谓的“十月事件”虽然只留了个历史的空名没有爆发，但是同年12月成立的犬养毅内阁，却不得不启用荒木贞夫为陆相。这使日本政府的法西斯力量增强。

犬养毅内阁启用荒木贞夫，百般迎合军部的要求，但军部仍觉得这个内阁是累赘，决意要犬养毅内阁倒台，结束政党政治。军部连政党政治这个遮羞布都不要了。

政党政治结束后，1932年5月成立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内阁和1934年7月成立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内阁，名义上是“举国一致”内阁，而实际上是以军部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大杂烩，是走向军部独裁的过渡性政权。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率领1000名士兵发动政变，袭击内阁，杀死内相斋藤实和

大藏相高清是桥。但皇道派的政变没有成功，统制派对皇道派进行镇压，确立了统治派在军内的主导地位。

1936 年 3 月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受军部操纵，后来政府中的陆海军大臣竟然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控制内阁有了合法保障。军部的独裁是日本自上而下法西斯政权确立的标志。

1937 年 6 月，近卫组阁。此时日本政府内部为适应战时需要的调整已经完成。

侵略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随着日军在华北的渗透，日本的具体国策也随之出台。1936 年 8 月，广田弘毅内阁决定了全面侵略中国和称霸太平洋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该政策认为眼前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到此时显然已提上日程。

有了这个国策之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到 1937 年，日本军费支出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 40%以上。芦沟桥事变之前，陆军已有 17 个常备师团，共约 38 万人，预备役和后备役 160 多

万人，飞机2700架，海军舰艇190余万吨。小小的日本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充分说明日本侵略大陆中国的活动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国际上，日本也力图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企图建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1933年2月，日本借口国际上不承认满洲国而宣布退出国联，想在以后的活动中有更自由的立场。1934年12月，日本又借口华盛顿条约没有给日本以平等的军舰总吨位权，而决定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条约。这样日本排除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在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日本以亚洲和太平洋的领导者自居，并想同德国的法西斯建立世界性的防务体系。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初步形成世界法西斯阵营。这样，亚欧两洲最反动的势力勾结起来，一场世界战争在所难免。

中国国内的变化使日本难以维持在中国的统治现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10年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国民党以西安事变为起点，有可能走向联合抗日的通路。

日本在华北的分离活动也遇到困难。日本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成立“华北国”，宋哲元严辞拒绝，并且表示决心抗日。这样，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日本就决定按既定国策，以武力侵占中国。

日本不断向中国增派部队。1936 年 4 月，日本私自将驻华北日军增至 5700 余人。华北驻屯军不断进行演习，从白天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气焰非常嚣张。

日本对华北的武力侵略是有预谋的。据日本驻中国使馆武馆今井武夫透露，早在 1937 年 6 月，东京就盛传“七月七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柳条湖事件”的谣言，这充分说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决定的。

事实证明，日军在 1937 年 7 月 7 日所失踪的士兵并不象日军所怀疑的一样，是被中国军队打死的。而实际上，20 分钟后，失踪士兵就已归队。日军要侵略中国随时都可以制造出各种借口。

日军借机向宛平城内射击 3 小时之后，中

日双方才开始交涉事宜，中国军队答应从宛平撤军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日本蓄意扩大事态，谈判只是缓兵之计。

日本国内得知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立即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小有争议。陆相杉山元主张立即向中国大陆派兵，他狂妄地宣称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只要派少量精锐兵力迅速给中国一击，中国就会屈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认为应等筹足兵力和军费之后，再侵略中国。由于杉山元与石原对侵略中国的总体目标上态度一致，而只是在出兵时间上小有不同，杉山元终于使内阁决定了派兵案。于是，参谋本部决定从国内派遣兵团，并从关东军、朝鲜军中抽调兵团到华北。

为执行侵略中国的任务，日本新任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于7月15日制定了先攻平津，再占保定，然后在石德线同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

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南宛攻击，并对平津大举进攻。在战斗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阵亡，日军控制了北平。同时，日军又进攻天津，30日天津被攻陷。这样整个京

津地区为日军占领。

8月下旬，日本国内援军到达华北，为统一华北日军的军事活动，日军组成了以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为首的华北方面军，下辖6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1个航空兵团。

由于驻守保定地区的中国军队宋哲元和刘峙两个集团军战斗力极差，日军进展迅速，于9月24日占保定，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

在察哈尔战场，关东军成立了3个旅团组成的察哈尔兵团，由素有"剃头刀"之称的东条英机亲自任指挥官。东条部队作战相当迅速，9月27日占张家口，10月14日占绥远，10月17日占包头，从而控制了内蒙、绥远。

山西方面战场上，日军出动3个师团大举进犯。11月27日占太原，控制了山西的中枢地区。

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华中的战斗也随之开始，中日战争成为完全意义的全国性抗战。

正象日本侵略东北时又打响上海的战争一样，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也策划进攻上海。日本在中国戏剧性地表演，"九·一八"事变后9

个月“一·二八”事变爆发；而“七·七”事变后1个月刚过，日本就又挑起了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本就作好了全国战争的准备，日本认识到上海是中国中部的门户，必须控制上海。

8月9日，日军上尉大山率一士兵，乘汽车冲入中国虹桥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还击，并将大山及士兵击毙。

日本国内听到“大山事件”后，纷纷要求向上海增兵。8月13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国内派遣两个师团到上海。不久，内阁又将“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日本天皇在关键时刻常常起鼓舞日军及国民的作用，天皇下达敕谕：“朕之军人现正排除万难，致其忠勇。是不外敦促中华民国之反省，以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天皇的敕谕犹如一服兴奋剂，日军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为天皇卖命。

8月13日晚上，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守军突然袭击，挑起了“八·一三”事变，日本国内随即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下辖两个师团，两天后开赴上海。

起初，日本虽然增兵上海，但仍高唱“日满华三国间亲密合作”，想促进南京国民政府的“反省”。日本这样做，一是确实希望蒋介石南京政府能投向日本的怀抱，二是即使南京政府不会屈服，也可以使之为缓兵之计。

8月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正式投入战斗。担任防守任务的是以张治中为总司令的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中国守军利用网状工事顽强抵抗，日军暂时受阻。日中双方把上海都看得相当重要，日本又从国内增调3个师团，中国也把精锐部队陈诚所辖十五集团军调来，后又调来二十一集团军赶到上海。由于日军进攻势头猛烈，中国军队不得不后撤，11月9日，日军占领上海。

与此同时，在10月中旬日本又增调3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配合上海派遣军夹击上海、太湖地区。为统一指挥华中方面的战争，日军把原上海派遣军及新增部队合编为华中方面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由司令官松井统一指挥。华中派遣军向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退却。11月19日，日军占领苏州、嘉兴一带。

整个淞沪之战，日军投入兵力约30万人，

中国参战军队70万人，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伤亡也非常严重。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但日本军队作战能力要比中国军队强得多，日本有经验丰富的大将任指挥，战术较为灵活，而中国军队本来作战能力极差，加上在蒋介石忽战忽守的犹豫中耽误了不少战机，所以，总体上说日军仍然保持猛烈的攻势，而中国军队却只能是边守边退。

淞沪之战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攻占南京。松井认为占领南京，可以迫使中国屈服。

12月初，日军华中方面军动用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京。日本分路占领镇江、芜湖。12月8日逼近南京。日本军队于10日向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发起猛攻。日军从光华门两入南京，都被中国军队赶出。但由于日军几路大军同时出击，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南京守军突围过程中，大多数惨死于日军手下。12月13日，南京为日军占领。接着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国军队从此更加对日军憎恨入骨。谁向日军这样残忍的野兽投降，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首都成了日本发泄兽性的屠宰场。这不仅充分暴露了日军的凶残，这件事也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受到羞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愤恨。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将在以后的叙述中介绍。中国的首都南京被攻陷，但日军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仍没达到，日本认为还须对蒋介石的军队给以致命打击。

日本中国集团军大会战：近卫说他再也不和蒋介石玩了。日军尾大不掉，陷于汪洋大海

日军要武装侵略中国这绝对是事实，然而日军武装侵略整个中国，并不是要让日军控制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日本在作战初期，每打完一次大的战役，在停战间歇，总要偷着看一眼蒋介石的脸色，察颜观色之后，有意识地给蒋介石难看的颜色。

日本曾吹嘘要在三个月内灭亡的实际含义是通过对中国南京政府的部队给以致命打击之后，迫使南京政府就范。然而，当日军攻入南京之后，发现蒋介石并没有对日本屈服的表示，日

本在战争期间同南京政府的谈判不得不终止，这就宣告了日军前期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配合为辅，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对华政策的失败。

日本国内狂妄叫嚣再也不能等待蒋介石的最后态度了。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38年1月16日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

近卫第一次声明，说明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归顺日本失去了信心，想从中国分化出与日本亲善友好的"新生力量"。同时，也说明日本政府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日中双方都召回各自的大使，双方外交关系中断。

日本企图把蒋介石当小孩子玩，日本简直是在做一个游戏，日本举起拳头对着小孩子说："你到我身旁来，咱们一块玩。"而当小孩子不同意时，日本便说："以后不跟你玩了。"日本说话的同时，那只举起的拳头马上就要落在小孩子的头上。同样，"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实际含义是，日本政府不再以外交手段来解决日本

与中国的矛盾，日本表示一定要给蒋介石升格的。

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准备给蒋介石国民政府以致命打击。

日本在1937年底占领济南，控制山东大部分地区之后，计划向南推进。1938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两个师团把矛头指向山东南部的台儿庄，准备打开南北通道。

当时，山东南部是李宗仁所辖第五战区的防区，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驻守台儿庄。日军在空军支援下，以坦克先行，进逼台儿庄。池峰城部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决抗战，虽然损失很大，但最终还是迫使日军退却。中国军队的台儿庄大捷并不是说中国以实力或战术彻底击溃日军，而是指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狙击迫使日军退却，没有按预定计划南下。日军自侵略中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较大的撤退，这使中国军队有了战胜日军的信心。

日军为了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打开南北的通道，决定以华北方面军的4个师团和华中方面军的2个师团，南北夹击，进行徐州会战。

从1938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华北方面

军由北向南进逼徐州，并切断了陇海线；华中方面军由南向北，同华北方面军对徐州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但由于中国第五战区采取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战术退出包围圈，结果5月19日，日本只占领了一座空城，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早已转移。

徐州会战总体上说是日军占优势，但日军通过徐州会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却成了泡影。

日本在徐州会战中没有达到作战的目的，于是就准备武汉会战，以击溃蒋介石政权的中枢部分，进一步控制黄河与长江地区。

日军大本营决定由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由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率5个半师团，从九江出发，沿长江两岸向武汉出击；由东久迩亲王率4个师团，从合肥出发，两路进攻武汉。

日本两路军在向武汉进攻途中受到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的狙击，等到日军两路进入武汉时，中国军队早已撤离。所以武汉会战只是武汉周围地区发生战斗，在武汉并没有大的战役。这样到1938年10月26日，日本控制华中。

武汉落入日军手中，但日军企图击溃中国

军队的计划又一次失败。

日本为了切断中国在南部的出口，决定组织军队进行广东会战。但日军并没有同中国军队发生大的战斗，到1938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

到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大城市、华中的主要城市及华南的出海口。日军看似达到了军事占领的顶峰。

但实际上，日军并没有按预计的那样顺利地占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法西斯分子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日军企图一举占领大城市，进而占领中国的首都，以此来使南京政府向它屈服。结果南京政府并没有听从日本的旨意，而是迁都作战。可以说，日本没有了解到中国的政治情况。

日军思想准备上也有严重的不足。日本求胜心强，急于求成，总是期望在较短时间内统治中国，每次战役都集中几个师团出击。这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以几个师团的兵力去攻击中国军队，完全有取胜的把握。然而，日本虽然喜爱中国的地大物博，但并没有真正懂得如何运用中国的地大物博。日本总以为当日军用全部兵

力出击时，中国军队也会以全部军队出击，这样，日军就可以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而中国军队却充分利用了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反正中国军队完全可以避开日军的主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带。

从形式上看，日军节节胜利，由华北向华南，由沿海向内地，“所向无敌”；中国军队丢城失地，好不狼狈。但实际上，此时日军已经孕育着失败的祸根，日军虽然占领了不少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但日军始终找不到中国的主力，只得间断性地向据点外出击，来维持他们的原状。日军没有更多的兵力去占领中国的更多的地方，而总体上只是占据了一个个孤立的据点，在据点周围都是中国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日本实际上陷于中国的汪洋大海之中。

太平洋上不太平：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计划变为现实

1941年12月8日清晨，象从前任何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一样，夏威夷群岛上的瓦胡岛显得异常平静。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和船只整齐

地停泊在小岛南部的珍珠港内，一架架大大小小的飞机排列在小岛的机场上。

太平洋舰队的美国官兵，有的正在船上漫不经心地吃早饭，有的悠闲自得地在岛上度假，一些军官和技术人员正准备检查。整个舰队好象是一个旅游团在尽情地欣赏太平洋小岛上的自然风光。“大部分水兵离舰，飞行员离开机场，炮手离开炮位，连雷达站也已关闭机器休息。整个瓦胡岛笼罩着假日的太平景象。”

然而，太平洋上并不太平，亚洲的日本早就窥视着这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并早已准备摧毁这个小岛的美军舰队。

太平洋上的美军瓦胡岛基地位于日本南方，日军确定向南进攻的战略是几年前的事。

毛泽东曾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明确指出：“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至两头都打。”毛泽东预见到日本肯定不会把其侵略局限在中国。

果然，日本军队在中国刚刚站稳脚跟，就于1938年7～8月间，在中苏边境挑起了张鼓峰事

件；1939年5～8月，日苏军队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参战的一个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觉得社会主义的苏联决不是昔日的沙俄，以后再也不敢轻易挑起日苏冲突，诺门坎事件动摇了日军的北上政策。

毛泽东还预见到日军北上南进“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进亚的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军的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预料的一样。

德国挑起欧洲战争后，运用“闪电战”接连占领几个小国，1940年6月，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也被德国攻占，日本看到德国法西斯的辉煌成绩，其独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就膨胀起来。

1940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基本国策要纲》，进一步提出日本的国策是要“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佑把“大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在“共存共荣”的旗帜下，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包括印

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所有地区和国家的殖民大帝国。这表明日本已将南进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积极准备夺取英、法、荷、美在南洋的殖民地。

日本为了稳住中国战场而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攻势，企图继续使蒋介石屈服，至少可以使蒋介石在近期内不大规模地出击日军；日本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又于 1941 年 4 月 5 日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暂时稳住了苏联。

日本乘英美穷于应付欧洲局势之机，积极和美国接触。一方面想让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现状和利益；另一方面想给美国施放和平烟幕，给美国造成一种日本不会同美国交战的假象。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苏联节节败退。于是北上论有所抬头，外相松冈洋佑主张先北后南，因为此时苏联正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而远东一带苏军空虚，应该北上，配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然后再考虑南下的事。这种观点被称为涩柿主义，就是说苏德战争未见分晓前出兵远东，好象摘涩柿子一样。而陆相东条英机则主张先南后北，他认

为先在南太平洋求得发展，等苏联支撑不住德国进攻时，再大举进攻远东，这就象柿子熟透后即将落地时去摘一样方便。这种观点被称为熟柿主义。

日本参谋本部觉得熟柿子要比涩柿子好吃，而且容易得手，也就是说日军抓住时机向南洋发展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

1941 年 7 月，近卫第三次组阁之后，虽然也主张先南后北论，并在中国东北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造成北上的假象，但近卫在和美国谈判中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而且近卫忽然又害怕开战后受到美国的严重惩罚，主张“先把中国事变加以解决”后，再执行先南后北政策。近卫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根本满足不了军部扩张的欲望。1941 年 10 月 18 日，东条英机组阁。东条曾在中国关东军中担任过高级职位，是侵华战争中的扩大派，有“剃头刀”的“美称”。东条一上台就雷厉风行，准备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不惜与美荷开战，并且决定了武装进攻的日期为 12 月初。

日本偷渡珍珠港的具体策划者是山本五十

六，这个人的事迹曾被拍成电影，为观众所熟悉。山本五十六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他对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作了精辟的分析。

山本认为日本的军舰和船舶制造不如美国，只能采用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而且山本还主张空军配合海军作战；作战必须先发制人摧垮美国太平洋舰队，夺取南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使美国没有能力和日本的空海军抗衡。

在进攻美军太平洋基地之前，日本海军作了精确的图上作战演习，演习以珍珠港为目标。因为珍珠港是美国海军太平舰队的活动中心，可以同时停泊各种类型的舰艇500艘，系有“太平洋心脏”之称。控制了珍珠港就等于控制了南太平洋。

山本五十六将偷袭珍珠港的任务交给了最强大的机动海军部队——南云舰队。11月23日，南云舰队秘密从千岛群岛出发，这支海军队伍拥有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重型巡洋舰，还有多艘驱逐舰、潜艇和加油艇。

这次偷袭珍珠港的最大特点就是日军行动的秘密。日军制造种种假象使美国方面一直以为日本的海军主力仍在日本内海，并且使美国

认为日军向南进发是日后的事情。日军偷袭夏威夷的计划可说是孤注一掷的大赌博，因为日军也不敢保证能否做到绝对保密。

而此时的夏威夷正处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美国舰队的马虎实在令人吃惊。此前，中国国民党特务已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秘码，但美国对此不屑一顾。12月8日这一天，美国一艘驱逐舰击沉了一艘日军的小潜艇，但美国舰队仍不以为然。当美军雷达兵发现有大批飞机向珍珠港靠拢时，美国的值班中尉却只顾欣赏音乐，他说："哪里会有飞机？没有的事。"说完话，就又抬起他的二郎腿重新沉浸于"音乐的海洋中"。当日本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一名美国军官还准备给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记违反纪律的处分。

日空军发现美军毫无战备，异常兴奋，就首先给日本国内发回空袭成功的信号。然后日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138架，猛烈地袭击珍珠港内的美军战舰和陆上基地。日军空袭5分钟后，美国才知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空袭，而不是演习。但此时，美军瓦胡岛机场被炸毁，大部分飞机不能升空。其后，美军大部分港内舰艇都中弹起

火。“整个珍珠港，上空日机穿梭往来，地面弹片横飞嘶叫，水上鱼雷纵横交错，到处硝烟弥漫，烈焰冲天”。瓦胡岛上的7个机场和主要军事设施立刻燃起熊熊烈火，腾起滚滚黑烟。

半个小时后，日军第二批171架的突击机群再次对珍珠港内目标狂轰滥炸，潜入港内的日本特种舰艇也以鱼雷向美舰发起攻击。此时美军的反击根本无济于事。日军达到目标后飞离珍珠港。日军认为大体上已取得了预期的战果，就没有按计划发动第三次空袭。日军袭击95分钟后，南云率领日本特遣舰队返航。

在这次偷袭中，日军投射鱼雷50枚，炸弹100余吨，损失飞机28架。而日军却炸沉炸伤美军的各种舰艇20余艘，击毁美机260余架，毙伤美军4500余人，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大大改变了太平洋上日美海军力量的对比。

日军终于创造了日军作战史上的最辉煌的战绩。日军的野心更加膨胀，日本国内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两个小时之后，才由天皇以沉重的语调宣读了宣战诏书，宣称日本的胜利“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统统大

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诚勇武之尔等庶众曰。”东条英机立即发表广播演说，强调“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12月8日这一天，日本电台一直在播送着充满兴奋情绪的节目，街道上到处有人在喊：“我们胜利了！天皇万岁！”

日本高兴得太早了！

日本作出南进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大赌博。日军大部分兵力被困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日军曾试着北上进攻苏联，被苏联军队击溃，于是日本认为不能先北上进攻苏联，而应南下进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苏联不好惹，那美国就好欺负吗？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真可谓是战争的痞子。他认为先北上进攻苏联，不会有大的战果，苏联和德国的战争胜负不定，那就等于去摘涩柿子吃，既不容易摘到，又不好吃；而他觉得先南下进攻美军才能立竿见影，建立显赫的战功，那就好比摘熟柿子吃，既容易摘，味道又好。难道熟柿子真的比涩柿子好吃吗？实际上熟柿子和涩柿子都不是那么好吃。

日本在太平洋上取得的只是一点胜利，只是吃了熟柿的一点皮，熟柿子里面不见得好吃。

美国舰队在珍珠港受到很大的打击，但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幸好没有停在珍珠港内而安然无恙，这为日后太平洋舰队的重建保存了基干力量。美军有了威慑力量最强的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队之后，马上就会向日军反扑。

日本能战胜美国太平洋舰队并不说明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于美国，而主要是得益于日本行动的诡秘和美军的麻痹大意。

与其说日军偷袭珍珠港是胜利了，倒不如说它走向失败了。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政府决定放弃"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方针，排除了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干扰，直接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行列。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参战，就会使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远强于法西斯主义势力。而且由于日军对美军太不够意思，激怒了美国军队。美国军队决心报此一剑之仇，对日本人的愤恨不仅仅是战争中你死我活的体现，而且达到一种民族仇恨的高度。美军一提起日军就恨得咬牙切齿，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美国最新制造的两枚原子弹，使日本国内大为震惊。美国终于重重的打了日本一记

耳光。

日本的“武国梦”就是要通过扩大战争来实现的。日本在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区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更使日军得意忘形，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人坚决主张不断扩大战果，他们在每一个战役结束之后，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每次都是坚定的扩张主义派。实际上，扩张总得有个限度。日军侵略整个中国，这已经使日军深陷于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无能为力的时候，却想通过南进而打开新的局面，那简直是无稽之谈。

日军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包括在日本所说的大东亚战争之中。太平洋战争中，一旦日军胜利，则需要抽调更多的兵力去巩固，因为日本面对的将是美国；而一旦失败，就会使日本损兵折将，士气不振。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日军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力量更加空虚，统治更不稳固。日本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确实会遭到被占领地区的反对．但日本“武国梦”的失败主要还不是因为受到被占领区的致命打击，而是败在其贪得无厌，不断扩张之上，那样下去会使日本由于吃得过快而噎死，或者由于吃得过多而撑死。

胜利的幻想："威尔斯亲王"号沉入大海，麦克阿瑟逃离菲律宾时说他"还要回来"，南云中一让丘吉尔出了一身冷汗

日军偷袭珍珠港只是太平洋战争的开始，日本的目标是整个南太平洋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日军对南方作战下了最大的赌注：陆军11个师，合40万人，空军出动飞机2300多架，海军舰艇230多艘，包括航空母舰10艘，主力舰10艘。

而盟军方面的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防御空虚，英国在香港、马来亚和缅甸的军队总共才有13万多人；美国在菲律宾仅有3万余人，荷兰在印尼（东印度）有3万左右的部队。英美荷的空军都是旧有飞机，并没有预备对付日本的力量。三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除了美国外，都是一般性的舰艇。英美荷盟军方面力量较弱主要是由于盟军"重欧轻亚"，轻视日军。

日本南方军把作战计划的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并准备随着战局的进展再进攻缅甸和荷属东印度。

日军进攻马来半岛的是陆军精锐部队第二十五军和第三航空集团军。而英国在马来西亚的部队只是常规性的防御。英国首相丘吉尔估计严重地失误，他认为即使从最坏的情况考虑，日军也不会在1942年春之前发动进攻。

日军对马来半岛的作战计划是空军轰炸和登陆作战齐头前进。日军的行动出乎丘吉尔的预料，在1941年12月8日拂晓开始，日军开始登上马来半岛。

英军急忙把在新加坡的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两艘巨型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调来，开往马来亚东海面迎战日本海军。但由于日本南遣舰队早有准备，并且掌握了用飞机进行鱼雷战的技术，英国远东舰队两艘主力舰还没来得及发挥其主力作用的时候，就被日军机群轰炸沉没。日军便夺取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

海战的胜利配合着陆战，日军在54天之内就全部占领马来亚；1942年2月又对新加坡猛烈进攻，2月15日，迫使英国驻新加坡的远东军总司令珀西瓦尔中将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攻的另一个重点是菲律宾。

日军计划以正面进攻的战术进攻菲律宾，即先用航空部队进行轰炸，然后登陆作战。12月8日到15日，日本陆军航空队连日轰炸，然后开始登陆，准备摧毁美军的主要军事基地。

驻菲律宾的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采取“实内虚外”的战术，即以战斗力差的菲律宾军队在沿海防御，而以美军防守马尼拉。结果日军三路登陆不用吹灰之力，直逼马尼拉。麦克阿瑟没有办法只得逃走，但他走时还留了一句话：“我还要回来！”麦克阿瑟是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说这句话只是为他逃走挽留一点面子；同时，也应当看到麦克阿瑟并不准备永远当败军之将，有朝一日，他肯定要重回菲律宾，做美国的有功之臣。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4月又占领巴丹半岛，5月美军总指挥官温赖特将军向日军投降。这样日军完全控制了菲律宾。日本占领了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远东政治军事基地，改变了太平洋战场的战局。

日军在进行马来半岛和菲律宾两个重点战役的同时，对太平洋中南部也展开了进攻。日军依然运用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然后大举登陆的

战术先后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及俾斯麦岛，并建立了不少小型的空军基地。

日军南方作战的目的，从经济意义讲，就是要控制资源。日本为了解决战争中出现的资源缺乏问题，对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早已垂涎三尺。

而荷兰由于是欧洲败国，在欧洲自顾不暇，因而在东印度布署的兵力很少，防务体系非常薄弱。日军在完成其它地方的战役任务之后，对爪哇形成包围之势，没有用太多的战争就占领了爪哇。

在东印度周围的美英荷联合舰队倒是作了一定的抵抗。但由于采取速战速决战，且以空军作掩护的日军来势凶猛，在爪哇海之战和巽他海峡之战中击溃三国联合舰队。

到 1942 年 1 月下旬，日军又占领了东印度周围的一些小岛，从而控制了整个南洋群岛，日军海、陆、空三军控制了西南太平洋。

缅甸是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交界地。日军进攻缅甸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切断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的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断绝美英援华的通道，孤立中国以使中日战争尽

早结束，同时也想促使印度反英。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经过泰国，并促使泰国与其结盟。12 月中旬，日军大举入侵缅甸，1942 年 3 月 8 日攻陷仰光。4 月初日军突破英军防线和美国史迪威中将指挥的中国军队交火。英军在曼德勒丢盔弃甲，抛弃大量武器，伤亡一万余人而退往印度，中国军队也向四边地区撤退。日军占领了缅甸，却没有余力进攻印度。

日军控制缅甸，切断了英美盟国援华的道路，同时对中国战场形成包围之势，对太平洋战场则起保护作用。日本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格局终于完成。

日本和德国曾准备在靠近非洲的印度洋会合以形成共同统领世界的局面。日本海军对此很有信心，因为日本海军从 1941 年偷袭珍珠港到 1942 年 3 月，从夏威夷打到新加坡，纵横西南太平洋却没有损失一只舰艇。日本海军在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战争中，同美英这样的强国进行海战，而又不损失一只舰艇，这是日军作战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世界战争中的奇迹。

海军中将南云中一一鼓作气，率领由 5 艘

航空母舰和4艘战列舰组成的日本航空舰队，首先空袭锡兰，英军东方舰队司令率领主力舰队逃亡东非，英军航空母舰"西米斯号"被击沉。接着又一路日军舰队开进孟加拉湾。这样日军控制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日军控制印度洋的消息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告诉罗斯福，日军控制印度洋就等于是切断了英美的石油通道。

英国首相丘吉尔只是被吓了一下。由于海军孤军出击，陆军忙于其它战场不能与之配合行动，海军只得退还。

英国缓了一口气，实际上整个盟军，乃至整个反法西斯同盟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减弱了负担。因为日军海军舰队离东非只有一步之遥了，一旦日军在东非找到落脚点，到时再同非洲的德国军队会合，那么世界法西斯的势力必定会更加猖狂。

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6月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战果辉煌。日本国内在这段时间内听到的只是胜利，感受的只有喜悦。日军统帅部也没想到会这样的顺利。日本人在想：照这样打下去，那日本统领整个亚太地区就根本

不在话下。日本“武国梦”的光环已在日本人心目中初具轮廓，而且光环的周围是玫瑰色的背景，日本人兴奋得难以名状。

一句俗语说得好：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日本笑得太早了！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频频传回日本国内，可我们必须搞清楚日军在这段时间内是如何取胜的。

论实力，日本的海军实力不如美国，对此山本五十六供认不讳。而日本海军取胜的窍门是偷袭，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同时对珍珠港、菲律宾、泰国、香港等地全面进攻，向英美荷劈头盖脸的打击。

日军战术运用也比较得当，日本的舰队都配有飞机作战。飞机在太平洋战争中给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每攻一个基地，一个小岛，一个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然后海军和陆军配合作战。每一战役都争取速战速决。

其实，日军取胜的更主要原因是英美对日军的忽视，英美估计日军要么不敢和他们为敌，

要么预计在 1942 年之后才可能受到日军的进攻。因此英美在整个太平洋上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如果美国稍有准备的话，那么日军别说占领太平洋南部有困难，就是一个珍珠港，日军能否攻下也还是个未知数。英国虽然主要忙于欧洲事务，但如果英国知道日军会进攻马来亚的话，英国肯定要想方设法抽调军队来对付日军。

可以说日军是赢了，但赢得侥幸，不会长久。日军除了在珍珠港给美国以沉重打击之外，在其它地区几乎都是把措手不及的英美军队赶走，而未能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的珍珠港尚保存了 3 艘航空母舰，其它战役就更是水过地皮湿的效应，最典型的一例是日军海军舰队在印度洋上作战时，英军东方舰队主力主动撤离，为日后作战打下了基础。

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是建立在英美的痛苦之上的。英美一旦缓过气来，必然要给日军更为严厉的报复性打击。日军树敌过多使自己穷于应付，显得手忙脚乱。

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6月，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日本侵略的地区成倍地增长。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的缅甸、马来西亚，东部与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接壤，北部直达阿留申群岛，南部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都进入日军帐下。如果再加上1937年占领的中国，总面积达3200万平方英里，约为地球总面积的1/6，按照日军“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还应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大洋洲国家在内。但是日本考虑到澳大利亚面积太大，如果占领澳大利亚就得需要大量的陆军去防守，那样的话，日军将陷入一个同中国战场一样的战争泥潭。虽然没有达到原来设想的那样完美，但日本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总算形成了。

“大东亚共荣圈”初具规模后，日本国内的机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对美英开战之后，战争代替了谈判，外务省大有“无事可作之感”，军部企图进一步侵犯外交权。1942年2月，日本海陆军、兴亚院和企划院开始讨论如何管

理大东亚。9月1日，内阁会议决定了旨在“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的《大东亚省设置案》。两个月后公布了《大东亚省官制》，设立大东亚省。

大东亚省包括了拓务省、兴亚院和外务省的关东局、东亚局和南洋局，并新设了4个局：总务局，满州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由青木周三负责大东亚省。

日本的大东亚省是管理整个大东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总体事务。由于日本在战争期间同大东亚区以外的国家接触不多，外交事务多是在大东亚内部展开，而大东亚内部的外交权为大东亚省控制，这样外务省就没有多少权力，必然要和大东亚省发生矛盾。而实际上，大东亚省也只不过是大本营的附属机关而已，大东亚地区的实际事宜主要还是由日本海陆军的武力来维持。只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稳定之后，大东亚省才有可能发挥其总体管理的职能。

按照日本最初的设想，大东亚省应直接管理“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各个国家的事宜。但实际执行中则有层次上的差别。第一种是直接统

治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域一般很小，只要驻守一定的部队就可以控制；第二种是建立所谓的“独立国”，实际上都是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最典型的是以溥仪为首的“满州帝国”，此外还有缅甸、菲律宾的伪政权；第三种是名义上的“同盟国”，如泰国，日本和泰国曾订立了十年期限的同盟条约，实际上，“同盟国”只是不得以而“同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听从日本的；第四种是日本已有的殖民地，如朝鲜、台湾，日本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最为稳固，在这些地区实行奴化教育，一般别的地方吃紧时可以抽调这些地区的部队去应付。

日本吹嘘它的理想方案为“大东亚共荣圈”，而实际上是“大东亚独荣圈”和“大东亚共贫圈”。说是独荣就是说日本单方面的繁荣，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是不相信日本“共存共荣”谎言的。

可是日本的脾气就是怪，亚洲人民不敢相信日本，可日本却逼着要让亚洲人民相信。对于那些顺从的羔羊，则加以培养，用他们来代替日本行使职权；而对于那些反对日本残暴统治的人，则进行无情的镇压。

整个大东亚的人民看出，日本哪里是在为东亚人民争取“共存共荣”呢？但日本却非要用刺刀逼着大东亚人民听从日本的领导，去给日本人服务，那样的话就叫做“共存共荣”了。

东条英机首相在1942年1月的帝国议会的演说中宣扬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共存共荣的秩序”。日本天皇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要“排除美英之暴政”，使大东亚人民“同享共荣之乐”。

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日本的大藏相曾说：“对于占领地区目前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并确保作战部队之自给。”东条英机更是直率，他说道：“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的战略要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

东条英机的演说真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为此，日本在占领地区实行了残酷的宪兵政治。把占领区中的英、荷国的资本收归日军，而日军又以“委任经营”的名义交给了日本国内的大资本集团三井、三菱。这样，日本军政当局

和日本企业对占领地区残酷掠夺，牺牲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味地强制占领区生产战略物资。日本在占领区建立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如“东洋开发公司”、“满州重工业公司”和“南洋拓殖公司”等。这些公司并不是一般的国际跨国公司，而只能是日本武力胁迫下对占领区经济掠夺的间接手段。

日本对占领区按照地区和资源类型分为所谓的“资源圈”和“补给圈”。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从属于“资源圈”范围，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未控制地区为“补给圈”。

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以资源类型“画圈”，这说明，当初松冈洋佑把“大东亚新秩序”改为“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需要，而有意的称为“圈”，而不是叫做“秩序”。一个“圈”字也暴露了日本企图包揽整个大东亚的一切事务，而决不容许亚洲以外的欧美国家染指。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在世界上宣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日本以领导者的身份对大东亚的国家指手划脚，轻则“好言相劝”，“百般拉拢”，重则“拳打脚

踢”，“棍棒相加”。这样的亚洲，哪里是“亚洲人的亚洲”，分明是“日本人的亚洲了。”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武国梦”的理想版图。实际上，日本“武国梦”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结束的那一刹那间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闪现了一下。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本土面积的100多倍，人口也是日本国内人口的数十倍。日本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大东亚长期地以武力统治下去。正如前面所述，日本野心急剧膨胀的结果要么因为吃得过快而噎死，要么因为吃得过多而撑死，日本国内首先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以武力构筑的工程。

亚洲人民，特别是大东亚（即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人民绝对不会甘心让日本这样的国家来奴役。各国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都不同程度地牵制着日本，使日本必然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即使使出浑身的解数也难摆脱在战争中遇到的困难。

更何况，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已不仅仅是大东亚地区的事。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所维系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德国的“欧洲新秩

序”同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两大营垒。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牵涉到英、美国家的利益，必然遭到英美的联合反对。而更重要的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是破坏整个世界和平的远东大本营，必然要受到爱好和平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弱点及在世界中的反动地位，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分崩离析，自身难保。

日本的“武国梦”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构成的“宏伟工程”。然而，综观古今中外的扩张战争，除了扩张之后被先进地区同化的那些战争外，有哪一场战争能使战争的发动国长久地保持住其扩张得来的辽阔疆域呢？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亚欧两洲，东起太平洋沿海，西至多瑙河流域。蒙古骑兵作战快速勇猛，堪称一绝，被欧洲人称为“黄祸”。当时的欧洲人一提起蒙古骑兵就吓得发抖。可是，蒙古四大汗国无一例外地在所占地区被当地的民族所同化。在今天的中亚和西亚等原苏联的亚洲地区，很难找到蒙古人的文化特征。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纵横欧洲大

陆，远征非洲的埃及，威慑拉美的海地。拿破仑这个响亮的名字令欧洲的神圣同盟颤抖不止。然而，拿破仑一到失败时，却败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滑铁卢一役使昔日英雄拿破仑失去了再展雄风的良机。

希特勒真可谓“世界军事奇才”，在欧洲东夺西突，南征北战，好不“洒脱”。希特勒的闪电战使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在不到一月的时间内沦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被希特勒打得不知所措。但是希特勒的德国第三帝国在10多年的征战中寿终正寝，毫无声息。

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终以失败而告终，那日本的“武国梦”就能用胜利来结束吗?

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后到1945年以前，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侵略战争，但日本好象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一位在全日本有绝对权威的英雄人物。其实，日本国内有绝对的权威，任何民族和国家在大规模向外侵略时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来领导，如果没有也要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日本的绝对权威就是天皇。天皇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日本人认为为天皇战争是绝对的圣战，是无尚的光荣。天皇在任何一个战役

前的讲话，犹如兴奋剂一样刺激着日本军人去卖命；每一个战役胜利结束时，天皇的讲话就好比是清晨的太阳，日本军人在太阳的沐浴下，就必须为太阳再创成绩。

绝对的权威只是在战争胜利的阶段起集中统一领导军事和思想的作用。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难以解决战争后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那作为日本人精神象征的天皇更不可能解决大东亚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困难。

战争快要构筑起日本“武国梦”的框架时，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却同时在拆卸着日本“武国梦”的高楼大厦。

一句话：日本“武国梦”起于战争，必定还要败于战争！

第四章 梦的幻灭

战争刚刚使日本“武国梦”露出一线微光时，就已险象环生，走向幻灭：战事的失利、武人的残暴、人民的反对、国内危机四伏、统治者自顾不暇……日本成于战争，必然败于战争

进退维谷：日本一只铁蹄深陷于中国，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本世纪最大的一次远征

中国战场上日军陷于深不可测的泥潭。

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的15个月内，日本军队侵略了北方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和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在华中占领了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在华南侵略了广州

地区。日本军队战线过长，兵力有限的问题立即出现。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以后，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了，只是间断的远离据点组织一些战役的进攻。

日本军队原计划在进入中国之后，用几次密集、快速的大战役摧毁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蒋介石政权听从日本的指挥。那样，日本就可以通过蒋介石政权来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采取了能打赢则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这种做法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投降卖国。因为中国军队的素质低、装备差，且各个部队的作战水平悬殊很大，不宜和日本军队作硬拼硬的战斗。如果那样的话，正好达到了日军所期望的状态，即日军可以集中几次大的战役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当然，并不排除蒋介石部队中有一些表现过于差的变节分子甚至不放一枪一炮，就丢城失地，四散逃窜。

日本决定于1931年进攻东三省只是乘国民党对共产党“围剿”忙得不可开交时作出的。1937年7月挑起芦沟桥事变也是害怕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抗日过早成为事实而发动了。国共双

方能否联合抗日直接关系到日本在中国能站稳脚的命运。

日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经过6次的谈判，在双方都作了让步的情况下，终于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编入全国对日作战的序列，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这支军队立即投入了直接对日抗战的行列。这样，国共合作等于给日军当头一棒，因为国共合作不仅使对日作战的军事力量增强，而且使全国人民都投入到反抗日军的洪流之中。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很松散，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担负着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艰巨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1937年9月开赴抗日战场。由林彪率领的115师的平型关大捷虽然不算大，但这样的胜利给日军进攻带来了困难，而给中国抗日军队以必胜的信念。日军板垣师团在以后的作战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全国抗战路线。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成为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我进、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特点"，结合中国大而弱的实际情况，得出中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的作战形式是"游击战"。"持久战"击中了日军在非本土不能长期作战的要害；"游击战"避开了日军的主力，而仍能给日军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作出上述决定的1938年年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也在湖南南岳对中日战争的战略作出重要调整："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战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看出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同时两人都对游击战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了这样的共识，就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抓住了日军的弱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游击

战（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有）并不是说正规战并不重要，虽然国民党军队不能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日军也不能随意地走出据点进攻中国军队。当然国民党军队确实有反共的倾向。在整个持久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异常活跃。八路军和游击队常常神出鬼没，给日军沉重的打击。1939 年 12 月，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被晋察冀军民击毙。日军感叹地说："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 年 8 月到 12 月，由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的许多据点被拔掉，军事设施、铁路交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百团大战的意义在于给中国军民以打败日军的信心。百团大战是持久抗战中，中国军队主动的、大规模的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的仅有的一次战争。

日军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所以日本企图在中国北方建立绝对的统治，以便北方处于相对稳定之中。

1938 年 11 月，日本大本营部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指出了日军以后的行动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特别指出在华

北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以“迅速恢复湖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的部分地区也要实行与华北类似的政策。

日本把其稳固区放在华北，而在华北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日军从华中、华南抽调7个师团和3个旅团，从而使日军华北方面军拥有15个师团，9个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1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同时，日军还以伪军编成各种治安队。

1939年4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宪兵司令佐佐木到一中将一起商讨制定了《治安肃正要纲》。在此纲要指导下，从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连续三次发动“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的建设”，以便掠夺资源，支撑持久战。

但是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对日军给予还击，多次粉

碎敌人的围攻和“扫荡”。

1941年，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没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样，日本就要从中国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叫嚣：“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的进行中，将以中国为兵站基地。”

从1941年春天起，日军把原来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更加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其目的一是要掠夺华北的战略物资，二是要给华北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致命打击，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能力反抗日本，以求得华北的相对稳定，支持太平洋战争的顺利进行。

日军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准备对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目的是要“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对“治安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设立“联合乡”、“集团村”，以其“掌握民心”；对“准治安区”，日军以蚕食为主，逐渐并入“治安区”。对“非治

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发起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摧残、劫掠和屠杀。

日军在华北、华中为加强其统治，想出了许多毒辣的办法，如“铁壁合围”、“抉剔清剿”、“分进合击”、“捕捉奇袭”、“反转电击”、“梳篦式清剿”等等，还想出一些奇怪的战术，什么“木刀子战术”、“掏水战术”、“单刀直入战术”等等；还造出以点、碉、路、沟为框架的“囚笼政策”。

日军在中国北方地区施用了各种各样的阴险手段，但并没有使日军在北方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日军的各个神经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始终屹立在日军的四面八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数量不断增加。

日军在中国北方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挣扎着，既想使中国北方保持稳定，以便使自己腾出手去应付别的战争；又害怕稍有疏忽而失去华北；日军深陷于中国的北方战场之中，想从华北

抽调军队，可又害怕华北出现乱子；想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可又无法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悄无声息地壮大，日军历次的进攻全被解放区粉碎。到1943年，中国八路军已具备了可以打退日军大举进攻的实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内欣欣向荣，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建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解放区的扩大，就意味着日军占领区的缩小，日军占领区不断发生经济危机，陷入极端困苦的处境。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943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的战役不多，但在仅有的几次战役如三次长沙战役、浙赣战役中，除了第三次长沙战役受到较大损失外，其余都以胜利而结束。但是日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胜利是局部性的，带有很大的突击性，一般完成一个战役之后，马上就退回原来的驻地。日军这段时期内，就每一个战役而言是胜利的，但就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来说仍然是失败的，因为日军在这段时期内所占地区并没有丝毫的增长，占领此

地，就必定以失去彼地为代价。

1944年春天，日军在中国北方开始受到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在太平洋上步步失利，但日本还想在中国大陆最后挣扎，还想援救其南洋的孤军。为此，日军急需把中国的京汉、粤汉、湘桂铁路联结起来，打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1944年4月18日，日军在豫湘桂发起了“本世纪最大一次远征”。

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打通了京汉线，以8个师团的兵力打通湘桂线，最后合力打通了粤汉线。8个月内的时间里完成这次远征似乎是绝对的胜利。

其实，如果说这次“本世纪最大的远征”，是在华日军的垂死挣扎，倒更合适些。

因为日军在作出这项大的行动之前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日军战略上的后备力量已完全用尽，要发动新的战役必须抽调其它占领区的兵力，以丧失其它占领区为代价；日军的军用物资，如弹药、器材都非常缺乏。

蒋介石的军队在这次豫湘桂作战中损失惨重，一败涂地；但从全局说，日军的损失要比蒋

介石军队还要大。

这次作战使日军连原有占领区的点和线都难于保持了。日军的铁路干线遭到破坏，华北、华中的许多地区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这时日军的背后是以15个以上的根据地为中心，拥有正规军47万，民兵200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且日军占领的空军基地，为美国军队重新占领。

更可笑的是，日军费了很大的气力打通了南北交通，但最终还没有来得及用。日军自称“本世纪最大一次远征”的这次冒险大作战，最终一无所得，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和引起占领区的瓦解。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难以脱身，日军的一只铁蹄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

败局已定：东条英机吃甜柿子吃出硬石子，麦克阿瑟欲报一剑之仇，不寒而栗的血岭、死亡之岛，山本五十六毙命。

东条英机认为先南进后北上才是日本在1941年的最佳方案，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熟柿

主义。在东条英机的熟柿主义指导下，日军在太平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熟柿的甜味赞叹不已，然而日军只是吃到了熟柿的皮，熟柿的里面却是坚硬的石子——日本遇上了难以对付的美国。美国早就注意到日本的行动了。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美国就曾出面反对；1932年1月，曾向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出照会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主义”；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的举动使美国大为惊讶；1939年德国发动欧洲战争时，美国更加憎恨日本在中国的行径。但美国那时只采取说教家的态度，即口头上不承认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结果。当希特勒要在欧洲建立霸权给人们带来巨大威胁时，也使人们对日本在大东亚建立霸权（即大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共荣圈）感到畏惧。日本和德意结盟后，美国把欧亚的两种威胁和美国所追求的更开放的世界秩序联系起来，感到由纳粹德国和武国主义日本支配世界的“魔影”将要出现。

1941年夏天，当日本要占领南越时，美国开始对日本采取石油禁运的经济制裁。日本面临着石油供应紧缺的严重局面，就决意要取得

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而要取得东印度的石油，必然要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发生冲突，于是东条英机上台后决定先发制人，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日本很清楚美国比日本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预计，如果日军快速出击，攻取整个西南太平洋，摧毁美国海军的有生力量，那么美国有可能因为恢复原来的元气有困难而不了了之。日本按计划在3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东南亚，从印度边界直到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等广大地区。

然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开战3个多小时后才向华盛顿宣战的恶劣行径，激怒了美国这个民族。美国人在国内秣马砺兵积极准备，决心报此一剑之仇。珍珠港事件一年以后，美国的军需生产相当于德、日、意三国的总和。

美国在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了飞机4.8万架，新建131个造船厂，其造船速度可想而知，而且生产的武器改为以进攻武器为主。美国政府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名正言顺地生产

武器，美国人的斗志也逐渐高昂。

日本对美国国内的变化一无所知，日本以为美国一旦大规模生产武器时必然引起美国人民生活的困苦，从而引起美国人的反战情绪。日本大本营预料，美国开始反攻最快也要在1943年中期以后。

1942年3月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顶峰时期。日本海军围绕东进、西进和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最后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东进论占了上风。

日军进攻的矛头指向中途岛。为此日军动用了海军主要进攻力量，调集了350艘舰艇，及1000架飞机。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对海军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但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已破译了日军密码电报，得悉日本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对中途岛加强了防御。

1942年6月4日，南云中一率领日军机动部队开始攻击中途岛。由于美国舰队有了准备，日军找不到轰炸目标，而在中途岛上空无目标地空袭。倒是美国的轰炸机多次成功地炸沉了日军的舰只。山本五十六接到南云舰队覆没的

消息后，决定有意撤退，以引诱美军舰队追剿，然后和其它海军配合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美国舰队指挥官斯普鲁斯上将没有上日本的圈套，主动撤离战场。

中途岛战役中，日本的4艘航空母舰被击沉，330架飞机坠毁。而美国仅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50架飞机。日本在太平洋连连胜利的趋势终于在中途岛之战中止。日军只保存2艘航空母舰，失去了昔日胜利的法宝——飞机。而美国却利用中途岛的胜利，加紧补充和增加太平洋舰队的实力。

中途岛之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意义在于，日本已无力再发动进攻，而美国却逐渐发起进攻。中途岛战役结束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主张乘胜对日军发起总攻。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中将罗伯特率领3艘航空母舰为主的1.9万名的海军陆战队，发起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进攻的战斗。由于日军的防守空虚，美国轻而易举的占领了瓜岛。

日军没有加强中途岛的防守是因为对美国军队估计的不足。日本大本营预料，美国转入反攻最快也得在1943年中期以后，所以，当美军

已经开始登陆时，日军还不认为这是正规进攻，而错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侦察性的登陆而已。日军估计的不足，使日军丧失了一次取胜的机会。

日军认为自己还是有能力收回瓜岛。从8月12日到9月14日，日军先后几次登陆作战，但都被美军的炮火阻止。日军伤亡很大，有一次900人丧生。另一次2700人被美军坦克葬身火海。日军在瓜岛的一座山岭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溪，这座山岭因而被称为“血岭”。

1942年10月下旬，日军在瓜岛南部向美军发起新的攻势，但美军的优势火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攻势。

日军企图从瓜岛的海战中挽回一些败局。起初日军确实给美军的打击不小。但从1942年11月中旬之后，日军在同美军的海战中损失很大。日军再也没有能力取得任何一点胜利了，而美国却掌握了瓜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这样，瓜岛上的日军不仅不能把岛上的美军赶出去，反而让美军给包围。岛上日军给养困难，援助物品无法接近。不久，岛上的日军只好吃树叶、草根和苔类植物，加上疾病流行，日军

所占的地区成为“饥饿之岛”、“死亡之岛”。

1943年2月，美军在瓜岛占绝对优势。日本大本营意识到难从瓜岛取胜，就不得不撤走那些已丧失战斗力的部队。

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这个小岛，虽发起多次攻势，但以失败而告终。

瓜岛之战使日军第一次损失2艘战列舰和38艘驱逐舰级以上的战舰，日军已无法再组织“以飞机掩护的大舰巨炮”战争。

瓜岛面积不大，由日军占领转为美军占领本身并不关键，而重要的是日美海军力量的变化。日军从此没有可灵活调动的陆海空机动部队。日美双方的攻守地位在此次战役之后完全倒转过来，美军由守势变为攻势，并开始具体组织反攻。

在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日军此时也开始撤退。麦克阿瑟指挥美澳联军对日本南海支队穷追不舍。不久美澳联军对日军所占领的所罗门群岛形成包围之势。守卫所罗门群岛的日军面临着缺乏弹药、粮秣的困境，所罗门群岛成为“死亡群岛”、“饥饿群岛”。

日军为了解救所罗门群岛，于1943年4月率领残余的航空母艘部队，发起了“伊号作战”，但作战却使日军航空兵力锐减。对日军最大的丧失是日本海军的缔造者——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前线视察时被击毙。

1943年6月10日，美国军队乘日军在岛上陷入困境之机，占领了所罗门中部数岛。

与此同时，日军在新几内亚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同样陷入困境。

美国在机动部队掩护之下控制了新几内亚北岸的制空、制海权，接着就以“飞跃战术”进行越岛作战。

这样，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上丧失了制海、制空权。

美军在中部太平洋上，在尼米兹率领下向日军所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大举进攻。1944年2月初，美国占领了马绍尔群岛东南西三面的重要岛屿，从而控制了整个马绍尔群岛，为美军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日军还想在与中国战场相邻的缅甸战场有所突破。日军不了解盟军的情况，侵入印度，想占领英普哈尔，以切断中印联络线。然而1944

年3月，日军在进攻英普哈尔途中困难重重，在包围英普哈尔时，自己反倒出现困境，粮食已吃光，弹药已用尽。日军5万余人因饥饿和战败而死亡。

1944年2月，日军在阿恰布被英、印军队反包围，损失严重；中国驻印军在盟军的配合下，在伊洛瓦底江歼灭日军；同时从云南来的中国军队配合作战，打通了中印联络线。

日军在缅甸战线的失败说明陆军已不再是无往而不胜。日本精锐部队被中国军和印度军打败。这说明日军的陆上作战也开始走向失败的道路。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开辟缅甸战线是为了扩大战果，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因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开辟缅甸战线而招来了战争上的不断失败。日本海军的失败开始于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两个战役；而日本陆军在缅甸也尝到了失败的苦头。

日军准备以发动太平洋战争来摆脱中国战场束缚的目的远未达到。相反，却使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对日军日益不利。日军犹如一条蛇，它企图吞大东亚这只象。蛇吞象的野心，使

日军吞进去，却消化不了、吐不出去，转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日军的铁蹄一只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另一只被美军在太平洋上砍折。只要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发起总攻，那么日军必然是跑着出来，爬着回去。

惨无人道：日军暴行令希特勒吃惊

日军的残酷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如果考察一下日军所干的坏事，就会发现日军的行为简直是野兽的行径，有些比野兽还残酷。日军的暴行令世人震惊，就是主张杀尽犹太人的希特勒耳闻日军暴行后，也大骂日军简直不能算是人。

日本暴行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屠城事件，日本以前在旅顺和济南的行径就属于这类事件。而日本屠城最典型、规模最大的是南京大屠杀。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进入南京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日

军杀了无数的无辜市民，在南京不少街道上堆积的尸体一望无际。日军对城市内的居民，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一律用机枪、步枪扫射，死尸遭射击后倒在地上摞在一起。日军为了消除罪证，用煤油点燃尸体焚毁。

占领南京后的第五天，日军把5.7万余人用铅丝两个两个地捆在一起，排列成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接着用机枪扫射，又用刺刀乱戳。仍然用煤油把尸体焚化。焚化后，把尸骸一个个都扔入扬子江中。

日军把俘虏驱赶到高13米的城墙上，然后用枪追杀，有的杀死后掉下城墙，有的是活生生的跳下去而摔死。

日军用砍头、劈脑、剖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剁等惨绝人寰的野蛮行为屠杀中国人。有两个日军准尉曾约定看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几天后，两人见面后询问各自的杀人数目。其中一个杀了105人，另一个杀了106人，但他们难以确定谁先杀满100个。杀了105个的那个家伙不服气，提出再比赛谁先杀满150个。两个家伙狰狞地冷笑着，然后提着被骨头碰钝、为鲜血染红的屠刀继续杀戳。日军的这种暴行令

人发指，不寒而栗。

日军在南京奸淫事件达2万多起，从10来岁的小女孩子，到50多岁的老太太几乎无一幸免，而且强奸后都被残遭杀害。

中国作家林语堂在谈到日军暴行时，说日军的行为连大猩猩都不如。他说道："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火，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林语堂先生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日军只要见到一个中国女人就决不会轻易放过。有一个中国妇女被日军轮奸37次，而被杀害；有些少女装成男孩子也被日军发现而遭奸污；有许多孕妇也被日军强暴；有一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孩子的妇女，被日军强暴，日军还在她的面前硬把小孩子活活地闷死。

日军在持续6周的杀戮中，中国南京居民及手无寸铁的士兵35万多人被杀。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日军的行为比一般的法西斯主义更惨无人道。

日军另一件比较集体反映其兽行的事是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细菌研究所，即日本自己所称的“七三一”部队，日军用中国人做各种试验，残杀3000多名中国人。

日军给强壮的中国男人吃进试验药品，来观察这种药品的效力；有许多人被放进满是跳蚤和臭虫的实验室而被害虫象蚕吃桑叶一样吞食；有的人被试验的老鼠咬死并吃掉；日军如新制造出一种化学武器，就必然要以中国人作为试验品，当日军看到中国人因毒气的感染而身体抽搐、呼吸艰难时，就哈哈大笑，以中国人的极端痛苦来取得他们的一时之乐；日军曾把中国一妇女的一只胳膊置于零下几十度冷却，然后再强迫妇女把胳膊伸进零上100℃的沸水中热处理。日军利用冷热的悬殊差异，残忍地将妇女胳膊上的皮肉撕下来，然后看着妇女疼痛难忍的表情而取乐。

日军在日常占领中也实行残暴的统治，对

其殖民地、占领区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迫害当地的人民。

朝鲜是日本占领最早的国家，日本想以朝鲜作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大陆兵站基地”。在朝鲜，日本绝对不允许有抗日活动；并对朝鲜进行种族同化，把朝鲜国民“皇民化”，把朝鲜“国语”定为日语，并要求朝鲜人象日本人一样取姓名，以做日本的“皇国居民”。

日本在国内成立“大政翼赞会”的1940年10月后，也在朝鲜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的法西斯组织，以此来把朝鲜人民置于日本法西斯的严格控制之下。

朝鲜男人被迫当“志愿兵”，去在战场上白白送死，或者被送往日本国内去干最危险最劳累的活；朝鲜的大批妇女被作为军妓送往前线，“慰劳”日军将士；朝鲜的各种资源都被日军控制，用于战争。

台湾是日本的另一个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政策类似于在朝鲜的政策。日本在台湾特别反对当地人民使用汉语、保留汉族习俗，目的是防止大陆对台湾的汉化。

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名义上是

独立国家，而实际的地位和朝鲜、台湾没什么大的差别，整个政权都操纵在日本人之手。日本关东军为了易于管理，把东北居民分成1万多个"部落集团"，有许多东北居民被征做苦力，象奴隶一样进行生产、修建的繁重劳动，根本谈不上什么人身自由。日本军队要比一些残酷的奴隶主更加残酷，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之后还得保证奴隶的最低生活水准，而日军让劳工完成一项工程之后，就以"保守军事秘密"为名，全部杀掉。

日本把中国东北视为其军事需要的重要基地。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会社"，控制中国东北的各个经济部门。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将许多工业产品都纳入了军事轨道中。1940年，日本占东北工业资本总额为80%以上；日本还设立银行，操纵东北的金融业；日本还向农民强征各种名目的赋税。日本在中国东北掠夺的钢、铁、煤资源和水、电等能源占日本国内生产的50～90%。

日本在中国关内占领区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以华制华"的主要表现是扶植中国人建立

伪政权，通过伪政权对中国控制和掠夺。日本在华北、华中先后扶植了几个地方性的临时性的伪政权。1940 年 3 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等叛国分子也粉墨登场，各任要职。

在汪伪政权管理辖地，日军建立了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并分设支部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日本还帮助汪伪政权建立了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伪军。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兵源不足，经常依赖伪军维持治安，“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

日军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用尽了各种把戏，前面已有叙述。日本在华北先后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经常组织“扫荡”，对新占领地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以战养战”就是指日军在占领区通过各种形式来满足战争需要。日本建立所谓的“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两个公司之下设立许多分公司，控制和操纵了

华北、华中的煤铁水电等自然资源和交通、信息网络。日军在中国农村强征捐税，掠夺粮食、棉花，并从农民中挑选600万青壮年到东北和日本国内从事苦役劳动。

日军占领东南亚后，由于兵力有限，一般得利用当地的反动政权来维持在那里的统治。日本占领东南亚的直接目的是军事战略的需要。日军经常强迫东南亚劳工营造工事、修筑铁路。日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泰缅铁路的修筑。日军利用战俘和劳工抢修，到铁路修完时，死亡的人达26万多，这条铁路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

日本从东南亚大量掠夺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用于日本军事需求。日本的口号是“迅速取得资源和保证作战需要第一”。日军就理所当然地以武力胁迫来无偿占有东南亚的财富和资源。

日本对殖民地和占领区的最大特征是野蛮与残忍。

侵略扩张是不正当的，屠杀无辜是不仁道的，那么，以受害者的极端痛苦作为自己乐趣的行为，就比禽兽都野蛮。

日本“开拓万里波涛，国威布于四方”及“八弘一宇”的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扩张因素在内；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标榜亚洲人民“共存共荣”，同样也是扩张的代名词。亚洲人民一贯不敢相信日本“共存共荣”的假话，但亚洲人民怎么也不会想到日本会在“共存共荣”的幌子下干出残害亚洲人民的那么多的罪恶。

郭沫若先生曾对日军的暴行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酿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的，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

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然而，日军的暴行必然要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谴责，受害者必然要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郭老进一步指出：“由我们的牺牲控诉了文明逆用者的超野蛮人——日本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象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

一个国家和民族侵犯另一个国家和民族时，必然要受到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形式

的抵抗。侵略和统治的形式越野蛮，那么遭到的反抗必然越强烈。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是常有的事，而象日本那样残酷地迫害沦陷地区人民的事件却是非常罕见的。

日本对亚洲人民的残酷统治形式，更加强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各国人民必然要由自发地反抗日军，到有组织地对日军发起攻击，直到把日军赶出自己的国土为止。

物极必反：亚洲掀起抗日浪潮

日军在殖民地的统治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逐渐趋于崩溃。

朝鲜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据点，粮食原料供给地和商品、资本输出地。随着战争的扩大，日军对朝鲜的资源和劳动力大肆掠夺，把朝鲜青年征调到前线去充当“肉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掠夺朝鲜资源，夺走朝鲜人生命，而且还要消灭朝鲜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说白了就是要消灭朝鲜这个民族。

日军在朝鲜的行为激了发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对日军非常憎恨。随着日军镇压的日趋凶暴，朝鲜民族争取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

朝鲜人民有组织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产生于中国东北。1932年4月，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朝鲜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抗日游击队。1934年3月，金日成把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游击队合并，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朝鲜人民革命军，从此，朝鲜人民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1936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成立了朝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会长金日成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纲领的号召下，20多万朝鲜各阶层人民加入，并在长白山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经常有目标地袭击日军。1937年5月，金日成以一个支队迷惑日军，同时自己于6月3日亲率150名人民革命军战士，趁着漆黑夜晚，跨过鸭绿江，突破日军封锁线，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日军占领的普天堡市，市内日军仓皇逃走。人民军焚烧了

日军的市政机关，并向朝鲜市民发表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6月4日，金日成率人民军胜利返回长白山根据地。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奇袭普天堡"战役。普天堡战役的意义在于鼓舞朝鲜人民继续进行反抗日军的有组织活动。

祖国光复会在中国东北活动的同时，还向朝鲜国内派遣工作人员，直接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在朝鲜国内相继成立广泛的抗日团体。在日军部队中的朝鲜士兵，一有机会就逃脱，去参加朝鲜义勇军。朝鲜国内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集体罢工，消极怠工，农民斗争有增无已。人民革命军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金日成成了朝鲜的抗日民族英雄。朝鲜人民在日军战败以前已使日军统治濒于瓦解。

在中国东北，日军常常受到抗日力量的打击。日本关东军虽然经常进行"讨伐"、"围剿"，但始终没能扑灭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日军刚占领东北时，中国共产党就组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各地的抗日武装合并为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关东军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抗联，但抗联仍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抗联有一首歌："天大的房子，地大

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1940年2月，杨靖宇率领部队在东北的蒙江地区同日军激战，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牺牲。日军奇怪抗联为什么有那样坚强的战斗精神，就解剖了他的尸体，结果却发现他的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整个抗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坚持斗争，后来配合苏联红军对日军发起总攻。

随着关内革命力量的成长，东北地区的所谓“满洲国军”也开始动摇，他们也在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下，将把枪口掉转对准日本侵略者。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已发生动摇。

日本在占领区的统治也开始出现危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吹嘘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声称把大东亚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这种动听的字眼，不过是掩盖其露骨侵略的政策的幌子而已。实际上，日本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掠夺物资以便继续战争，对占领区的民族，不仅不是解放，而是压迫。

日本的这种政策实施之后，遭到东南亚各民族的坚决反对，各国人民纷纷走上了抗日的

道路。

在菲律宾，日本扶植了亲日派政权，疯狂镇压菲律宾共产党及其爱国者，对广大人民残酷地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激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强烈反抗。

菲律宾共产党联合学生、宗教和华侨团体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表了十二项纲领。1942 年 3 月，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了有社会党、工会、农会参加的武装斗争组织——民抗军。

民抗军起初没有武器，没有弹药，兵员不足，战术不精，但它拥有人民的支持和反抗法西斯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有集中统一的纪律。后来，民抗军在战斗中夺取了武器和弹药，积极扩大组织。

民抗军在吕宋岛中部重新分配了亲日地主的土地，建立了解放区。虽然解放区屡经日军“扫荡”，但民抗军仍继续发展，在吕宋岛以外的岛屿上也建立了解放区。

菲律宾共产党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菲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项纪律等内容中有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痕迹。菲共要求

菲律宾民抗军学习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著作。民抗军最优秀的部队之一是由中国人组成的四八中队，四和八分别来自中国新四军的“四”和八路军的“八”。

这说明亚洲人民为了更快地驱逐日本侵略军，也互相吸取经验、互相学习研究，以正确对付日军的统治。“这是亚洲人民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国人民走向国际团结的一个光辉表现”。

越南人民在日军刚刚跨入越南国土时，就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

越南共产党把日本军队的武装侵略同世界法西斯联系起来，断言法西斯势力一定会失败、反法西斯阵营一定会胜利。1941 年 5 月中旬，在胡志明主持下召开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所有的爱国反帝群众组织，都改称“救国会”。“越南独立同盟”特别号召越南人民“学习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这说明越南的抗日活动也受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影响。

“越南独立同盟”做了艰苦细致的抗日工作，在越南各省建立“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在“越盟”的领导下，工

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农民也展开了要求种公田和反对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斗争。

胡志明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同日军周旋。1943年以后胡志明决定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越盟”的武装组织“救国军”不断袭击日军据点，从而使革命根据点的范围不断扩大。

“越盟”把赶走日本侵略军与建立全国政权联系在一起。随着德意法西斯的节节败退，日本法西斯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准备改变对越南的统治形式，1945年3月，日本利用越南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扶植起了一个伪组织——安南。“越盟”看出了日本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伪政权。

“越盟”把全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成立了越南解放军，改抗日根据地为解放区，并不断扩大解放区的斗争。“越盟”准备以全国武装起义的形式赶走日本法西斯，推翻反动政权。越南人民把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这是亚洲人民抗日斗争的创举。

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缅甸人民逐渐认识到日本法西斯宣扬的所谓“亚洲解放”完全是骗人的谎言。缅甸人民开始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1942年3月之后，缅甸共产党开始在缅北组织游击队，通过武装斗争，逐渐在缅中、缅西、缅南建立了小块的抗日根据地，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

1944年8月，为了争取缅甸的民族独立，缅甸共产党同其它反日团体联合，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自由同盟”是缅甸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分子组成的联合战线。“自由同盟”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缅甸革命军，号召缅甸各阶层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同盟”领导缅甸各地的抗日武装，经常袭击日军据点，破坏日军的主干线。日军在缅甸的统治岌岌可危。

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抗日的武装斗争。

马来亚共产党，号召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1942年之后，马来亚共产党组成了主要由华侨组成的志愿部队，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浴血奋战，坚持游击战争。

后来，各地的游击队联合成为统一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3 年，马来亚共产党又建立了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抗日同盟”。“抗日联盟”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国内民主政权结合起来，给马来亚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马来亚的抗日军多是由华侨组成的。马来亚和中国的抗日斗争遥相呼应，当日军占领中国时，马来亚华侨捐资捐物，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日军于 1942 年占领马来亚后，许多华侨又从中国赶来马来亚，拿起武器同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抗日有个转变过程。

日军以“亚洲解放者”的姿态，赶走长期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这使印尼民族主义者对日本产生了给印尼带来光明的幻想。但日军占领印尼后不久，其丑恶嘴脸就暴露无遗。印尼人民开始起来反对日军的残暴统治。

1943 年 10 月，日军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难以维持对印尼的统治，于是日军就变了个戏法，组成了印尼人为主的“卫国义勇军”，维持

日军占领区的治安，镇压人民的反抗。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日组织“全扫帚”趁机在“卫国义勇军”中建立秘密组织，同时联络其它抗日组织，积极展开抗日活动。

印尼工人怠工、学生罢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大部分都被日军镇压。

印尼资产阶级革命家苏加诺于 1943 年组织了“人民精神力量中心”。苏加诺利用这一组织进行合法斗争，力求印尼民族独立。但日军连这样的组织都不允许存在，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苏加诺又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但对日军打击不力。

印尼共产党虽然经常领导人民进行反日斗争，但由于日军对印尼共产党的大肆杀戮，使印尼共产党没有能举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大旗。

苏加诺虽然没有象共产党那样彻底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苏加诺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合法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经验，以后苏加诺成为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活动家。

日本建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到处都

有人民的反抗。日本当初设想的“大东亚共荣圈”本来还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由于日本战线过长而没有把其势力伸展到大洋洲，这是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时觉得不太圆满的地方。而实际上，日本更不圆满的地方在于从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那一刹那起就受到大东亚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

当初，日本扬言要让亚洲人民“共存共荣”，要把亚洲人民从欧美的残暴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果，日本统治亚洲人民的手段比欧美要残酷几百倍，亚洲人民所得到的是“共苦共难”。亚洲人民不能指望任何别的强力来解放他们，亚洲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解放者。

日本对大东亚人民残暴统治，激起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各国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都走在一起，成立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不少国家的人民在各自国家内的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的同时，还准备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

日本“武国梦”是日本为自己设想的一个未来的蓝图。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精心地去设计自

己国家将来的美好面貌的。然而，日本“武国梦”实际已决不仅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事。“武国”并不是说日本要加强和扩大自己国家的国防，“武国”是要以“武力”去侵略别的国家和地区，侵略别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劳动力甚至土地。如果别的国家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被日本掠夺走的话，那么别的国家的人民就没有生存的余地。别的国家的人民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起来，赶走骑在他们身上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

日本“武国梦”是建立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各个民族的极端痛苦之上的，亚洲人民清楚：如果日本“武国梦”成真的话，那么亚洲人民就永无出头的日子。无论如何，亚洲人民决不能让日本的“武国梦”成为现实。

殃及池鱼：日本变为兵工厂、军事大监狱

日本使大东亚人民遭受痛苦，这是事实。然而日本国内的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富强、自由和民主，日本人民得到的只是贫困、迫害与禁

锢。

日本为了满足作战需要，把全国的企业都纳入军事轨道，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脱离原来的生产轨道，而变为地道的兵工厂。

日本在战场上损失的武器越来越多，国内必须尽快生产出更多的飞机和军舰。但是，从1942年年底开始，日本已经把产品的生产、资金的投入和工厂的分配，压缩到民用生产的最低限度，而大部分转向了军需生产。再要让更多的工厂从事军需生产已十分困难，更何况海军和陆军互相争抢，海军需要大量的舰艇和飞机，陆军需要大炮和机枪。日本政府通过一般的强制手段已无法满足军事上的需求。

1943年9月，政府专门设立了军需省，首相东条英机亲自出任军需大臣，以便使各个工厂都尽最大可能生产出军需品来。军需省对于军需产业具有监督权，有权支配生产设备、劳动力、原料和资金，并可以用强力命令企业解散和合并。军需省还制订了军需企业法，为军需企业义务和权利作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强制办法，建立起了谋求五大超重点企业，尤其是飞机和船舶大幅度增产的体制。

政府尽力把各个经济部门统制起来，集中到军需生产上。从1940～194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中，大部分被用于军费开支和私营军需工业投资，而消费支出与国民工业投资额则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筹措资金用于军需工业，并强令中小型轻工业工厂改为军需工厂。

日本政府为了让更多的人从事军需生产，搜罗了各种可能劳动力，“除兵士以外，只要是能劳动的，直到最后一个国民，连战时粮食生产上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力也被抽调出来，从事军需生产”。从事军工生产的有农民、中小企业职工和城市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还必须固定在指定的军需企业中，被迫从事繁重的艰苦劳动，而且还要受宪兵的严格监视。

由于劳力不足，还实行学生动员和妇女动员。大量的学生被送到工厂中从事军需生产。据统计，从1944年4月到1945年止，约300万以上的学生被配制到战时劳动部门。政府甚至计划把学校改成工厂，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由于学生从事军需生产不是直接发工资，且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大部分学生有很大的愤懑情绪。于

是，政府特派监察员监视学生的“危险思想”。

妇女也被用来从事男人从事的繁重劳动，从1940～1944年，妇女从事军工的人数增加了约126万人。政府以“妇女勤劳报国队”和“女子挺身队”等名义号召未婚妇女走进工厂。妇女们同样从事危险性的职业，有的还得到煤矿去当矿工。

甚至一些聋哑人和盲人也被征用参加劳动。

然而，日本片面强调军需生产出现了许多危险的征兆。

日本的煤、生铁、钢铁、铝等基本物资的生产在1943年达到顶点，而从1944年起已开始锐减；消费资料的生产，从1943～1944年完全陷于崩溃状态。

日本的自然资源本来就缺乏，随着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盟军对海上封锁加强。日本把南方占领区的资源运回国内非常困难，甚至于被截获。

日本军需生产出现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不断扩张侵略战争本身。日本政府把几乎所有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都集中到军工生产上，

军工垄断资本家获得了巨额财富，而生产出来的军用品全部消耗在战场上，不会回到再生产上去。战争经济的继续，不仅降低了非军事生产部门的产量，而且降低了军工本身。

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妇女被强制在军工企业中固定生产，并承担繁重劳累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非熟练工人，其生产效率并不高。广大新加入的工人虽然受苦受累，但并没有给军工企业带来多少起色。

日本的经济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暗流。“经济崩溃使战局陷于绝望，对战局的绝望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崩溃”，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日本国内的农业也发生严重危机。

大量的农民被征入伍或进入军工厂当工人，1940年到1944年农村劳动力减少100万人。由于日本当时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全凭农民的双手进行生产，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农业产量的降低。加以农业必需的肥料非常贫乏，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稻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根本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日本曾试图从东南亚的稻米产地泰国和缅甸运出稻米，但

由于南洋各地为盟军控制，运输极端困难，不能解决国内的粮荒。

日本发生粮荒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大部分人民的挨饿，大部分家庭的贫穷。

在战时，日本大部分人民受苦受难，而仍有一小部分人却趁机渔利，大发横财。地主在国家权力的帮助下，让佃户把地租自动送上门来，而且收到的地租不仅仅是法定的范围，还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国家的农村政策，更加强了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依靠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坐享清福。

日本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大垄断资本家手中。随着战争的扩大，经济统制的加强，以四大财阀为首的垄断资本更加集中，巨大的垄断资本逐渐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这样，统制经济并没有有效地有计划地统制，而无非是国家权力与巨额垄断资本集合。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提高他们的统治地位，使他们获得最高的利润，巨额垄断资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保护下，“通过在军需生产中对于被征来从事强制劳动的人民进行奴隶主式的剥削，通过国家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通过接受政府发给的各种

补助金、奖励金等财政资助，利用通货膨胀政策，由国家负责补偿的指定拨款以及其他无数种办法，攫取了在平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的庞大利润”。

日本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的动乱，工人农民的赤贫和地主大资本家的暴富。这种情况在同一个社会的存在决不会长久。

与此同时，日本人民的人身自由也根本谈不上保证。

垄断资本借战争需要的名义得到了“神话般”的财富，大地主不劳而获，享受着高额地租，官僚和军人利用天皇的权威和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盘剥国家的财产。而普通家庭则毫无自由可言。有的家庭，丈夫、儿子和父亲都被抓去当兵，去做炮灰和“肉弹”。日本国内的人民，不论是在家里，在工作场房，在田地里，在学校里甚至在街头和路上，都受到宪兵、警察和帮凶组织的监视，还要受互相告密的居民组织的制约，“耳目被蒙蔽、喉咙被堵塞”，有的被抓去做苦力，有的象农奴一样在田里耕种，还得交纳重税，强制储蓄和购买公债，遭受通货膨胀的榨取，依靠最低要求的衣食来勉强度日。日本人民

呻吟在大日本帝国这个“大军事监狱”里。

战时，日本国内的基层组织非常森严。各地都设有各级翼赞会和翼赞壮年团，还成立警防团维持秩序。当时群众痛恨地把翼赞壮年团称做狗屎。最可恶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所谓的“邻组”，日本人民都按居住地区，每十户成立一个“邻组”，还定期召开大会，其目的是为了支持战争，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动员和统治人民。“邻组”内有严密的监督网络，谁要是不支持政府就要被骂为“国贼”，一般群众如果不小心说上一些不满意政府的报怨话，就会被告密，被宪兵队传讯、搜家，重者还要进监狱。

日本人民常常遭到宪兵和警察无缘无故的谩骂与殴打。

日本的工厂工人，实际上是学生、农民和小生产者，象在军事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劳动。工头随便打骂工人，但工人根本不敢有反抗的意思。工人一天工作甚至要超过15小时，但是赚的工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

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过着更为悲惨的非人生活。日本法西斯要比古代的奴隶主还要残酷几十倍，他们对中国人和朝鲜人

常常拳打脚踢，棍棒相加，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爱的鞭笞和泪的惩罚”。中国人和朝鲜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只能吃到一点点的食物。有的中国人实在难以忍受饥饿的折磨，就争着吃山上的野草，那些管头就残忍地把烧得通红的铁棒夹在中国人两腿之间硬是把他们活活地烫死。几百个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法西斯分子惨杀。只有一个叫刘智渠的人幸存下来，但由于长期在山林里生活，远离人类，等被救出来时，连话都不会说了。

日本国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大监狱，人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更谈不上。

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介都受到严格控制，绝对禁止发布“在战争时期足以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或者故意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日本新闻联盟”严格把关，甚至打着雨伞的照片和报道“闷热的下午”这类字样，也被视为暴露气象向敌人飞机提供便利，而不准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

各种新闻媒介极力夸大战果，以激励国民的“斗志”。新闻有意地夸大太平洋战争中美军

舰艇的损失，而缩小日本海军的损失程度。记者们提心吊胆，只能报道胜利消息，否则，稍不留神就会被政府判刑。

国内的舆论走向必须绝对符合作战需要。有个叫细川嘉六的人对世界时局作了一点评论，就被指控为有“共产主义”的嫌疑，而被逮捕。政府还捏造几起“共产党重建”事情，逮捕并拷打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全国的许多杂志、报刊，除了疯狂煽动和鼓吹战争的杂志外，都被勒令停刊。这时，最令人可笑的是，“连保持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了。有时早已保持沉默的人也被当作反战主义者而关进监狱。

战争时期，哲学家也必须跟上战争的节拍，煽动战争必须绝对地疯狂，绝对地响亮。一些为侵略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书籍由于叫嚣得不太强烈也被禁止。而只有那些为战争摇旗呐喊，“歌功颂德”的著作才能刊行。

此时，文学作品也放弃了文学的本来使命。文学的艺术价值根本不存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歌颂侵略战争的“丰功伟绩”，吹捧战争给人民将带来好处。

就连电影院、剧院也成为宣传战争的场所。

日本电影配给社专门粗制滥造了一些为培养“必胜信心”和鼓舞“士气”的“国策电影”。电影的格调低沉，内容单调，观众们都不愿意看。但宪兵们有时会强制观众看下去。

至于体育、娱乐活动就更是要为战争服务。体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和锻炼可以作战的兵士”。

整个日本国内的舆论气氛紧张而乏味，令日本人民感到窒息。日本人民的思想被禁锢，一切都得听政府的话，不敢有稍微的反抗。

“大东亚共荣圈”内的人民受苦受难，那是日本侵略者非常清楚的事；而日本国内的情景却是日本侵略者始料不及的。

日本为了实现“武国梦”，损害的不仅仅是日本以外的人民，而且还有日本本国人民。在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经济陷于崩溃，广大人民极端贫困，而且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言论思想自由。整个日本变为“兵工厂”、“军事大监狱”、“禁锢网”。

战争狂们说日本国内出现的险情是战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话确实不假。而问题是，日本如果要实现其“武国梦”，那么战争就会永远

进行下去，因为亚洲人民决不会屈服于日本的武力镇压。而战争的不中断就意味着日本国内危机四伏是要永远继续下去的。

日本国内危机四伏，其直接受害者便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决不会答应这种悲惨的景况继续下去。

战争本来就是个双面刃，在刺杀别人的时候，也必然要刺痛自己。而且刺杀别人越多越频繁，那么自己身上的创伤也会更加疼痛难忍，到一定的时候，还要肿烂、发炎，直到危及到自己的生命。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的侵略战争中，经不起战争考验的首先是战争的发起国本身。

反战厌战：日共以血求和平

既然在战争中牺牲的是普通人民的成员，承受战争带来巨大灾难的也是人民，那么人民就会厌恶战争、反抗战争。

从日本发起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起，就有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战争。

日本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并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共产党立即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人民反对侵华战争。日本共产党还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1932年8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片山潜在国际反战大会上，呼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共产党派党员到全国各地散发传单，号召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著名的共产党员渡边政之辅、小林多喜二等人就是因为反对侵华战争而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

日本工人阶级以各种形式反抗战争及战争带来的痛苦。从1938年到1944年，发生了4300多次劳资纠纷；1941年到1944年，日本工人举行了130次罢工。

日本工人反抗战争最常用的形式还是消极怠工。由于有宪兵、警察的武力威胁和翼赞壮年团、邻组的严密监视，日本工人进行抵抗的组织

和团体遭到彻底破坏，只能采取消极的抵抗方法，即不为战争服务，以最大限度的怠工来进行抵抗。

工会被取消，类似工人斗争的行动被剥夺，工人就以缺勤和怠工进行最大限度的抵抗。工人找出多种理由，以出外购买食物，安顿家庭，有的甚至以装病的方法不去工厂，有的长期缺勤。1942 年工人缺勤率为 10～30%；1943 年重要工厂缺勤率为 14.2%，1943 年 10 月到 1944 年 9 月是 20%，到 1947 年 7 月竟增至 49%。

比缺勤更严重的是怠工。工人名义上去上班，但并不认真做好手头的工作。在一家重要的武器制造厂里竟然发生了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器的事件。

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1941 年到 1944 年，租佃纠纷达 1 万多次。农民抵抗方式之一是抵抗征购粮食，他们故意不种国家需要的作物，而只种自己家需要的作物。有时为了凑足交粮份额还在征购农产品的草袋底层混入砂子。

日本国内的各种统治政策，使人民产生了消极的被动情绪，并力图逃避令人厌烦的“国家

生活”。

日本人民不敢向政府提出对生活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期望，但内心里却非常不满。他们在公共场合中，也不得不敷衍几句诸如“为国家效力”的话，但在背地里经常“窃窃私语”，报怨政府对人民的束缚。

各地的人民越来越不满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起初在“熟人”和“邻组”之间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憎恶、不满、恐怖、不安和希望”。人们开始对政府和军队产生疑虑，当时人们吃盐都非常紧张，可听说“在军队里连马也都吃糖”；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可又听说“警察局长在调任的时候，竟存有五包大米”。人们对政府和军队有一种特别厌恶的情绪。

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无能为力，但是，人民可以消极地抵制，正如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一样，“时至今日，对于统治者的横暴表示愤慨也是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其自然，置之不理。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就是对国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军内的反战、厌战情绪也随着战争的扩大而表面化。从1943年以后，军队里的逃亡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日本前线有20人投诚，1000

多人逃亡。1944 年前半年，40 人投诚，1000 多人逃亡。

士兵们滋长了对腐化的干部强烈不满的情绪，部队里故意殴打军官的事件不断发生。1942 年 10 月，日本驻中国湖北某镇的辎重部队第三联队第一中队的士兵，全体用棍棒殴打中队队官。1943 年初，日本驻山东省西北部馆陶县的华北方面军一个中队的 6 名士兵，由于平日对队长和其他军官不满，而手拿手枪和刺刀掀起暴动，队长和小队长被迫逃亡邻县的日军其他部队。有的甚至要刺杀东条英机。

发动侵略战争和残酷杀戮别国人民，“决不是日本的民族特点或者本性。先进的日本人，早就在中国华北前线为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了斗争”。1938 年，被八路军俘虏的 10 名士兵，在华北组织“觉醒联盟”，号召日本军人不要为日本法西斯卖命。日本和平人士野坂参三，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1942 年 8 月，在华北解放区召开了日本人反战大会，宣布成立“日本人反同盟华北联合会”。

“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部分是觉醒了

的日本俘虏，成员以“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和建设民主日本”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对新俘虏的日本兵进行教育，鼓励俘虏加入反战组织，有时他们还在前线协助八路军作战，采用“喊话、散发传单、投递慰问袋”等办法，呼吁日本士兵停止战争。这些活动瓦解了日本侵略军的斗志。

“日本人反战同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规模不断发展和拓宽，一些日本在役士兵也冒着可能被惩罚的危险来参加这个同盟。1944年，这个同盟又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延安还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教育俘虏，各边区还设有该校的分校，使其影响面更广泛。

许多日本兵被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所感动。虽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作威作福，烧杀抢劫，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对日本俘虏决不报复。八路军对日本俘虏态度温和，有的士兵希望回家，有的害怕处罚不敢回去而愿意参加反战同盟，就送他们到后方去。

八路军的原则是“只与日本帝国主义为敌，而不与日本人民为敌”。这些原则通过传单、墙

报等形式，逐渐在日本士兵中广泛传播。八路军不但不杀俘虏，反而还优待俘虏。反战同盟的活动，为越来越多的士兵所熟悉。有的士兵从前线逃向八路军方面，有的甚至故意被俘。日本军队中还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厌战烦战情绪。军官甚至忘了自己在国外的所谓“使命”，整天酗酒、吸毒，成群赌博，尤其是在中国战场的中后期，日本军队只能固守在据点周围，没有能力开辟更多的占领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积蓄力量，对日军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一些军官和士兵一离开战争，就没有更大的信心打下去，而只能听命于上级的指令，不准备有新的“建树”。日本军队的军纪越来越坏，在中国战场上“威风扫地”。日本将官制定了种种处罚条例，但是对乱哄哄的秩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一些日本人非但不参加日军的对华战争，他们反而加入中国军队为中国的抗日服务。日本医生佐藤猛夫，参加了八路军医疗队，帮助中国军医抢救伤病员。佐藤猛夫来自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来自日本的白求恩。和白求恩一样，佐藤猛夫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也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铭

记在心里。

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反对战争、厌恶战争是必然的。

首先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的侵略战争。普通人民只是由于在国家警察和宪兵的监视下，在官方漂亮言辞掩饰下，才不得不附和战争，听从国家的指挥去战争或为战争服务。实际上，每一个国民内心里并不赞成战争。人民最清楚，战争无论对战争发动国还是战争承受国，都是一场灾难。战争确实是起源于上层统治阶级的种种动机和目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然而，政治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广大的群众不敢指望，也不可能从战争中得到益处。

再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使被侵略国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战争发动国的人民深受其苦，过不上安宁日子。普通人都希望能生活得更美好，除了强盗和小偷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何况战争不仅仅是建立在被侵略国痛苦之上，而且还建立在侵略国人民的痛苦之上呢？日本人民所反对的最起码是战争这种野蛮的形式。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间接认识到战争的危害，还是直接体会到战争的痛苦，这里都把战争看作祸根。也正是人民反对战争、痛恨战争，才制止了一次次的战争，才使一次次的战争转为和平。

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心愿。日本“武国梦”变为现实的手段正好与和平背道而驰，而采取了战争这种形式。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可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和纠纷。但如果要把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作为手中随意摆弄的工具，那么这种幻想和冲动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

日本经过常年征战之后，人民的矛头也正好是指向了战争本身。

祸起萧墙：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首挽歌

“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剥夺的一种粉饰而已。由于在殖民地和占领区内，生产停滞，居民生活痛苦，这都激发了亚洲各民族的愤怒之情。越南有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菲律宾有“人民抗日军”，

马来亚有“反法西斯自由联盟”。各国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威胁着日本的军事统治。

日本政府不得因此而相应的调整自己的政策。1943 年 5 月底的日本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大纲开始注意到要对付盟军的反攻，必须“着眼于加强东南亚各国家各民族的战争协作，以贯彻大东亚战争”。同时，也不敢象从前一样对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运动只采取镇压政策，而不得采取绥靖政策，允许某些国家的独立和自治。尽管这种独立和自治很不完全，但要比日军直接的军事占领要温和得多。

大纲明确承认缅甸和菲律宾独立，承认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有步骤地自治。在此大纲指导下，1943 年 8 月，缅甸的巴莫政权成立。10 月，以劳雷尔为总统的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当然，此两国的独立是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它的外交权、军队编制权和统帅权则理所当然地仍控制在日本手里。但无论如何，日本总是从自己手里放了些权。

大纲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决定了召开“大东亚会议”，让“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

1943年11月5日至6日，日本政府召集所谓“独立国”的代表在国会议事堂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持，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泰国首相代表汪瓦塔雅根、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首相巴莫和作为观察员的印度非法政府首脑钱德拉·鲍斯。

会议为“大东亚共荣圈”大吹大擂；会议通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重复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乏味空洞的字句。

会议的目的在于夸耀贯彻战争的决心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世界性宣传效果”，而实际上事与愿违，会议充分暴露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内部分裂。按规定，各个国家的首脑都必须到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但泰国首相銮披汉在国内浓厚的反日气氛影响下，表示“拼着不干

首相”也不参加。日本政府召集它的傀儡都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更何况还要让各处傀儡唯命是从呢？

大东亚会议被宣传成“集中大东亚十亿人民的总意，为世界史增添了光辉一页”的成功会议。而实际上，会议除了发表一篇《大东亚宣言》之外，再没有别的效果。日本政府的本意是企图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但并没有能确定出阻止各地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任何具体措施。

日本政府很想以领导者的姿态狠狠训斥各个傀儡，让他们一定要配合日本侵略军维持好当地的治安。但由于战场上的一败涂地、政府里的互相扯皮，而只能发表“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首挽歌——《大东亚宣言》而已。这样，早在盟军进攻日本之前，“大东亚共荣圈”就已经趋于崩溃了。

日本法西斯上层内部也出现了裂痕。以打倒首相东条英机为目标的“倒机”运动在日本的高级官僚中酝酿着。

“倒机”运动的背景是“经济的崩溃，军事的失利，占领区各国人民的武装反抗，国内民众的不满”。日本法西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随着战局的恶化，人民生活陷入绝境。人民无形之中形成了对政府和军部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又集中于对既是军人又是政府首脑的东条英机的不满。但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的日本人民已没有能力组织一场推翻东条内阁的运动。

实际开展反对东条内阁的是统治阶级的上层。起初，近卫等一批重臣想把战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东条一个人身上，他们认为虽然要反对东条英机，但就形势看，近卫考虑："让东条继续搞下去比较妥当，如果更换以后战局能够好转，当然要更换。但是万一更换以后情况仍旧糟糕，那么就不如不换。因为东条已经和希特勒一样成了全世界痛恨的焦点，我想还是让他来担负全部责任吧。"

统治阶级中以中野正刚、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右派人物则公开反对东条英机，想把全国人民对于战争与统治阶级的不满集中于东条一个人身上。但当时宪兵队还能控制局势，把批判东条内阁为"天下以一人兴"的中野逮捕。

东条英机终于明白，痛恨自己的不仅仅是人民，而更可怕的是自己周围的官僚大员。东条

没有敢放松自己手里的权力链条，反而握得更紧了。1944年3月，当战局趋于恶化时，本来就是兼任陆相的首相东条英机，又借口保证统帅和国务的统一而兼任参谋总长，并让自己的心腹岛田海相兼任军令部总长。岛田海相本来就对东条唯命是从，在接任军令部总长之后，与东条更是形影不离，被人们称为岛田副官。从表面上看，到此时，东条把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一人之手，成为实实在在的独裁者。人们因此称东条内阁为东条幕府。

而东条英机自始至终都没有象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获得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东条英机最终也没有解决好国务与统帅的关系。他体会到，统帅权的独立给国务与统帅的协调带来困难，而统帅权又使陆军与海军分立。他觉得他虽为“肩负一国命运的总理大臣”，但是自己没有统帅军队的权限，尤其是陆军和海军的分立，更使自己难以驾驶。他经常怨恨自己被告知中途岛战败是在战败的一个多月之后。

东条英机没有能力自如地指挥动陆海军，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而东条英机万万也不会料到正是陆军和海军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自

己。

1943年9月，日本御前会议上提出了“绝对国防圈”的防御网。陆海军认为必须增加飞机的生产量，结果陆海军总共需要5.5万架，但是日本飞机生产能力最高只能达到4万架。于是陆海军为飞机的分配而争吵不休，但最后双方都把矛头指向东条英机，他们认为东条英机没有能调动全国的军工生产足够的飞机。

海军对东条英机尤其不满。1944年1月底到2月中旬，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并空袭到日本“绝对国防圈”的范围，海军反响强烈。同年5～6月，美军又占马里亚纳群岛，进入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海军又把怒气集中到东条身上。诚如一位大本营的中级官员所说：“东条大将最感棘手的，可以说不是敌人，而是海军。”

海军陆军与宫廷集团准备着反抗东条英机的活动，秘密策划“倒机”运动，与此同时德国也发生了“倒机”运动。

战争的前途是没有希望了。大本营在战争指导计划中已提出了和平问题。而战败的危机直接联系到国体的危机。对维护国体十分关心的宫廷重臣集团，认为现在的东条内阁对战争

的指导将使国体陷于危机，必须迫使指导战争的核心——首相东条英机下台。

东条英机感到形势不妙，企图尽其最后的努力，通过改组内阁来缓和对自己的憎恶和保持政权。1944 年 7 月 13 日，东条会晤了木户，表示有意改组内阁。东条还拟定了改组后内阁的组成人员，首相仍为东条英机，陆相也由东条兼任，但参谋总长不得不让予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东条的亲信岛田只任军令部总长，海相由泽本担任。

但此时幕后操纵日本政局的宫廷重臣集团包括元老重臣、皇族显贵、宫廷内臣，已经不允许东条英机改组了。他们对东条内阁的军事失败极为不满，害怕日本战败会影响到“天皇制国体”的延续。为了确保国体，维护天皇制，他们认为必须撤换东条，成立新内阁。

近卫起初想以东条英机负责战败的罪过，但是近卫逐渐看出让东条承担罪责是必然的事，而更重要的是维护“天皇制国体”。近卫从日本的长远利益出发，站在打倒英机内阁的前列，宫廷重臣集团以近卫为核心开始“倒机”运动。参加“倒机”运动的都是日本国内颇有影响

的大人物，海军方面有前辈元老冈田启介大将、末次信正大将、米内光政大将以及现任海军省教育局长高木少将、海军省总务部长石川少将；前任首相梅成的重臣层除了冈田启介、近卫和米内光政之外，还有若规礼次郎、广田弘毅、阿部信行、平沼骐一郎；宫廷势力方面有内大臣木户幸一参与；财界势力有藤山爱一郎、池田成彬、结成丰太郎。宫廷内外，上上下下的各种势力都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东条英机，东条英机纵使有千变万化的能力也穷于应付眼前的窘境。

重臣们一致结论是“东条根本就应该下台”。东条内阁终于在四面楚歌的局面下，放弃了重新组阁的打算，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英机以沉痛的语调宣告内阁总辞职。

如果从 1940 年 7 月 18 日东条英机担任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陆相算起，那么他已掌权整整 4 年，就是从他担任首相的 1941 年 10 月 18 日算起，他专制的时间也有 2 年又 9 个月的时间了。东条英机在位时间之长，独裁程度之高，是以前历届首相没有达到的。

但东条英机独裁远不如欧洲独裁者。东条自始至终都没有处理好国务与统帅的关系，没

有有效地指挥好海陆军。就是东条已有的权力也是借天皇的神威而得来的。东条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草莽之臣"，或许是长得短的草，只不过是被赋予了总理大臣的职责。如果没有陛下的光辉，他就不过"等于是个小石子"。

东条英机被赶下台是为了保存"天皇制"国体。

1944年7月22日，小矶国昭组阁。但是小矶内阁和"大机"（东条英机）内阁没有割断源缘。小矶内阁并不是宫廷重臣集团希望的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的内阁。小矶内阁有三条路可走：立即和平、一战和平和彻底抗战。最后经过天皇的批准，小矶内阁采取了一战和平论。所谓一战和平就是维护日本从战争中已攫取的利益，以体面地结束战争，即"保卫成果的和平"。

1944年8月4日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还亲自光临了会议，以增加声势。小矶谈到日本国民的思想状况时指出："眼下国内民心之趋向，斗志不够高昂，并未认识到国家和国民已处危急关头。如不战胜，则无引导国家国民摆脱现状走向幸运之途径；也没有把一切奉献给天皇的所谓捍卫国体精神的觉醒。"

小矶国昭认为必须取得一次大胜利。小矶想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能集中力量在军事上打一次胜仗，以使日本在有利的情况下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但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太平洋上的岛屿一个又一个地从日本的手心中飞向美国的怀抱。

日本大本营准备最后一搏，把赌注下在了菲律宾战役上，他们把菲律宾作战当做“豁出皇国兴废之最重要的作战”而拟定了“捷一号作战”方案。日军进行了没有希望的战争的战术，就是殊死的“特攻”。这种特别攻击，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去撞击“敌人”的一种荒唐战术。然而，这种“特攻”并未能取得胜利，相反却被美军打得焦头烂额。

日本的和平活动也限入僵局。

日本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出的《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还提出了在外交上“竭力利用苏联”，“对苏联维持中立关系，进一步谋求日苏邦交的好转，并努力迅速实现德苏议和”。

为此，日本派前首相广田弘毅以特使身份同苏联谈判，但遭苏联拒绝。日军在各地作战严

重失利时，1944年11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发表了谴责日本为“侵略国”的演说，这是对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大打击。这说明不但日苏中立条约将要作废，而且企图通过苏联来达到和平退出战争的道路也被苏联堵死。

日本还向蒋介石南京政府试探讲和。1944年9月，日本通过陈公博、周佛海同蒋介石联系，但蒋介石反应冷淡。后来，小矶国昭又派前外相宇垣一成到上海试探，也无结果。1945年3月，日本政府又通过汪精卫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同重庆联系。但是缪斌提出的方案，蒋介石政权不会答应，日本国内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未批准缪斌的方案。因为缪斌方案提到要日军从中国战场撤兵的事，这是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不能接受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到失败的最后关头决不会认输。

这样，小矶内阁既不能挽回败局，也不能求得有利的和平。此后，海军大将铃木组阁。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由任何人组阁都是无济于事的。

日本国内的战争体制在长期的战争中，不断腐化，以致烂掉。

当初，日本在发动战争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一浪高过一浪。在战争与不战争的较量中，战争论占了上风；在扩张与不扩张的对峙中，扩张论居于优势；在速战与不速战的交锋中，速战论取得胜利。日本国内的上层法西斯分子一个个变为战争狂，扩张迷。

日本政府的组成机构有其特殊性，就是内阁与军部的分立。内阁首相提出一套扩张方案时，军部统帅会相应地拓宽加速这个方案的实施；国内的军部还在犹豫不该发动战争或敢不敢扩大战争时，国外的将官就已经发动了战争，或者把扩大战争变为事实。

而日本的陆军、海军在执行中各行其事。陆军为了扩大战争会单独决定其攻取方向，而海军在作战中会忘了日本还存在陆军。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相互竞赛，看谁能扩大战争，看谁能早建大功。

正因为有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与机制，才使日本的战争由小胜到大胜，侵略范围由中国到大东亚，仿佛有一种“蒸蒸日上”的活力。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与体制，才使日本一败而不可收拾。海军失败，就报怨陆军配合

不好；军队出师不利，就骂军部统帅指挥有误；军部调度军需受阻，就指责首相调度不周。虽然首相并不是始终站在侵略扩张的最前列，但到失败时却成了众矢之的。首相只得对战争“责任包干”，而被众人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

不管是军部将帅，还是政府重臣，最后都一致认为应撤换首相，以体面地收拾残局。可是东条英机对内外危机无能为力，又怎么能指望小矶国昭有所作为呢？

发动战争的侵略者总是这样，当他们挑起战争一帆风顺，扩大战争胜利在握时，他们能陶醉于自我的喜悦之中而忘乎所以；而一旦战争失利，甚至注定要失败时，他们会指着别人的鼻子说，战败应由别人负全责，有时还会把自己挑起战争的责任一下子推到别人身上。

任何不正义战争的发起国，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日本的上层统治阶级在战争最后失败前夕就已腐化透顶，束手无策，只得任战争继续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一落千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共同对准日本

日本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与德意在欧洲的统治秩序同为世界法西斯的反动体系，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会受到整个反法西斯的盟军的反对，而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则更激起了盟军对日本的痛恨。

在整个世界战场上，到1943年初，战争对盟军越来越有利。

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打了胜仗，从而掌握了东方战争线的主动权，立即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上，艾森豪威尔指挥美英联军也转入反攻，同年5月，德意军队25万人投降。在意大利，因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激化和战局的恶化，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想依附美英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同年7月，意大利国王罢免墨索里尼，成立了巴多格里奥政权。9月8日，巴多格里奥政府向盟军提出无条件投降，法西斯轴心的一角崩溃了。

盟军此时除了仍把欧洲的希特勒作为主要

敌人的同时，也开始讨论对日军共同行动。1943年10月下旬，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就对德日作战的必要措施进行了磋商，当时斯大林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首次暗示，一旦德国投降，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

194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三大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共同宣言——《开罗宣言》。内容如下：

盟军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把满洲和台湾等归还中国；使朝鲜独立；将坚持进行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长期作战。

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德黑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会谈。会议谈及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苏联对日参战等问题。

日本面临着国际势力的包围不得不改变战略。1943年9月，御前会议作出的《今后战争指导大纲》，承认以前所采取的那种长期立于不败的政策战略已破产，而规定了新的方针：(1)以在1943年到1944年内决定战局为目标，确定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迅速增强决胜的战斗

力，尤其要增强航空战斗力；(2) 进一步加强同德国合作，同时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3) 迅速确定决战态势，同时强化大东亚团结。

别看会议通过的大纲说得头头是道，仿佛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抵挡盟军的总攻。而会议的参加者实际上都不敢保证这个“绝对国防圈”。军令部总长永野说：“今后如何不知道，对战局前途没有把握”。看来所谓的“绝对国防圈”并不绝对。

盟军的反攻趋势已经确定，那么日本的全败阶段也将开始。

1944 年 6 月，日本国内的战争体制失灵，人民的士气迅速低落；在欧洲战场，盟军开始实施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计划”；在缅甸战场，日军开始从英普哈尔总退却；在中国战场，侵华日军正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的第二阶段——相继作战；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国轰炸之下已经毁灭。

此时，日本战略上必须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核心而必须加紧防备的马利亚纳群岛已经暴露在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下。马利亚纳群岛距东京仅 3000 公里，如果美军占领这个

群岛，全部日本本土就将成为美国新式轰炸机B—29的轰炸区域。马里亚纳群岛对日美双方关系甚大。

美国非常重视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意义。美国联合参谋部决定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其作战目的是：切断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与日本本土的空中联系，切断日本同荷属东印度之间的海上运输线；轰炸日本本土，夺取空军基地；摧毁日本舰队。

美国派第五舰队司令官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指挥马里亚纳战役。美国投入了800多艘战舰，1000多架飞机和13万人的机动部队。

日本为了守卫这个群岛，陆军出动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海军方面动用了海军基地空军的全部兵力——第一航空队的1200架飞机。日军称此次作战为“第一号作战”。

1944年6月11日，美军用机动部队开始轰炸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结果，堪称日本空军主力的第一航空舰队倾刻之间便全军覆没。6月15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塞班岛登陆。守卫的日军与登陆的美军展开了长达20天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

重，日本方面的斋藤和南云中一以自杀来鼓舞士气，但日军终于抵挡不住美军的攻势而被美军歼灭。7月7日，美军占领塞班岛。

7月21日，美军以两个半师的兵力开始登上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关岛。美日双方连续展开激战，到8月10日，日军1.8万名士兵多半战死，从而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剩下的日军残余逃入密林。

7月24日美军向塞班岛以南的特尼安岛登陆，经过8天激战，该岛日军守备队几乎全部被消灭。

在美军进攻马里亚纳各岛的同时，日美舰队也展开了激烈的海战。结果日军方面的小泽舰队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出马里亚纳群岛。

美军终于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日本视为关系“皇国兴废”命运的作战宣告失败。美军立即着手在塞班、特尼安、关岛这三个岛上修建了好多个大型飞机场，从1944年11月24日起，美军以此为基地，以70架B—29型重轰炸机对东京狂轰烂炸。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结束后，美国一方面以空军部队向日本本土轰炸，同时盟军也在全部

战线上开始反攻，以便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后，美军利用神奇的“蛙跳战术”，从中部太平洋的新几内亚两方面直指菲律宾。麦克阿瑟认为首先进攻菲律宾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军方面也因为马里亚纳群岛的丧失，使日本的“绝对国防圈”陷于崩溃。日本不得不把“绝对国防圈”缩小到千岛群岛、日本本土、台湾和菲律宾一线，再集中海陆军兵力进行决战，这就是“捷”号作战计划。菲律宾、台湾、日本本土和千岛群岛的防御战分别称为“捷”一号、二号、三号和四号作战。日军把菲律宾作为最后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1944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日军为保护菲律宾安全发起了菲律宾周围的海战，结果日军损失惨重，而美国方面的损失却很小。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和尼米兹的中部太平洋部队，终于在菲律宾战役之前顺利会师，可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互相掩护。这就预示着日军面临的将是更强大的对手。

1944 年 10 月 20 日，麦克阿瑟的美国第六集团军 4 个师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从而揭开

了菲律宾战役的序幕。

日本大本营希望通过“捷”号作战，摧毁美国海军主力，以确保业已缩小了的“绝对国防圈”。日本计划，以小泽的联合舰队机动部队牵制和吸引吕宋岛以东的美国舰队。而栗田率领第一游击部队，进入菲律宾的莱特湾，袭击美国登陆部队。

日美双方的莱特湾大海战爆发。

10 月 24 日，美国哈尔西舰队先发制人，向日本栗田舰队突然袭击，栗田一下子被打得晕头转向，急忙向小泽呼救。于是，原计划不参加莱特湾海战的小泽舰队也不得不投入作战。哈尔西误以为栗田舰队已撤出战场，就求胜心切，转而去追击小泽舰队。

而栗田舰队的主力趁机绕道返回莱特湾，美国金凯德上将率领的第七舰队由于只是掩护型的部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攻。金凯德三次向哈尔西发出呼救信号，同时作必要的抵抗。

美国感到庆幸的是，哈尔西舰队终于打散了小泽舰队，从而急忙回援金凯德舰队。日本栗田舰队在莱特湾虽略有小胜，但是由于失去了同小泽的联系而心里发慌，又不明确美国哈尔

与舰队的确切位置，就作贼心虚不敢恋战而逃之夭夭。

这次莱特湾大海战打得扣人心弦，孰胜孰负，万难预料。但由于美国总体上处于攻势地位，一次次的良机都垂青了美国；而日本基本上处于防御地位，一个个的恶运降临在日本头上。莱特湾大海战是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之一。日本损失了24艘战舰，而美国仅损失6艘。日本损失惨重，以后，日本海军一厥不振，不但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就是应付普通的战斗都困难重重。

莱特湾大海战失败后，日本驻守菲律宾的山下奉文的第十四方面军，把所有部队集结于莱特岛。从1944年10月下旬到12月底，日军和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莱特岛争夺战。为了阻止美军的攻势，日军挖空心思，企图以“神风特攻队”来挽回败局。“神风特攻队”采用的“特攻战术”是日军飞行员和满载炸弹、鱼雷的飞机，一起与攻击目标同归于尽。但是这种自取灭亡的战术岂能改变整个战局。12月底，莱特岛被美军控制。

莱特岛丢失后，山下奉文的第十四方面军

退守吕宋岛避免与美军正面交锋，还企图采取日军从未用过的，也是日军最疼恨的战术——持久战。

然而，麦克阿瑟怎么能容忍把自己赶出菲律宾的日军继续占领菲律宾呢？1945年1月3日，美国164艘的庞大舰队指向吕宋岛，美军采用日本当初进攻美军基地的方法，先以飞机狂轰烂炸，然后进行登陆作战。3月4日，美军占领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不久，美军控制了菲律宾。

麦克阿瑟当初逃离菲律宾时许下了“我还会回来”的诺言终于兑现，其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

综观这段时期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会发现，美军节节胜利，而日军步步后退；美国恢复了固有的元气，日本丧失了昔日的威风；美国太平洋势力与日俱增，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每况愈下。

当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攻城略地，走洋过海，好不神气；现在，到失败时，丢城失地，四散溃逃，真是狼狈。

美军在这个阶段中以牙还牙，采取的战术与日军从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军在各岛的

“蛙跳战术”与日军在各岛的“同时出进”异曲同工；美军每当攻占一岛屿、一基地，必先以飞机狂轰烂炸，再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这与当初日本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在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宏伟工程”，眼下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其“宏伟工程”的倒塌指日可待。“大东亚共荣圈”的中枢——日本本土也危在旦夕。

负隅顽抗：本土作战，自身难保

日军丧失了菲律宾之后，日本西南太平洋的部队与日本本土完全孤立起来，海上运输线已被切断，使日本失去了南洋地区的丰富资源。1945年初，日本大本营分析到，美国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日本本土、满州和中国，但是日本有组织的战争最多能维持到1945年中期。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估计，美国将在1945年8、9月之前，甚至在6、7月份，切断日本同中国大陆的联系，对日本本土进行包围并进行登陆作战，苏联也可能对日作战。在此条件下，1945年1月20日，日

本大本营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指出日本本土防御能力很弱，只能在中国大陆和南方地区展开作战。为此，日本决定立即扩充陆海军，到秋季以前扩军240万，以进行本土决战。

1945年2月6日，日本把本土防御部队分为五个方面军。后又另设第一、第二总军和航空总军。第一总军由杉山元元帅指挥，负责防御本州中北部，第二总军由烟俊六元帅指挥，负责防御本州南部、四国和九州，航空总军由河边正三大将指挥，统辖本土和朝鲜的航空部队。4月下旬，又新设海军总司令部，由丰田副武大将指挥。

日本法西斯在最后失败的关头，还不肯放下屠刀，仍准备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美国在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发起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一是想报日军的一剑之仇，再是希望能吓倒日本，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出发点，起初是中国成都机场，后来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主要是马里亚纳群岛。从1944年底起，美国B—29型轰炸机开始大规模飞往日本本土上空。美国B—29型轰炸机的主要目标是日本航空工业和城市

工业区，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大城市相继被轰炸，一个个的炸弹在城市中爆炸。

美国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有加速日本战时经济崩溃和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重要一面，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美国的行为有些过火，美国的这种报复性的轰炸也使许多无辜的居民被炸死，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美国海军也把矛头指向日本本土的硫球岛。硫球岛距东京1200公里，由于其中继点的重要性，日本大本营把该岛列为本土防卫的一个环节。但是由于硫球岛飞机不足又远离基地，大本营不得不采取“利用坑道阵地进行持久血战的战术”。

美国于1945年2月16日先以轰炸机和军舰炮对硫球岛猛烈轰击。第三天，美军开始登陆，但由于日军抵抗坚决，美军前两次登陆以失败而告终。美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第三次登陆成功。登陆后美军坦克用火焰喷射器袭击退守在洞穴阵地的日军。最后，美军控制了硫球岛机场，把日本本土纳入其P—51型战斗机的航程以内。

美国军队又把进攻目标指向冲绳岛。冲绳

岛是硫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位于日本列岛、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是通向日本的门户。1945年3月2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当前的作战计划大纲》，把冲绳岛作战看做重点之中的重点。

从4月1日起，美军开始登上冲绳岛，然后向南推进。

为了阻止美军登陆，日本大本营立即组织日军进行反击。日本联合舰队这次反击，没有一架飞机作掩护。而美国方面却有280架轰炸机为美军舰队开道，经过持续两小时的轰击，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以后日本海军力量便在战争中消失。

其后，日本出动"神风特攻队"对美军反击，并造成美军15艘驱逐舰的损失。冲绳岛南部的日军利用坑道阵地作掩护，使美军无法接近日军阵地。但由于日军指挥官牛满岛想重建大功，竟然从坑道中跳出来，命令全体士兵向美军反击。美军乘机使用了大量的火焰喷射器，一股股熊熊的火焰射向日军，使日军士兵大量死亡。6月23日，牛满岛及残部在山洞里自杀身亡，美军占领了冲绳岛。

冲绳岛战役中，日军付出了9万人的兵员损失，岛上所有的居民几乎都成了战斗的牺牲品。美军伤亡人员也接近5万人，成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牺牲最大的一次。

美国占领冲绳岛，就等于打开了通向日本的门户。美军在冲绳岛战役中损失惨重，所以，美国在以后的战斗中更注意如何以较小的代价来向日本本土登陆的问题。美军对日本本土大规模空袭及后来两颗原子弹的投放，与此不无关系。

硫球岛和冲绳岛相继失守以后，日本战争指导部不得不作好在本土迎击美军的准备。日本按照1945年1月作出的《决胜时期非常措施纲要》及《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两个文件部署本土作战。

日本上层统治者按照大纲要求，陆续作了把全国人民直接投入战火的准备。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上，参谋次长还满有把握地谈本土作战的优势，他指出："美军依靠漫长的海上补给线而以重兵进攻日本本土的金城汤池，这就存在着本质的弱点，"而在本土迎击对日军有利，本土作战的优势在于"满怀保卫皇国的忠诚和

具有不可战胜的大和魂的一亿国民支援军队，和军队共同作战，以及绝对的胜利。”他还要求“把皇国的万物众生统通化为战力”，用“拼刺刀的战法”进行战斗。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还向全国人民分发了《国民抗战手册》，要求人民作好“参加抗战的思想准备”，还命令人民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协助正规军队作战。6月22日，日本帝国议会公布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必要时”可以实行召集。6月23日公布《国民义勇战斗统率令》，以上符合条件的人便被编入了义勇战斗队。

同时，日本政府还公布《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以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或进行处分。统治阶层此时对普通群众的欺压，再也用不着以任何漂亮的幌子做遮掩了。

统治阶层对于人民并不放心，他们准备对不听调遣的人随时镇压。因为他们老是担忧国民人心涣散，完全有可能造国家的反。但是，为了诱骗群众为政府卖命，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还是建议尽量不要用武力镇压，

因为那样“只能防止不良思想的表面化”。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国民思想，还必须同时借助于“软的方法”。

日本准备用250万的兵力和7000架飞机来迎击美军，以进行本土决战。其实，日本上层统治者也对本土决战没有信心，他们只是想借助广大士兵和人民的牺牲来求得他们偷生的良机或逃跑的掩护。

日本最高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国力现状及世界形势判断的基本大纲》，虽然承认日本“国力现状”在一切方面陷于悲观状态，但仍然规定要“加强皇国战场的应战准备”，“以七生尽忠的信念为力量的源泉”，“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等。

本土决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绝望之余，企图牺牲所有人民的生命，迫使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为维护天皇制打开一条活路而垂死挣扎。

统治阶级一方面让日本男女老幼全体国民充当抵御美军的炮火；同时，在离海岸最远的地方修筑庞大的地下要塞，为天皇和大本营逃跑做秘密的准备。有一些陆军军人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日本本土被攻占以后，将拥护天皇

逃往中国大陆，然后由在华的关东军和其它方面军的兵力继续抵抗。

当然，日本这些垂死挣扎的举措，与其武士道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日本武士道要求日本的军人尽最后的努力打击对手，不到失败的最后关头，绝不放下武器；如果胜利无望时，就必须自杀。

日本军人或一些浪人在犯了错误之后，常常以自杀谢罪，在被困绝望时，也常常以自杀表示其决心之坚忍。而自杀的方式最常见的是剖腹这种方式。一般多见于单个人的自杀行为，或者是两个人对刺的形式中。死于剖腹自杀的人最多，其例子不计其数。

日本军人也采取其它方式自杀。自杀这种方式实际上并不限于军人。

在太平洋战争的马利亚纳战役的最后关头，日本军人和居民就曾大批的自杀。在马利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上出现了惨绝人寰的情景，许多留在岛上的日本居民由断崖投向满是锯齿状岩石的浅海中自杀，有些人甚至先把自己的子女们亲手丢进海里，然后自己也跳海自杀。海里的岩石上血肉模糊，尸体四溅，惨不忍睹。有些

居民实在不敢再往下跳了，但是日军非要让他们自杀，于是，许多人抱作一团，合上眼睛，投海自杀，有的用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日军还接二连三地枪杀那些拒绝自杀的人。这样，共有1000人惨死。

在防守菲律宾的作战中，日军又创造了一种在自杀的同时还会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的惨无人道的“战术”。日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组织了“神风特攻队”，采用了所谓的“特攻战术”，以挽回败局。这种“战术”，就是让日军飞行员驾驶着满载炸弹、鱼雷的飞机，直冲对方上空，直到把炸弹快扔完时，再直冲对方地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机毁人亡。

与“特攻战术”相似的是“玉碎战术”。“玉碎战术”就是要求日军身上带着爆炸物品，手里拿着刺刀向对方阵地快速冲击，以炸毁对方的军队和阵地。有许多士兵是被迫下才自杀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自杀，把大批日本青年驱赶到死亡的深渊。日本法西斯分子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日本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上层统治者利用武士道的自杀精神来引诱或强迫日本军人为其卖命，而上层统治者

却趁机逃之夭夭。

这样看来，日本上层统治者本土决战的计划，与武士道自杀精神一样，以广大中下级将官、全体士兵和全部国民的殊死搏斗，来求得他们的苟安。倘若日本本土真要被攻下时，那么日本天皇显然是把日本人民扔下不管而逃走了。

日本上层法西斯当初野心勃勃，先后占领朝鲜、中国东北、中国大部及东南亚和中西南太平洋，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而到现在，日本上层法西斯分子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连自己的本土都难以保证。

希特勒驰骋于欧洲大陆，使欧洲列强心惊肉跳，而现在也自顾不暇，更何况其第三帝国？

日本发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其内心喜不胜收；而现在大厦将倾，能不悲乎？

死不认帐：《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最后通牒，铃木首相说公告不是件重要事，不予理睬

日本国内十万火急，积极准备本土决战。然而，美国并没有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对日本土战

役。美国之所以这样，是不想付出更大的代价，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

美国这样做是有其国际背景的。

1945 年上半年整个世界战场上的战局是：法西斯集团的盟主德国已被击败；意大利法西斯早已“弃暗投明”；法西斯的附庸作鸟兽散，纷纷倒台。欧洲十几个国家从法西斯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人民民主力量飞速发展。法西斯主要国家仅剩的日本也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面临着美军直接攻入本土的威胁，在中国战场上也开始败退。

1945 年 5 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开始转向东方，数百万美英盟军正在东调。苏联红军向远东集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崩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结束指日可待。

美英苏三国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决定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 年 7 月 17 日到 8 月 2 日，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第三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战争指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斯大林以及三国的外交部长及军方代表。

会议讨论了对德问题，三国确定了有关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德国战争赔偿及德国东部的边界线。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日作战问题。

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苏联因为尚未参加对日战争，故在8月8日对日宣战时才参加了这个公告。由于英国国内竞选，工党人物艾德礼就任首相，故《波茨坦公告》上英国方面的最后签字者是艾德礼。

《波茨坦公告》共13条内容，就其口气看是一篇劝降文告。公告头五条具有前言性质，指出："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如果日本不听劝告，则"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

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要求日本迅速全面地接受这一公告。

第六条主张驱逐军国主义；第七条指出为保证公告的执行而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第八条确定日本领土范围应“限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洲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第十条规定了对日本民族的方针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第十一条规定准许和平工业和禁止军需工业；第十二条规定，一旦日本成立民主的政府，同盟国占领军当即撤离。

公告的最后一条指出，“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波茨坦公告》意在要求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不可否认，在公告发布时美英苏三国各有打算。但公告总体上说还是鲜明地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主性质。一方面整个盟军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积极敦促日本投降，这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盟军方面已考虑到如何处理日本战后的民主问题，几个国家共同商讨，而不是美国一国说了

算。公告既是投降者日本必须履行的条件，同时也是胜利者同盟国必须遵守的条件。

《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在日本统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5年7月27日清晨，日本广播电台收到了《波茨坦公告》全文，为此，日本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应如何对待公告。内阁和大本营明显分为“主和”和“主战”两派。主和派认为，公告实质不是敦促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应以慎重态度对待盟国的最后通牒；主战派认为，公告过于荒缪，故根本不应予以考虑。

外相东乡研究了《波茨坦公告》后感觉到，其中有一种不同于盟国以往对日要求的绥靖的味道，故对公告既不能无条件接受下来，也不能干脆加以驳斥。因为他觉得由于苏美对立状况有可能使美国积极支持日本的天皇制，他发现美国对日本绥靖气氛在一些“对盟国的战争目的没有信心和对苏联怀抱恐惧与不信任的美国人中间已经大大增强”。

军令部总长丰田认为应该绝对拒绝《波茨坦公告》，并且有必要通令全国指斥公告，以资

鼓舞士气。

7月27日最高军事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先等待苏联的动静后，再作处理。会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不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都反对《波茨坦公告》中的民主主义基本精神，所以不想答应。而同时也看到美国确实有保持日本天皇制的“真意”在内，不应该一口回绝，而应看看苏联是否真的要同日本打仗和是否同意天皇制而定。

当天，内阁会议又讨论了该不该向全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最后商定全国各报社只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摘要，并将公告中向日本人民呼吁的部分，如“日军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及“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国家”等句子予以删除。一方面让全国国民对《波茨坦公告》产生坏印象，同时也使群众认为政府对公告不予理睬。

外相东乡等人以为是否承认《波茨坦公告》就要专看苏联的行动了。然而，东乡的主张，立即就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8月28日，日本政府、统帅部定期情报交

换会照常举行。东乡认为日本肯定将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事，即等苏联的动静，再做最后决定，所以就没有参加会议。

会上，军部在讨论中却过分强调了公告的坏处。军部一方面觉得经过多年的征战，而一旦承认了公告，就等于自己苦心经营的“宏伟事业”一笔勾销，很不甘心。

军部更担心的是，如果要想依靠美国的“真意”来挽救天皇制，那就非消除军部不可，于是，军部害怕被消灭，便在绝望中越发加剧了其歇斯底里的主战派论调。

到此时，主和派和主战派的对立，已经空前尖锐。在前一阶段，建立本土决战体制与和平事宜，尚可以在“国体”的名义下互为表里，并行不悖；现在，两派都在各自的运动法则推动下，进入了互相排斥，互相争夺“国体”的幌子的阶段了。

陆相阿南在前一天的内阁会议上也曾主张在发表《波茨坦公告》的同时，附上政府坚决不予接受的意见。最后还是接受了折衷办法，即政府只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是，当他看到，军部对政府“不坚决的处置”强烈不满而重新高喊

要主战时，就决定采取强硬态度。

陆海军大臣和两统帅部总长在召开情报交换会时，特把铃木贯太郎首相请来，他们对铃木说，如果政府对《波茨坦公告》不作任何表示的话，那么肯定要影响军队的士气。最后铃木欣然同意。

7 月 28 日这天下午，铃木贯太郎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说："在我看来，《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改头换面而已。因此，政府并不认为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对此应不予理会。"并声称，日本将"坚决地战斗下去直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铃木的谈话表明，日本政府已正式拒绝了盟国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铃木的谈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 月 29 日，各报就此大肆宣传，并通过对外广播网把"不理睬"《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向全世界。

外相东乡的计划最终落空，其"一片苦心付诸东流"。实际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主和派的东乡同主战派一样，对《波茨坦公告》的民主主义基本精神自始至终就未予理睬。他们要视苏联的态度而定，暴露了他们无视现实

和对于世界民主力量的无知。他们对人民的痛苦熟视无睹，只考虑保持天皇制的问题而使时间白白过去，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投降机会，白白地又送上了上百万人的性命。

日军在日暮途穷的困境下，已经不可能有新的起色。而且盟国方面的部队已齐集于日本周围，日本对此应慎重考虑。因为盟军在欧洲大陆默契地配合作战，已经成功地消灭掉一个最强大的法西斯劲旅——希特勒德国，现在盟军正在胜利的势头上，人数多，装备精，素质高。而日军却处于劣势，根本不可能抵挡住盟军的攻势。

《波茨坦公告》实际上给日本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日本上层统治者也清楚，他们肯定难以对付盟国的反攻。但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却更害怕盟国提出的民主主义道路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威胁到自己赖以生存的武力。

因为《波茨坦公告》一旦变为现实，则军部不复存在，大量的军队将被解散，日本统治者设计的“武国”道路将中途作废，一去不返。到此时，日本上层统治者还不想放弃自己武力扩张的政策。

当然，日本不想接受民主主义的道路，也与其传统的天皇道统观念密不可分。日本怎么也不想让天皇的权威受到一点点的损害。日本军人害怕民主，就如同美国人害怕专制一样绝对。日本统治者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仿佛一旦日本实现民主之后，日本就要亡国灭种一样。

日本上层统治者终于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这说明日本还不想放弃武国道路。

双锤定音：美国出手大方，白赠送日本两颗原子弹，苏联百万雄师跨过黑龙江，两强国夹击日本

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使盟国方面大为恼火。美国更是怒气不打一处来，苏联也想对日军小露锋芒。美、苏两国以不同的方式，为了各自的目的，都决定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看日本究竟还有什么能耐。

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实质上是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其实，公告已经作了较大的让步，其中最显著的一条是仍然承认曾经挑起战争的天皇法西

斯道统。而力主承认天皇制的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主张承认天皇制是充分考虑到了日本人传统的心理观念，但更多的是为自身的利益着想。美国觉得，如果苏联发起对日战争，那么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必然有一份功劳，那么苏联就有权利出来同美国争夺利权。所以，美国认为承认天皇制，完全有可能使日本人接受公告，从而避免苏联插手对日事务，而由自己包干一切。

但是，日本方面却觉得美国的让步还不够，日本对于盟国的民主建议断难接受，所以，日本竟一口回绝了美国的“一片好意”。

美国决定把自己刚刚研制成功的高新产品送给日本人，以观其效能如何。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广岛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突然，在广岛市上空出现了两架B—29型轰炸机。日本地面立即响起了空袭警报，但一般人总认为就这么两架飞机，肯定不是来大规模轰炸的，而仅仅是进行空中侦察而已，故照常行走如常，没有躲进防空洞，有的人还在眺望高空的飞机。当两架飞机飞到市区中心上空的时候，其中一架投下一个小小的降落伞，然后两架飞

机不慌不忙，扬长而去。

过了几秒钟，大约是8时15分，广岛市中心突然发生令人眼花目眩的强烈白光，随即便是天崩地裂、震耳欲聋的巨响，接着密密的浓烟笼罩了全市，熊熊的烈火立即燃烧起来。房屋、树木被焚而倒。等火熄灭后，全市完全变为焦土。死尸遍街，有的残骸还保存着死时的动作姿势。幸存者也因为烧得面貌全非，在痛苦地呻吟着。整个广岛犹如地狱一般，满目凄凉，目不忍睹。

广岛市民有36.6万人，遇难者17.7万，其中死亡和失踪9.2万，重伤8.5万人。全市建筑物7.6万幢，4.8万幢全毁，2.2万幢半毁。无论就危害规模，还是残酷程度而言，这次大爆炸是历史上空前的。

日本人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炸弹，更没有使用过这种炸弹。美国的“这件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美国这次使用的不是一般的炸弹，而是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威力。它长3米，直径70厘米，重4吨。如此尖端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无论投向哪儿，那儿

就会变为一片灰烬。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之后20天，就把第二颗“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日本广岛。

8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在广播中宣称，投在广岛的是原子弹，并恫吓说日本如不投降，还要继续进行原子攻击。

美国原定于10月份进攻日本本土，为什么提前两个月就进攻了呢？美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避免对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而引起的无谓流血。二是为了在苏联参战之前，以原子弹促使日本丧失斗志，以达到对日本单独占领。

但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并没有象美国想象的那样被原子弹吓倒。日本上层统治者确实被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害怕了一阵子，但日本上层统治者估计美国原子弹也就是那么一两颗，故仍然固守原来的本土抗战计划。日本大本营向全国不提原子弹爆炸的事实，只宣布投在广岛的是新型炸弹，要求国民不要紧张，以蒙蔽人民。

美国看到日本仍没有立即做出反应。8月7日这天，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日夜轮番轰炸日本本土。

8月9日，美国又向日本的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市民伤亡7万多人。

美国向日本连续两次投放原子弹自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原子弹这种带有放射性元素的杀伤武器危害的不仅仅是日本统治者，而且为此做出巨大牺牲的是日本无辜的老百姓。无论如何，美国的行为有些过火。诚然，当初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战争道义上说是耍赖，日本法西斯还残酷折磨了美军俘虏。那么，如果美国投放第一颗原子弹还可以原谅的话，第二颗的投放怎么也不能原谅。这倒不是说，美国制止日本法西斯有错误，而主要是因为原子弹伤害的都是日本的普通市民。

美国的原子弹当然也起到加速日本法西斯投降的作用。别看日本法西斯在国民面前嘴巴硬，其实他们内心里也发慌，总不知如何是好，日本上层统治者唯一的一点希望是希望佐藤大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有好的结果。

也就是说，光靠美国的原子弹还不能最终确定日本法西斯的投降，还得看苏联的行动如何。苏联在1945年2月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提到了苏联对日作战问

题。当时，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保证苏联将在德国投降两个月以后对日宣战。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又将苏联对日出兵的问题具体化。苏联为了履行对盟国许下的诺言，在法西斯德国投降后，就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各种准备。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暧昧姿态，也使苏联决心对日作战。到 1945 年 8 月，苏联在远东的地面部队已达 80 个师，170 多万人，海军 17 万人，总兵力约 187 万多人。

而此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仅剩 24 个师，1 个摩托化旅，9 个混成旅团，2 个坦克旅，总兵力约 75 万人。另有一些伪满和伪蒙军队，但他们的装备差，素质低，又不可靠，关东军的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也很缺乏。

8 月 8 日，苏联发表了对日宣战声明，指出由于日本公然拒绝《波茨坦公告》，苏联已不能容忍日本的法西斯暴行，故“从明日即 8 月 9 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的这一声明，由外长莫洛托夫亲手交给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日本的最后一线希望幻灭。

8月9日零时，苏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中国东北、朝鲜和库页岛的日军发起了全线总进攻，战线绵延4000多公里。

苏联军队由东、北、西三面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日本军队在中苏边境线上用坚固的碉堡组成的阵地，在两天之内全被突破，到12日，各个防御网都被苏军捅开了缺口。

日本关东军原计划在中苏边境及其后方阵地逐渐转入持久抗战，最后退往吉林通化和中朝边境进行持久战。但由于前沿阵地崩溃得过快，已来不及向原定地点集中部队。

防守最后阵地的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宫淳大将，改变原定计划，准备在东北平原中部同苏军殊死搏斗。没想到，此时由西面蒙古方面攻入的苏联机械化部队正以每日100公里的急行军向长春进发。12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急忙把司令部迁往通化，并命令中部平原的最后阵地后退。

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与饱尝日本殖民统治14年之苦的东北人民，也自动起来袭击日军，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

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传入东京。在日本政府的首脑部位引起反响，他们原计划把最后希望寄托于当晚在莫斯科举行的佐藤与莫洛托夫会谈上。

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部仍然按既定方针办事——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现在，由于苏联的参战，把有关进行战争的一切希望完全粉碎了。

以日本天皇为首，包括内大臣木户、首相铃木、外相东乡、海相米内等重臣和政府要人才决心结束战争。日本上层统治者害怕的不是战败，而是战败后将引起的国内混乱和革命。他们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穷困痛苦算不了什么，而统治人民的体制——天皇制如果要出现危机，那就了不得了。

苏联的参战，意味着苏联将在日后处理日本国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日本上层统治者清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很难容忍日本的天皇体制。现在，日本为了保护天皇体制，唯一的出路是，在苏军到来以前向美英投降，同将来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合作，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继续维护天皇的道统。

由于日本上层统治者清楚地看到了德国溃败以后已显露出来的美苏对立苗头和美国国内支持天皇制的倾向，所以，苏联的参战，使日本更坚定了向美英投降的决心。

此时，日本的主和派遇到从军部来的压力也减少。因为陆海军力量崩溃，已经相对削弱了军部在国家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在日本失去了海军、空军的战斗力以后，军部之所以仍坚持本土决战，是因为现存的陆军主力仍有持久作战的可能。而苏联的参战，使这种可能立即荡然无存。

虽然，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大本营马上就发出了对苏作战的命令，但这只不过是绝望中的最后挣扎而已。军部的命令已失灵。关东军被苏军打得狼狈大败，根本不可能按照军部的命令办事。由于苏联的参战，军部的舌根就软了，日本政府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向美英方面投降。

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对日作战，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日本决定投降。两方面的因素不能单方面地夸大。美国说，是原子弹吓坏了日本，而使日本投降的，其实，美国原子弹只是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崩溃的进程；苏联也觉得，苏联100

万的军队对日本才是实实在在的打击，最终使日本投降。其实，苏联军队如果没有盟军的有力配合，也难使日本投降最后敲定。

美苏两国的行动，使日本受到两个大国的夹击，而不得不宣布投降，以为自己将来投向哪一方做好准备。

强调美苏两国对日本投降所起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必须看清楚，即使没有美苏的这些重大举措，亚洲各国人民自己也要付出最大的牺牲，把日本赶出自己的祖国的。当然，美苏对日的联合行动又使亚洲各国人民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作鸟兽散：各国联袂驱赶日寇

在日本控制的“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区的各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美国向日本本土投入原子弹和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再也没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这样，亚洲各国人民借助苏联和美国两国的“东风”，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日本侵略军被驱逐而四散溃逃。

在中国战场上，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反攻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日本侵略军虽然死在临头，却仍然极端敌视共产主义，不愿向中国共产党投降。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立即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到来了。"

8月10日，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发布了大反攻命令，号召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它人民武装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并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11日，又发出命令，要求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日本占领区的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以迫使日军投降。

为了配合苏军作战，中国共产党命令吕正操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进攻，张学诗部向热河、辽宁进军；贺龙、聂荣臻部向内蒙及绥远、热河、察哈尔进攻，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它人民武装，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前线，向日伪军猛烈反攻。在整

个反攻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武装收复国土 31.5 万平方公里，解放 197 个城市，歼灭日伪军 23 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向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日军的军事打击，还在于对日军反动思想的威慑。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也决定乘机收复日本占领地区。8 月 11 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蒋介石指定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权负责接受日本投降问题。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帮助下，命令各战区调兵遣将，抢占和接受日本占领区。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抢占和接收的土地要比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更多。但是，若要从对日本法西斯的打击程序来说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更大。

从中国战场全局来看，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作用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国民党军队虽没有发动大规模对日战役，但毕竟国民党没有向日本侵略者投降，国民党大量军队在客

观上牵制了日军，是日军担忧的一支潜在力量。

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的最后关头仍垂死挣扎，但已经经受不住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方面的打击，而不得不逐渐集结，听任中国军队的发落。

在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交界的缅甸，日军也受到了重大打击，而不得不步步后退。

早在1945年初，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英美联军对日军发起进攻的支持下，也发动武装起义，也配合英美盟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曼德勒首先爆发了昂山领导的人民起义。接着又爆发了缅甸全民抗日武装起义，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同时向日军发起进攻。英美联军的进攻和缅甸的全民武装起义，使日军腹背受敌，不知所向。5月1日，缅甸人民解放了首都仰光，接着又继续收复日军占领地区，终于使日本侵略军狼狈逃出缅甸。

在马来亚，在华侨的带动下抗日武装力量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到抗战后期，民抗军已发展到1万余人，民兵数万人。全国一半以上的乡村解放，不少中小城镇也回入人民的怀抱。

马来亚的日军非常顽固，1945年8月后仍然拒绝放下武器，继续与人民为敌。马来来人民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肃清了顽抗的日军，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当时，在各个中小城市和一些大城市以及广大乡村，在原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并且成立了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马来亚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民族意识大大加强。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抗日活动，在初期并不激烈。因为抗日的领导权落入了态度软弱的资产阶级手中。但是随着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溃散，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热情也空前高涨。

1945年8月15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革命青年组织领导人在雅加达集会，讨论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应抓住这个机会，宣布独立。

8月16日，雅加达革命青年组织“卫国军”和后备军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准备第二天凌晨发动起义，摧毁日本军事政权，占领雅加达作为将来共和国的首都，并分头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起义做好准备。

虽然这次起义计划由于无领导核心和配合

甚差而落空，但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从日军手中夺取武器，没收日本控制的企业和农场，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领导人苏加诺鉴于人民力量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于8月17日公布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各国人民从日本侵略军踏上自己国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艰苦的抗日斗争。在苏联和美国的支持下，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程加速，以较小的牺牲，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自己的国土。

诚然，亚洲各国都是相当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武装部队的装备差、素质低、战术水平不高。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下，亚洲各国人民，不论采取何种形式，付出多大的代价，总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自己的祖国去。

令人惊喜的是亚洲各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的过程之中，逐渐走向联合。各

国人民互相学习、互相配合，在日本统治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内，每一个国家都毫不犹豫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亚洲各国人民行动统一，目标一致，绝不允许这个“领导者”再在自己的国土内胡作非为。

整个“大东亚”的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大东亚共荣”的首要前提是驱逐日本侵略者。各国人民有了共同的敌人，国内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民族意识加强。这使亚洲各国人民在驱逐出日本侵略者之后，立即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中。

亚洲各国人民在“大东亚”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日本法西斯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在绝望中溃散逃跑，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低头认罪：武国梦幻灭

在亚洲各国人民的持续打击和美苏两国的联合行动下，日本法西斯已日暮途穷，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投降。

1945 年 8 月 9 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就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讨论。现

在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认为必须通过和平道路来结束战争，但是在如何和谈上还存在争议。

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等原来的主战派提出："虽然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由于该公告对天皇的地位只字未提，因此，有必要对盟国当局提出要求，望他们表明无意改变天皇地位之意。此外，还应当附有如下三个条件：第一，进驻日本的联合国军的兵力，只限于最低数量；第二，解除日军武装，由日本自己用复员的方法进行；第三，对战犯的惩罚，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理。"

而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波茨坦公告》是日本的一次机会，不宜轻易放过。因此，提出的条件中能保持住天皇制国体就已足够了。

陆相和两总长认为如果不附带四个条件，就会完全陷于无抵抗状态，到后来，维持天皇制国体的要求也恐怕难以保证。

日本重臣和宫廷深感忧虑，担心在苏联参战以后拖延时间，必定要加强苏联战后在处理日本上的发言权，这一点显然不利于维持天皇制，所以，必须压制军部的主张使其撤销附带四

条件的方案。为此，他们想借天皇的绝对权威进行工作。前首相近卫和高松宫以及前外相重光私下交谈，然后向内大臣木户陈述了反对附带四条件方案的意见。内大臣当天两次把这种意见陈奏给天皇。

8月9日晚11时半，天皇裕仁召集御前会议进行讨论。会上，首相铃木提出："日本政府根据以下了解：7月26日的三国公告中所列举的条件，不包括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要求，接受这项公告。"与会者之中，首相、外相、海相要求只提一个条件，即保留天皇制国体，但陆相和陆海两总长坚持要附带四个条件。

双方争持不下，只得由天皇裕仁作出"圣断"，决定"在不包含要求改变统治国家大权一事的谅解下，接受这个公告"。会议以天皇的裁断为结论，在8月10日晨2时30分结束。早上7时，日本政府把接受公告的正式通知电告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经由这两个中立国转告中苏美英四国，请求接受日本投降。

8月10日下午，盟国答复说："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从投降时起从属于联合国指挥官；日本的最后统治形态应根据民众的自

由意志来决定。”

8月12日，盟军的答复传入日本。日本军部仍然狐性多疑，坚持原来的顽固立场。他们认为占领军高居于天皇之上，日本国体怎么能保证？因此，仍反对接受盟国的公告。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向天皇陈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

当天下午内阁会议上，陆相阿南提出：“就这个回答对维护国体来说是使人担心的，必须再发照会，取得更确切的保证。”阿南此时实际上已同意了东乡的主张，只是要求得到确切的保证。因此，铃木首相和多数内阁大臣同意了阿南的意见，决定再发照会。

从8月13日起，美军飞机向日本国内散发传单，揭露日本进行投降谈判的经过。同时，外国广播也谴责了日本迟迟不答，居心叵测。到此时，日本国民才开始知道，原来政府早已进行投降谈判了。日本的主和派还担心军部的偏激分子发起武装政变，将会招致国内的混乱，闹不好的话，还会使盟国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从而对维持天皇制发生不利影响。

正在此时，驻瑞典的日本公使冈本发回来

一份对主和派有利的电报，报告了美、英、苏三国之间关于天皇制问题争执的经过，并指出美国已战胜苏联而坚决主张日本实行天皇制。这等于给日本国内迟疑不定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8月14日，由天皇裕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联席会议，这是自1941年12月1日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以后第一次破例的联席会议。天皇站在主和派一面表示，“朕个人怎样都可以，不忍心使人民继续遭受艰苦”。然而，在接受公告的问题上，天皇和日本政府所固执的唯一条件就是保证天皇的地位，而不是保障人民生活。当晚，又举行内阁会议讨论天皇颁布的停战诏书问题。接着，日本政府用紧急电报向瑞士政府发出了接受四国《波茨坦公告》的通告。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

这天，日本全国广播中传出了天皇裕仁沉重的声音，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了。这时全国各阶层的人都静静地听着天皇的宣告：有的人刹时流下了悲痛的眼泪。有的人很长时间都没说出一句话，有的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所有的日本人，不管原来是战争狂热追求者，还是和平爱好者，都沉浸在低沉的悲哀气氛中。毕竟，日本的那条“武国”道路没行得通，是日本全民族的大事。

当天，铃木内阁辞职。陆相阿南首先自杀，接着，前首相近卫、铃木内阁大臣小泉和桥田、将军演田等人纷纷自杀。他们或许是害怕作为战犯被处死，或许是迫于武士道精神的压力，但更多的人是因为自己“苦心经营”的“宏伟工程”成为泡影，感到悲哀绝望而自杀。

8月17日，由东久迩亲王组成投降内阁，并亲任陆相，重光葵任外相。当天，天皇裕仁下令日本武装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8月19日，日本派出以河边虎四郎中将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马尼拉，接洽盟军进驻及投降书签字问题。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同月30日飞抵日本。

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正式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盟军代表麦克阿瑟、中国代表徐永昌，以及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代表

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战区，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8月15日，蒋介石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该指挥官应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来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从而结束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统治与蹂躏。

至此，日本终于结束了其多年的战争“生涯”，日本“武国”道路最后被切断。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最后崩溃，日本“武国梦”终告幻灭，原因何在？

首先是因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早就看出：“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到处

挑衅，先是朝鲜、中国人民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接着又冒犯了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后竟然放公然发起对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进攻。这种非正义性的战争，必须要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

日本虽然面积小，但野心却不小。朝鲜不足以添饱日本法西斯的肚子，中国东北已使日本法西斯的肚子撑得难受，整个中国大陆使日本法西斯打了几个嗝，才咽下去半截。到此时还不满足，又想把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大东亚”全部装入已经圆鼓鼓的肚囊。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整个“大东亚”的人民根本就不允许日本这样胡作非为呢？

日本在整个“大东亚共荣圈”内遇到的困难，在其本土内也同样得到体现。这样，最终使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黔驴技穷，而不得不低下头来，向世界人民宣告投降。

国家与个人在各自的运行轨道上有其相似的地方。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法则，也可以适用于国家之间。这里需要指出的一条法则是：任何国家，如果它企图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的国家

痛苦之上的话，那么最终痛苦的将是它自己。

铲除祸根：麦克阿瑟大刀阔斧尽扫军国主义流毒

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战败后的日本由盟军占领，以铲除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和军国主义逆流。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苏、英、中等盟国占领军的总司令。1945 年 8 月 28 日，美国先头部队在日本东京附近的机场登陆，30 日，大批美英军队开始在东京附近和其它地区登陆。

美国占领军为了利用民主化政策，在日本人民群众中间为美国民主建立威信，有必要清洗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领导人物。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就是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战犯。

1946 年 3 月 5 日，远东国际法庭对东条英机等 26 名甲级战犯提起公诉，开庭审判。12 月法庭宣布了判决。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和广田、土肥原二、板垣、松井、武藤、木村等 7 人被判处绞刑；木户、平沼、荒木、小矶、岛田、烟白岛、

梅津等16名被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

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的判决，确实是大快人心的事。曾经指挥日本军队蹂躏亚洲人民的法西斯头子都得到应受的惩罚。而这次审判却没有提到对战争应负很大责任的天皇。天皇裕仁还特意对美国的“宽大处理”表示感谢。应当说，无论如何，天皇应在道义上和法律上受到谴责。

接着，盟军在占领状态下，在日本进行强制性的民主改革。

当时的日本国内一片凄凉，战争的阴影仍在日本徘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工业陷于停顿，农业减产1/3。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较小城市都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居民逃亡乡村。国内共有约67万人在轰炸中死亡。日本在经济上的损失很大，日本以后用了足足10年的时间才恢复到30年代中期的水平。

然而遭受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上的创伤。日本人在全面战争环境下足足熬了8年。生活变得日益艰难，住房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本来

是谨小慎微、奉公守法的日本人民，也习惯于在小事情上违法乱纪。”日本上层统治者期望日本人民以高昂的斗志赢得战争，人民也曾积极响应，直到他们在精神上耗尽为止。被烧光的不仅仅是城市，日本人民的心也被烧光了。

日本人民对战争，对把自己的国家引入灾难的军国主义头子，对日本的整个过去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国民感到自己是被上层统治者欺骗了。

使日本国民惊奇的是，他们发现日本军队在亚洲不是被当作解放者被人欢迎，而是遭到反对。过去把日本军人当做无私的爱国者和天皇的拥护者而尊敬他们，现在对他们产生了愤恨和轻蔑。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是苦点，但是日本人民希望再也别走以前的那条“武国”道路。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决定根据日本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民主改革。由于盟军中主要是美国军队，苏中英三国依赖的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管制委员会有名无实。因此对日本的占领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事，麦克阿瑟准备以美国的民主来重新设计一个日本。

日本人民感到奇怪的是，美国军队并不记

仇，基本上是心地善良、亲善好施的。美国军队也发现日本人并不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日本军队斗争经历中听见到的那样顽固和狂热，而是一种有教养的，循规蹈矩的，温顺平和的人民。

美国占领的最基本的目标是，使日本走向非军国主义化。美国对日本的领土界限作了规划，还把在东亚和太平洋各地的日本军队和侨民集结起来，其中有650万人被遣反日本。

美国认为，如果军事占领仅仅以实施非军事化计划为目的，那么就与过去历史上以惩戒手段来结束战争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了。非军事化只不过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病症的一个临时性医治办法，只有政府的民主化，才能最终使日本免于走向战争的可能。

盟军取缔了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废除了强制性的法律，释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犯，不准以前的陆海军军官、政府中的高级官僚，甚至企业和教育界的上层人物担任重要的职务。

盟军民主化的举措体现在制定新宪法和确定新立法上。

麦克阿瑟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于1946年2

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作了很小的修改之后，就由日本政府以天皇对1889年宪法提出修正案的形式通过，并定于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

美国起草的这部宪法并不是照搬美国政治制度，而是类似于英国议会政府体制的形式，这个方案比较适应了日本人的传统，因而受到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欢迎。

新宪法明确规定，天皇是没有权力的、全国团结的象征。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国会，其他一切竞争性的权力机构，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划定隶属于国会之下。内阁对国会负责，首相由众议院选举。参议院代替了贵族院。

宪法还规定了一些人民应有的权利。例如男女平等、劳工可集体行动与资方谈判，人人都受同等教育；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涉，新建立的最高法院有权复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加。

美国也注意到，过去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是以国内财阀为支柱的，所以必须根除。

美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真正的罪恶根源是工业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于财阀之手，在

财阀支持下，有可能实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为此，盟军开始征收资产税，没收了大部分剩余的私人财富，并且解散了大财阀的公司，剥夺了拥有这些公司的家族的财权，还着手拆散组成这些大集团的工业和商业单位。

美国还帮助日本进行土地改革，没收了不在农村居住的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者必须有限度地占有土地，佃农可以用低廉的价钱买到一份土地。这样，农村的租佃率很低，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提高。

美国占领当局还充分考虑工人的利益，鼓励成立工会组织，对抗资方权力。工会迅速发展，会员达1200万人，并经常发起罢工运动。

占领当局还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与男人在法律上平等；家族宗室不再有支配权，家长不能支配其子女；义务教育延长到9年；中学大学的教育按美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

不可否认，美国占领日本是为其自身的利益着想的，但美国的占领，确实从较深层次上根除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祸根。

这样，日本走向“武国”道路的门被美国关

死，而不得不寻找更好的出路。

从此，日本放弃了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向着经济大国迈进。日本在相对平稳的政治进程中出现了“经济奇迹”，到60年代末已成为仅次于苏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他们过去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个人富裕。

今天，日本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国民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日本与西欧、美国并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极。

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日本又开始向政治大国迈进……